

出版者的話

1958年4月，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他六十岁寿辰的时候，从美国寄来了向中国人民致意的信。随同这封信寄来的还有罗伯逊本人和他家庭的照片以及今年在纽约出版的罗伯逊的一本著作“我就站在这儿”。为了答謝这位国际著名的和平战士的热情和盛意，并使我国广大人民进一步了解他为了反对种族歧视、争取美国黑人的平等公民权利和维护世界和平事业所采取的坚定立场和所进行的英勇斗争，我们特地将他的著作翻译出版，并将他寄来的两帧照片刊在书首。下面是罗伯逊的来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我向你们全体致以最热烈的衷心的感谢。我和我的家庭向你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像你们所清楚知道的，我们密切地关心你们伟大的国家所发生的重大事情，你们伟大的国家是人类文明摇篮之一，当今和未来的伟大国家之一。

学一点你们美丽的语言，经常倾听你们优美的古代和现代音乐，唱一些你们美丽的民歌，这些一直使我感到格外的光荣，并且使我感到永远是引人入胜的。

我深深地感激你们的作家、诗人、音乐家对世界文化

作出的丰富贡献。

感谢你们英勇的领导者们，感谢全体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贡献和对和平的保卫。

我希望不久将有一天在中国土地上向你们致意，那肯定会成为一个愉快的日子。

感激你们的和忠实于你们的朋友

保罗·罗伯逊”

給爱斯蘭达·罗伯遜*

卓越的作家和人类学家

为許多事情感谢你——

为了你为非洲人民的利益所作的
不懈努力，
为了你致力于我們同胞在美国这里爭取
充分自由的斗争，
为了你对于联合国重大事件，
影响人类社会各方面的重大事件
所作的积极分析，
为了坚信并且致力于
为世界上全体人民
爭取持久和平，
为了最恳切地感谢你多年来
在斗争、抱負和成就上的
帮助和指导，并且一直重視
为我們的子孙安排一个更美好的将来。

* 即罗伯遜夫人。——譯者



THE PAUL ROBESONS

Marilyn. Eslanda. Pauline. Susie. Paul. David

*Send You Greetings and Best Wishes
for*

Peace and Friendship in our Expanding World.

上面是罗伯逊家庭的照片，左起为儿媳、孙女、夫人、罗伯逊、
孙儿、儿子。文字是：“我们谨向你们致意和祝贺，愿和平与
友谊普及全世界。”

目 录

作者序言	1
前奏：避風塘里的家庭	7
第一章 我認定了我的立場	35
第二章 “心有灵犀一点通”	59
第三章 我們的旅行权利	77
第四章 时机到了	90
第五章 黑人行动的力量	108
尾語：我們的孩子，我們的世界	131
附录	135

作者序言

我是一个黑人。我的家住在哈莱姆区——这座城市里的城市，美国的黑人中心。现在，当我提笔写下理智和感情都迫切要讲的事情时，我感觉到住家在自己的同胞中间，四周环境所给予我的催促力量。

离这儿不远，就是我哥哥班^①住的房子：非洲循道教圣公会邨山教总教堂的牧师住宅，班——班哲明·罗伯遜牧师——多年来就在这间教堂作牧师。我哥哥对我的爱护，珍贵而现实地联系到另外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已经去世四十年，对我一生的影响比任何人都大——先父威廉·德鲁·罗伯遜牧师。这不仅因为班是我的哥哥，而且因为他太容易让我想起爸爸，他的家庭似乎还散发着另一位罗伯遜牧师——我的令人钦佩、敬爱的父亲——光辉四射的精神。

牧师住宅贴邻便是教堂，每逢星期日早晨，我便在教堂和几千名我的同胞同作礼拜，同他们一块儿唱他们的歌，从他们的握手和微笑里感到温暖——这些事情也和我童年连结到一起，使我想到普林斯顿、威斯特菲尔德、桑默维尔的教会团体，我在孩提时代便是在这些教会

① 班是班哲明的爱称。——译者

团体里逐渐成长起来的。

还有：这里也把我和我的同胞在美国历史中漫长而艰苦的进程联系在一起。这所教堂，郁山教总教堂，伟大的非洲循道教圣公会郁山教派的总教堂，可以一直追溯到1796年，它是由被基督教奴隶主的教堂拒绝接纳的自由黑人那一年创建的。黑人解放斗争的女英雄苏绰纳·杜鲁斯(Sojourner Truth)就是郁山教总教堂的早期教徒；我们的最伟大的英雄和导师佛莱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我们的“地下铁路的摩西”哈利特·特普曼(Harriet Tubman)，也在我们教堂的光辉传统中尽过他们的力量。

是的，我便住家在这避风塘里！

外面的大街上熙来攘往的都是我的同胞……他们的脚步的节拍，他们的笑声，他们的互相寒暄声……显得生气勃勃。我曾经在离此只有几哩地的皮克斯基尔^①听到过施用私刑的暴徒的狂吠声，听到过满腹仇恨的人高喊要杀死我的狂叫声，因此越发感到此地充满友爱。“喂，保罗——遇到你真高兴！”“你回来了，可真好！”

回到这儿来的确是真好。因为这是自己的社会。在这一带，每一条街、每一座建筑都令我想起青年时代的快乐和幻想。……这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哈莱姆区。我和爱西^②是在这儿认识并结婚的；我在这儿开始

① 1949年8月27日，罗伯逊应邀在纽约附近小镇皮克斯基尔群众大会上演唱，暴徒进行袭击，扬言要杀死罗伯逊。——译者

② 罗伯逊夫人的爱称。——译者

結交了終身至友；我在这兒开始了艺术家的事業。就离着这兒几条街，在男青年会，我第一次走上舞台演戏；高兴起来，我便在这兒的俱乐部和酒館中引吭高歌；这兒还有緊張刺激的精彩籃球賽、跳舞、社交生活……是的，这兒是我的老家——这里和全国各地的黑人社会都是我的老家。我就站在这兒。

我是一个美国人。我憑窗凝視的景色，使我回想起我的同胞在这个国家的根源是多么根深蒂固。对面街上，作为历史聖地而仔細維護的是一座殖民大厅，1776年华盛頓將軍在坚守紐約、抵抗英国軍隊前进而一敗塗地的战斗里，曾用它作司令部。第二年冬天，华盛頓和他的殘兵敗將紮营在富治谷，在那困难时期前往援助他們的人羣中就有我的外曾祖。他名叫塞洛斯·布斯提尔，原籍新澤西州，生下来就算奴隶，好不容易才自己贖身換回自由。他后来成了面包师，据史料載称，乔治·华盛頓因为他送面包給飢餓不堪的革命軍，曾向他致謝。

是的，从三百多年前以来，我們黑人就是美国生活和历史的一部分。五十年前，杜波依斯在他的經典著作“黑种人的灵魂”中，就曾用这几句充滿詩意和真理的話向美国白种人挑战：

“你們的国家？怎么会是你們的国家？早在新教徒在此登陸之前，我們就在这兒了。我們把我們的三宝帶到这兒来，和你們的交流在一起：第一宝是故事和歌声——把柔和而动人心弦的歌声帶到一个

既不合諧又無旋律的土地上；第二宝是战胜了荒凉、征服了瘠土的汗珠和膂力，早在你們無力的双手进行开发之前二百年，就为这辽阔的經濟帝国奠定了基础；第三宝則是气魄……我們的歌声，我們的劳动，我們的欢笑……假若沒有黑人，美国还能成其为美国嗎？”

我今天詢問：如果沒有我們一千六百万黑人大公無私的貢獻，美国能有什么前途呢？如果我們的傳統仍然被否定，我們的国家在孕育中的新世界里，又能获得什么光荣地位呢？

我現在作为一个畢生全心全意致力于为我在美国的同胞爭取获得充分自由，一絲一毫也不能少的充分自由的美国黑人来發言。在这本書里，我談到了这一場爭取黑人自由的斗争在今天的危机里具有什么意义，它为什么在爭取我国民主的斗争中是决定性戰場，以及它同全世界和平、解放事業具有怎样的关系。在提到我对这些問題——所有的美国人民和全世界大多数人民都在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討論这些問題——的見解的时候，我都設法解釋清楚，我的观点是怎样成熟的，为什么要采取我所采取的立場。我也同別人一样，我的見解，我的工作，我的生活都是一致的，因为，正如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那句意味深長的格言所指出：“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会影响他自己。他固然可以改造环境，但环境也可以改造他。”

开宗明义，我不妨交代清楚一件事：我决不——而且

沒有一絲一毫的折扣——担心本国的老爷們，白种人大龙头們对我和我的思想抱着什么样的看法。十多年以来，他們尽其所能地对我进行迫害——誹謗、暴力襲击、不讓我享有作为一个艺术家所应有的职业权利、不許我享有出国旅行的权利。对于这些人，这些真正“非美”的人，我只能說：“哼——我也不喜欢你們。”

可是我确实关心——而且深深地关心——我在全国各地所遇到的普通人民的美国……在这些普通人民中間，有我曾經参加过他們糾察队的劳动男女，汽車工人、海員、厨师和侍役、皮匠、矿工、鋼鉄工人；还有那些同我特別亲近的美籍外国人、各种不同种族的人民、犹太人；还有中产阶级的进步分子、艺术界和科学界人士、學生們——美国所有的人民，我曾經在民歌“美国人之歌”中所唱的“等等等等……劳动人民”。

我最关心的是黑人，也关心我在美国各地黑人区遇到他們时他們所問的关于我的問題。不可避免地——自从多年来我成了許多糾紛的問題中心以后——有許多問題涉及我的見解和行动。我因此想起了撰写“保罗·罗伯遜是誰？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那篇文章并且打算公正地提出答案的“匹茲堡信使报”記者，他写道，这个人“可有点复杂，因为在大部分美国人的腦筋中，罗伯遜先生具有兩种截然不同的性格。一种是种族平等和人权的战斗代言人，另一种則是苏联共产主义的忠实傳道者。”其后，“非洲美洲人报”的作者又用这一番話总结了同样的調查：“如果保罗·罗伯遜有什么神秘的話，那就

是如此。如果他光唱聖詩，他可以成名致富；如果他為他的種族而鬥爭，他就被入藐視，飽嘗閉門羹。至於他為什麼作此決定，你只有向他的靈魂深處去搜尋了。”

多年以來，在這裡和那裡，在不同的文章和訪問記里，我曾努力解釋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兩個斷面。可是這些短促的捕捉和碎片是不夠的，因此，我打算在這本書里把這些事情敘述得更充實。寫此書時，我得到了我的朋友飽學的黑人作家勞埃德·布朗^①的幫助，我對於他和我工作時所表現的熱誠了解和創造性的才能深深表示謝意。這本書雖然不是一本自傳，不過我以為在卷首就簡單地介紹一下我的童年和我在兒童時代所受到的深遠影響，也許是有好處的。就讓童年的故事像在生命里一樣，作為其後各章的前奏吧。

保羅·羅伯遜

1957年11月於紐約

① 布朗的著名著作是“鐵城”，我國有鄒綠芷的譯本。——譯者

前 奏

避風塘里的家庭

我童年时期引以为荣的是我父亲。我爱他胜过爱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他的同胞們——早在我出生之前多少年，他在同胞間的地位就像个家長——也爱他。而且白种人，甚至于貴族化的普林斯顿城里最摆架子的人，也不得不尊敬他。

父亲生于北卡罗来納州馬丁县，落地就算为种植园农奴，他在十五岁(1860年)时潛逃，通过“地下鐵路”^①北上。在林肯大学半工半讀畢業后，和我母亲、附近費城的教师瑪丽亞·露易莎·布斯提尔在1876年結婚。他先在宾夕法尼亞州威尔克斯—巴尔城作了短时期牧师，又調任新澤西州普林斯顿城衛塞尔斯朋街長老会教堂的牧师，我就是1898年4月9日在那兒出生的。

我是罗伯遜牧师最小的孩子，呱呱落地时，已經有了哥哥姐姐四人：小威廉，十七岁；里夫，十二岁；班哲明，六岁；还有我唯一的姐姐瑪丽安，四岁。

父亲晚年又出任附近威斯特菲尔德和桑默維尔两个小鎮的非洲循道教聖公会郁山教堂的牧师，一直做到

^① “地下鐵路”是十九世紀中叶美国發生釋奴运动时的地下運輸網，南方大批农奴經過地下運輸網，逃往北方。——譯者

1918年逝世，死年七十三岁。当时，桑默维尔报纸社論曾这样評論：

“罗伯遜牧师撒手塵寰，社会上从此失去了一个八年来在他的同胞中間埋头苦干卓有成效的人。罗伯遜先生性情耿直……他深知他的同胞的特点，經常关心他們的福利。凡遇有小看他們或者干涉他們的权利的事情發生，他立即憤慨指斥。他具有那种曾在南方产生过那么多雄辯家的氣質，深深了解自己同胞的需要，从而把他們团結在教堂里。他在全国有色人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去世是当地的重大損失。”

你現在到新澤西州那几座小鎮看看，便知道他当年服务的几个教区对他記憶犹新。你沿着經過新布倫斯威克的公路開車过去，就可以看到那座威廉·德·罗伯遜大厦，那是一座以他为名的政府建筑物。在普林斯頓城里，衛塞尔斯朋街長老会教堂至今还在，有一扇染色玻璃窗还閃耀着“追念薩勃拉·罗伯遜”字样；薩勃拉·罗伯遜就是父亲的亡母，卡罗来納州种植园的女农奴。你在附近黑人教区的湫隘小巷——綠街、赫尔費雪街、奎利街、傑克遜街、貝赤街、約翰街——可能遇到許多上年紀的教会会友和老街坊，他們会津津乐道地跟你談起我父亲埋头苦干的精神，他的聰明，他的威信。他們还会对你談起我母亲瑪丽亞·露易莎：她怎样坚韧而亲切地深入他們中間——安慰病人，照料孤兒，为飢寒交迫的人

征集食物衣服,并且为许多人打开了学問的宝库。

尽管我在母亲惨死之前就已经记得一些事情,但我还不能说我十分记得她。我六岁那年,她这个近乎双目失明的殘廢人因为家里失火,竟被活活燒死。我还记得她入殮、出殯时的情形,以及有哪些亲戚曾来弔丧;然而,一定是母亲之死引起我感伤和激动,才赶跑了有关她的其他印象。有些人跟我提起,她聰穎过人,古道热腸,对于我父亲的发展和 工作帮助極大。她是他在学問上的 伴侶;她帮他撰写佈道講詞;她在他的教区所有工作中是他的左右手。

瑪丽亞·露易莎·罗伯遜在1853年11月8日生于費城,娘家是有名的布斯提尔家族,具有黑人、印地安人和教友会白种人混合血統的布斯提尔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美国的开国时期。我的外曾祖,曾經給华盛顿的軍隊烤过面包的塞洛斯·布斯提尔,后来成了費城黑人的領袖;在1787年,他是美国黑人第一个互助团体、“自由非洲人协会”的創建人之一。多年以来,布斯提尔家族出現过許多教师、艺术家和学者,而且,根据教友会傳統,参加了“地下鐵路”工作,有許多黑人便是像我父亲那样,通过“地下鐵路”逃出樊籠的。

我不知道現在是否还保持着这一習慣,在我童年时代,布斯提尔宗亲会每年要举行一次团圓会,远近亲屬都来参加。我在大学筆記簿里还找到一張1918年在費城楓林举行的团圓会的印刷节目單。我的姨母,吉尔特魯德·布斯提尔·摩塞尔,列名为宗亲会副主席;当天的节目單

上包括我的表姊安妮·布斯提尔·史密斯宣讀家族历史；另外还有其他親屬致詞，包括“保罗·罗伯尔遜先生”^①的講話。（把我的姓氏拼錯字母固然是排字工人的錯誤，但当年使用奴隶的罗伯遜家族——我父亲就因此姓了罗伯遜——其先輩姓氏大概就是罗伯尔遜。父亲在北卡罗来納州馬丁县出生的乡村就叫罗伯尔遜村；据史乘所載，最早的黑人申請狀之一，乃是农奴奈德·格里芬1784年从艾治康比县——該县后来併入馬丁县——提出的，他当初曾获得参加革命服役就准予自由的諾言，但他的主人，一个名叫阿伯納·罗伯尔遜的人，事后竟然拒絕，他因此要求州政府准予自由。）

尽管我在筆記簿上簡單記下講話的題目——“坚持信念”，我却一点也記不起来到底在那一次会上講了一些什么話。我選擇这个題目來講話倒不是件意外的事，因为这是父亲一生奉行的格言——一个人必須坚持自己的信念。坚守不渝。無論如何要坚守。我自懂事以来就浸透了这种思想。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的建立，来自罗伯遜牧师对他孩子們諄諄善导的原因并不多（因为爸爸的脾气是不多講話，在家时常默不开口，而在我們罗伯遜一家人中，最深厚的感情多在不言之中表达出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他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以身作則。

我父亲的身材只有一般人那样高，兩肩却很寬闊，他的体格充分表现了性格上的沉着和严肃。他講話的声調

^① 罗伯遜的英文拼法是“Robeson”，这里誤拼为“Roberson”。

是我一生所听到的最动人的声音。那是低沉而宏大的男低音，悠揚而优雅，充分表达了内心的热爱与同情。我在童年时期跟在他身边，手牵着他的手，随着他在同胞中間来来往往，那是多么值得驕傲啊！我們的年齡相去很远——我出生那年，他已五十三岁；母亲去世那年，他都快到六十岁了——但是在他丧偶之后許多年里，家里只有我这一个孩子在家，他对我無微不至的照顧和看管便將我們紧紧地联系到一起了。他既不把感情流露到表面上，也不輕予讚揚。要行为端正——不錯，他的几个孩子都有这种理所当然的認識。我就知道自己应该如何檢点——玩到什么时候就該回家，在家里要做好家务事，掌握自己用功的时间——而且心安理得地順从他那不在多言的家規。我只有一次反抗了他。

那一次，我已經十岁了，那时我們正住在威斯特菲尔德。父亲叫我做点事情，我没有做。他說，“到这兒来”；然而我轉头就跑。他在后面追我。我一冲就冲过馬路。他也赶过馬路，脚下一絆就跌倒了。我吓呆了，赶紧跑回来，把爸爸攙起。他跌断了一只牙。我永远忘不了当时的心情——害怕、慚愧、不孝、自私之感一齐湧上心头。我一向敬愛他，說一声为他牺牲，馬上就可以献出我的生命——而現在我却伤害了他，不听他的話！从此以后，他再也無須乎訓誡我了；这一次意外就成了我严守庭訓到底的根源。

我在前面提到过，控制普林斯頓的白种人家庭也承認我父亲的威信，对他恭恭敬敬。只要回想到在我童年

时代的普林斯顿（我并且认为从那时到现在并没有多大变化）和南部任何小镇的情况一模一样，就可以完全了解这种事情是多么特殊，对他的人品是多么尊敬了。普林斯顿离纽约不到五十哩，离着费城还要近些，但它在精神上是属于狄克西（Dixie）^①的。根据传统，当地大学——大都座落在普林斯顿——所吸收的学生和教职员大部分是来自梅遜—狄克遜線以南的人，这些最顽固的保守分子的子弟们，就带来了在社会和经济上表现“白种人至上”的最死硬范例。普林斯顿的心既在南方，当然也和南方各地一样，其统治思想是在华尔街。最顽固的保守分子和银行家在普林斯顿原是一家人，种植园大厦的腐臭气味中也充满了会计大楼的铜臭气味。他们的宗教思想是加尔文教^②：信仰的乃是——金钱。

富庶的普林斯顿是白种人的天下：黑人在那儿只有作工的份儿。贵族必须有奴僕，因此我们黑人的小社会里的人，大多数成了僕役阶级——在高门大厦里做底下人，在大学里做厨师、侍役和门房，在城里赶马车，在附近农场和砖厂做苦工。由于父亲有许多亲戚——班叔叔、约翰叔叔、卡拉威表哥、詹斯表哥等等——到镇上来，找到了这些工作，因此，我和这些工人们有过最密切的关系。

普林斯顿是黑白隔离的：我上的小学校就是这样，黑

① 狄克西是美国南部各州的总称。——译者

② 加尔文教是移民北美洲时的中产阶级的宗教思想，它基本上仍然是一种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的思想。——译者

人而且不能进入任何一家中学。我大哥比尔^①不得不远到特蘭敦——离普林斯顿十一哩——去进中学，后来我們若不是搬家到另外一个鎮上，我一定也得这么办。神学院虽然能够容納一兩名黑人学生，大学則是一个也不收的。

在普林斯顿的阶级制度之下，黑人被限制到只能做卑賤的工作，收入微少，既無任何政治权利，又沒有交涉的力量，只能寄望于施舍，而不能寄望于公平。統治阶级的冷酷心腸和严实口袋只能在“順从的穷人”有所哀求的时候，才偶尔打开一下；到那时，才能指望他們用施舍、小額貸款或佈施旧衣的办法，作一次慈善事業。作为社会生活中心的黑人教堂就成了請求行善和接受佈施的主要途徑，而事实上，衛塞尔斯朋街長老会教堂本身就是由白人慈善团体出了大部分經費才兴建起来的。牧师可以說“無”和“有”之間的桥梁，他用各种现实的方法为他的教友服务——为失业者寻找工作，为貧困者週轉金錢，从法律上寻求仁慈。

由于进行这些教会工作，我父亲得以認識城里所有的所謂“上等人”，他們也都認識他。大学校長的門虽然也許會讓他进去，然而，在比尔該上大学的时候，罗伯遜牧师却無法为他的兒子推开那所学校的大門。那位滿臉虔誠模样的校長——長老会教徒——說：不行，那可絕對办不到。那个人就是伍德羅·威爾遜——弗吉尼亞州人，普林斯顿大学畢業生，留校作了十年教授，从1902年

^① 比尔是威爾遜的爱称。——譯者

到1910年任大学校長，后来出任新澤西州州長，1912年当选联邦总统，由于“他使我们置身于欧战之外”于1916年再度当选，但他在宣誓就任第二任总统后一个月，就率领全国参加了战争；他还是诺贝尔和平奖金的获奖人，新自由主义的傳道者，为世界争取民主和为美国推行黑白隔离政策的代言人。

常言說，脫帽就教的人一定是俯首帖耳的人；而最令我引以为荣的是：我父亲在应对上却没有表现出一絲一毫卑劣感。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拒絕再作奴隶，長大成人之后，更是終身不作順民。我們从他身上認清，而且永不怀疑地認清，黑人無論在哪一方面都是和白人平等的。我們并且坚决要証明这种認識。

父亲在我襁褓时期曾受到严重打击，面对着这一打击，他依然英勇地显示出，所謂卑賤的地位并不足以妨碍一个人維護自己的全面尊嚴。他在教堂負擔了二十多年領導工作，極获尊重，教会却因派系糾紛，免掉他的牧师职务。更使他感到难过的是有几个他最亲近的朋友也屬於攆他离职的派系。父亲自从成年以来，始終是一位文雅的学者和牧师，那时年紀已过中年，家里妻子殘廢，孩子待哺，却被迫重新开始新生活。他弄来一匹馬和一輛車，就轉为依靠給居民搬运垃圾餬口，我初初能够記事时，他做的就是这项工作，我到現在还記得堆在綠街十三号我們家后院、塵土飞揚、越来越大的垃圾堆。对于我們家那匹馬，我也有亲切的回忆，牠是匹母馬，名叫蓓絲，我慢慢喜欢上牠，牠也喜欢我。我父亲还做租車生意，充当

馬車夫，搭上兴高采烈的學生們在城裏兜風或是到海邊旅行。

清道夫也好，馬車夫也好，他在社會上還是有威信的羅伯遜牧師，而且比誰都更富有自尊心。我從來沒有聽到他為那幾年的窮困和不幸抱怨過一次。他的嘴裏從來沒有說過一聲苦。沉着、堅強，他拚命的干活來維持生計，而且顧全我們的教育。自從家裏發生了慘劇、奪去了母親的生命之後，沒過多久，爸爸就送班哲明到北卡羅來納州去念大學預科，進畢德爾大學（現在的約翰森·斯密斯大學），又把我姐姐瑪麗安送到斯考蒂亞學院，那是北卡羅來納州專為黑人女生設立的學校。大哥比尔那时已在林肯大学——我父亲曾讀过的大学。里夫（我們叫他里德）則在家住過一個時期，工作是趕馬車。

也許有人提到過，里德後來的表現不像羅伯遜家其他的孩子那樣好，事實上，我父親對他這個孩子極為失望，非常不滿意他那種大模大樣、毫無家教的行為。我對於這位鹵莽的哥哥倒很佩服，他教給我凡是遇到種族欺凌和辱罵，就立刻以牙還牙。時常有這種情形，里德一聽見南方來的紳士學生講些什麼不順耳的話，便立刻從馬車夫座位上跳下來，把那出言不遜的人拉到車外飽以老拳。他經常隨身帶着一口袋又小又尖的石頭子兒來防身——只要一需要行動，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用這武器大干一場。

這當然免不了要和法律發生抵觸，遇到這種情況，我父親雖說心煩，也只好穿上教服，再一次去把里德營救出

来。然而这类事發生得太多了，終于有一天，我伤心地默然站在爸爸身边，听爸爸勒令里德搬走——他必須到另外的地方去过日子，因为他对于他的小弟弟保罗乃是極端危險的榜样。

里德已經去世了。他在教室中、教会里和講壇上都沒有什麼好名声。可是我想起他来便不胜怀念。暴躁，反抗，嘲笑陋習，蔑視白人法律——我認識很多像里德这样的黑人。我天天都見得到他們。他們盲目，光是暴躁不堪，自己为自己找寻出路；他們人單勢孤，只憑一團怒火，赤手空拳地痛击那需要許多人的肩膀才能推垮的牆壁。里德教給我說：“永远不能低声下气，挺起胸膛对着他們，要是他們打你，你就回击得比他們更兇！”到了大家都懂得這句話的时候，情况一定完全不同了；到那时，像里德这种火暴脾气的人也一定可以和和气气地过日子，而無須有人再为他們皺眉了。

由于我是小兒子，在我自己講，普林斯頓的日子过得挺快活。我以玩耍的时候居多。附近有能够打球的空地，到了比尔放假从大学回家，那就更加好玩了，他是大学足球^①选手，常教我怎样玩足球。他是我的啓蒙教練，在杂草叢生的空地上，一而再、再而三地教我基本动作——怎样捉牢对方持球球員，他还假裝持球讓我捉他；怎样持球快跑。到了冬季夜晚，我和爸爸在家相聚：他喜欢下棋，我們兩個就在客厅里埋头对奕，一下就是几个鐘

① 这是美式橄欖球。——譯者

头，很少講話，但真是其乐融融。

父亲从来没有跟我们講过他小时候作农奴的事，也没有講过他的兩老——班哲明和薩勃拉——的事；不过，过了很多年之后，我才听到別人講起，爸爸在祖母去世之前，至少曾有一次，也許是兩次，冒險潛回种植园去探望她老人家。我敢断定，当年即使他提起这段往事，我这穉龄幼子也絲毫不能了解到，像父亲这样高貴的人，怎么会曾經属于另外一个人——任憑他买卖，任憑他驅使、虐待。

（写到此处，不妨順笔一提，后来过了許多年，我在紐約遇到了当年曾經羈役我父亲的那个人家的人。我到商業区一家夜总会去听一位朋友唱歌，有个人过来和我搭話，自称是北卡罗来納州罗伯遜家的人。他說他敢确定，我如果听說他母亲在世的时候把我的成就引以为荣，并且把我为家族姓氏所掙得各項榮譽的消息都仔仔細細地剪存在一个簿子里，我一定高兴。这个陌生人接着說，他希望过兩天和我聚一聚首，多談談。“你看，”他傲然說出了真心話，“你父亲一向是給我祖父作工的。”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我極力保持住禮貌，向那位南方紳士保證：改姓了他們家族姓氏的黑人們比任何原来姓罗伯遜的人及其子孙們为罗伯遜这个姓氏多添了几分光彩，这是毫無問題完全正确的事。“你說我父亲‘一向給你祖父作工’。我看應該这么說：你祖父把我父亲当作农奴来剝削！”——這句話結束了一切；而我这位罗伯遜从此再也沒有跟那位罗伯遜亲亲热热地聚一聚首。）

我的年岁还够不上給人工作，因此和普林斯頓白人

很少接触；不过，我的玩伴里也有几个白种小孩。其中一个是个男孩，年岁跟我差不多，他爸爸在离着我们家几个门口的地方开了一家杂货店，我们当然不能一块儿去上学，可是逢到漫长的夏天，却是难舍难分的玩伴。有一次——我记不清是为 什么了——我们两个竟闹成一场小型大战。两个人屈膝探腰、绕过来闪过去，作了半天磨拳擦掌的姿势，终于鼓起勇气，彼此在对方的鼻子上猛捶了一拳头，然后嚎啕大哭，跑回自己的家去。第二天，我们还是好朋友。

我当年一定也常有为幼年丧母而感到难过的时候，但在儿时的记忆里，记得最清楚的却始终是一种舒适和安全感。我也享有充分的母爱，不仅爸爸和哥哥姐姐们在家时如此，而且来自息息相关的整个社会。东南西北，哪条街上都有我的阿伯阿姨、叔叔婶婶和表哥表姐——也有一些人根本就沾不到一点亲戚关系。所以，假如我打算把所有帮忙把我扶养大的人都写下名字的话，那简直等于一份普林斯顿黑人人名录。我可以称得上“过继”给所有这些善良的人民了，在我父亲赶车去海滨或参加教会会议不能在家的时候，他们经常会在餐桌上或在睡床上（多半是和其他两三个孩子挤在一起）给罗伯逊牧师的儿子留个空位。

大家都是胼手胝足的人，而且多半是家徒四壁——然而他们是多么富于同情心啊！是多么富于人类的美德，以及因几世纪的压迫而铸成的钢铁意志啊！这些家庭里充满了朴实而愉快的笑声和民间的俚语轶话，在他们分

給我的滋養的青菜、豌豆和棒子面面包之外，還充滿了生活樂趣。在這個圈定範圍的窄小世界里——在這裡，家庭必須又是戲院又是音樂廳又是社交中心，到處都是歌聲激盪。表現愛情和期望的歌聲，唱出苦難和勝利的歌聲，有如滔滔江水和潺潺溪流的歌聲，讚美歌和爵士歌，聖詩和布魯士歌，在精神上訴說不盡的悲哀中蘊借着安慰的歌聲。

是的，我聽到我的同胞歌唱！——在客廳煤爐的熊熊火光里，在紫丁香花香味四溢的夏天走廊上，在唱詩班頂樓和星期日早晨的教堂席上——我的靈魂里充滿了他們的歌聲。後來，我就在父親佈道時聽到了這些歌曲，因為在黑人演講里，時常會出現民歌的詞句和韻調。我們所喜愛的感人動聽的福音都是那些高唱出來的福音。正好像我們為高超的福音歌唱家——例如馬哈來亞·傑克遜(Mahalia Jackson)——的歌聲而激動一樣，我們也聽到了我們佈道者的鏗鏘語調，他們之間有很多人最擅于作詩意的演說，我父親就是其中的一個。

我還另外記得一些關於普林斯頓的事情。說起來也許有點怪，而且不大容易形容。我從小就体会到——我也不十分知道怎麼會体会到——黑人社會里對我有一種特殊的感情。我和鄰居的孩子們並沒有任何不同之處——一樣玩“老鷹捉小雞”和“跳田雞”；經常說“是，夫人”，從來不和大人頂嘴；為了怕鬼，不願意穿越附近的墳地；勉強洗刷乾淨去參加主日學。然而，同胞們還是同我父親一樣，斷定我將來一定有些與眾不同。至於到底有什麼不

同，也沒一個人真正說得上來，但他們硬是直覺我命中註定要做大事。他們不知憑着什麼道理，一死認定了這一點，也正是由於有了這信念，他們在對待牧師的無母孤兒的無私感情上，才另有一種分寸。

我自己並沒有搞清長大以後應該做什麼事。像我父親一樣做牧師？像我母親一樣做教師？很難斷定。不過，不管到底是什麼職業，他們都這樣說，我長大後一定會成為“種族的榮譽”。“孩子，你行啊！天生來就行！保准你將來是頂兒尖兒的人物。你等着瞧罷——我的話准沒錯！”我听了這些硬說我生來命大、將來一定有大家巴望不到的好日子的話，有時也覺得古怪，可是我從來不為這些話分心。離着長大成人的日子還遠着呢，現在還是又玩又樂要緊。

雖然我們在1907年我九歲那年搬離普林斯頓，我一直到二十一歲大學畢業，都不時往來於這些小鎮和普林斯頓之間。到普林斯頓去作客永遠好比回到自己的老家。

我們把家第一次搬到威斯特菲爾德，那地方離着普林斯頓三十多哩地，正和紐約在一個方向。自從我父親失去教堂的職務以後，普林斯頓的朋友們多年來始終力勸他務必重執傳教舊業。因此，在六十二歲那年，他得到了這機會，便迫不及待地舉家遷往，一切從頭做起。這一次他參加的是另一個非洲循道教聖公會耶山教會。威斯特菲爾德的黑人教區比普林斯頓還要來得小，一開辦的時候，羅伯遜牧師的新教會團體不過只有十來個教徒，由他們幫助他奠定唐寧街非洲循道教聖公會耶山教

堂的基础，鎮里的黑人兒童太少了，也無法开办黑白隔离、“專限黑人”的学校，所以我們在那兒住家的三年里，我上的乃是黑白混合的小学。

威斯特菲尔德和普林斯顿頗不相同，后来的桑默维尔也是如此。黑人和白人之間的隔阂当然还是有的，但并不十分鮮明；在小鎮生活的一般情况之下，两个种族之間还有些友好关系。白人劳动者到处可見，而且大部分是美籍外国人，他們并不象普林斯顿的貴族那样，还能把黑皮膚的劳动者当作同等人类看待。（他們当然还認為黑人是低薪工人，甚至是職業的競争者，但还不致于認為是完全不同的階級。）

在这兩座小鎮里，我結識的白人增多了。我时常到同学家去玩，总是受到友好的款待。在当时我对于这件事並沒有清楚的認識，現在回想起来，才了解到我能在两个种族社会之間来去自如的情况是相当特殊的。首先，我是声誉卓著的牧师之子，其次，因为我在运动和功課方面都出人头地，而且願意和大家一塊兒打鬧玩耍，我在男女同学羣里很受欢迎。有一些白人家長看到我在我父亲教誨之下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便鼓勵他們的子弟多和我来往，据我猜想，那是希望我能够發生好的影响。拚命用功，幫人做事，願意替人跑腿，見到妇女們就脫帽致敬，遇到別人給蛋糕必說“不吃，謝謝你”（那是指第一次讓吃的时候），从来不抽香烟，不說髒話，滴酒不飲，永不扯謊，永不逃学，永不忘記主日学，学校成績表上別無二样，永远写滿甲等分数——这就是一个好孩子。

說起來，我可以算是好孩子而當之無愧——但並沒有好到那個樣子！無論如何，並不是時時都好。我父親就曾經答應我的教師們，只要我有任何不聽話的地方，就可以責打，我雖然記不起來曾經做錯過什麼事，可是我確實曾經挨過兩三次這種結結實實的（而且是永難忘記的）責罰。

我們在1910年搬到桑默維爾，是個比較大一點的市鎮，座落在威斯特菲爾德和普林斯頓之間，羅伯遜牧師就在聖托馬斯非洲循道教聖公會郁山教堂做了八年牧師，最後死於這一職位上。我在桑默維爾上到第八年級（這所學校全部又是黑人學生），畢業成績佔全班第一名。據我猜想，爸爸一定很高興；這件事雖然正中了他對我的期望，他的態度卻從來不允許表現出矜持自滿的感情。

我時常聽說，只要學校的成績能有一百分，他就不会对九十五分表示滿意。這倒並不是因為他崇拜十全十美，而是由於他要求“人格完美”——這是他的基本看法，里面還不可分割地包括了“力爭上游”的精神。人生的成就是不能用金錢和個人地位來衡量的，但一個人的目標必須是本身力量的最全面、最高的發展。

要愛好學習，要不懈地深入探求真理——這是我父親的教誨。他在學校時所受的教育完全是標準方式，由於現在的教育強調工藝技術，這種方式已不多見了。我父親如果看到近年來因杜波依斯的戰鬥性政策和布克·華盛頓(Booker T. Washington)的保守性論調而在黑人生活中間引起的大辯論——這是一場有關黑人進步的道路而

大部分用教育目的表达出来的两种不同思想的斗争——用政治名词来说，我不知道他会采取什么立场。不过，罗伯逊牧师实际上曾斩钉截铁地反对布克·华盛顿的黑人教育应该仅仅限制在学习手艺的看法；他坚决相信、追求自由的黑人也应该攀登知识的高峰。拉丁文、希腊文、哲学、历史、文学——一切知识的宝库也应该由黑人享有。

因此我在中学时就念了四年拉丁文，进入大学后又念了四年拉丁文和希腊文。我父亲密切地注意我的功课，一页一页地和我共同研究他非常精通的维吉尔、荷马及其他经典著作。他又是我在公开演讲方面的第一位教师，早在我当选中学班代表和大学辩论员之前，家里每到夜晚便时常有朗诵练习，在练习时，他喜爱辩解有力、意义丰富的字眼，坚持认为口齿应该清晰，这都使我深深记在心里。

桑默维尔镇的中学不是黑白分校的，我在那儿和不少白人学生结成至交。其中有一位同学名叫道格拉斯·布朗，是一位才华四溢的学生，和我同班达四年之久，后来做了普林斯顿大学的院长。我被邀参加合唱队（后来到了大学就不同了）、话剧队、各种体育活动和学校内外的社交活动。教师们也和藹可亲，有几位特别值得怀念。

指挥我们合唱队的音乐教师沃赛勒小姐特别注意训练我的发声。英文教师安娜·米勒密切注意我在講演和辩论方面的发展；第一个向我介绍莎士比亚作品的人就是她。美国戏院是在多少年之后才允许由一个黑人扮演奥

賽羅的；可是米勒小姐早就認為应当如此，她在中學戲劇演出節目中，就教導我扮演這一角色。我既興奮又害怕，在那次隆重演出中費盡力氣才把台詞朗誦出來（既要掛念着我父親那雙要求語氣盡美盡善的耳朵，又要記着教師的耐心指導），那次演下來，全世界再也沒有人能夠說服我再上台表演一場了。

教授拉丁文的范迪維爾小姐似乎並沒有染上種族歧視的惡習；化學和物理教師巴格小姐在她負責的學校社交生活中，總是想盡辦法讓我感到融洽、舒服。巴格小姐總是力邀我參加各種集會和舞會，如果我真的到了場，她便頭一個和我跳舞。她的鼓勵雖多，但我還是以避開這種社交場合的時候居多，我時時有這種感覺——看吧，說不定會發生些不愉快的事情；因為白人和黑人的兩個世界沒有比在社交生活中劃分得更分明了。雖然我不時到白人同學的家庭去玩，我却永遠在心里記着，自己是屬於黑人社團的。

我從幼年時起，就不知不覺地接受并採用了美國黑人生活中的一種防禦戰術，直到多年之後才徹底拋掉這個辦法。黑人即便是要證明自己的的確確是與人平等時（說來奇怪，實際上必須用最最優異的成績來做證明！）他也決不能夠有任何向白人優越地位進行挑戰的表現。你只要有能力，那你就往上爬吧——可是決不許“目中無人”。要永遠表現出你是感激涕零的。（即或你的收獲被那些不甘心的勢力強行搶走，只要“他們”沒有全部把它搶走，你也務必要表示感激萬分。）總而言之，千萬

不要做出任何会引起他们对你发生恐惧的事情，否则那欺凌压迫的巨掌，尽管偶尔也许松开一下，到那时也一定会重新握成拳头，一下子又把你捶倒在地上。

因此，在中学做学生时，我尽一切努力做到“恰如其份”。我尽力掌握机会。我只用自己的能力来衡量自己，而不敢将自己去同任何其他的人比较。我当然更不敢向一切墨守成规的事务挑战。然而，谦逊、抑制并不能保护我躲开所有的仇视：没过多久，事情就很明显了；那所中学的校长便对我充满仇恨。艾克尔曼博士——他后来在新泽西州教育系统中连连升级——并不隐瞒他的恶毒感情。我表现得越好，他骂得便越厉害。我在打足球充任后卫时，同学们高叫“传球给保罗！好啊——保罗”，似乎也会让艾克尔曼博士心惊胆战；音乐教师命我在合唱队中担任独唱，也完全是因为校长的激烈反对才决定的。

他从来不同我讲话，除非是要痛斥我一顿；而且他似乎永远在寻找痛斥的借口。我的毛病是偶尔会在早晨迟到——也许是因为家离学校只有几百步远的缘故吧！在我来说，“早起早睡”这格言做起来很有点难办，时常会把起身、上学所需要的那几分钟时间估计错误。遇到这种情形，艾克尔曼博士就会像一头虎视眈眈的老鹰一样，抓牢我这过错，大发雷霆，他用的是最毒辣的词句，其目的就是要让我体会到我果然是像他所认为的黑人那样，卑劣、下作。有一次他把我送回家去，当面责罚。爸爸一向愿意由教师的手来执行适当的责罚，而不愿意自己动手，可是这一次我对这办法表示了点意见。“听啊，爸爸，”我

說，“我現在可是長大了。你怎么样責罵我都沒有關係，可是如果那樣討厭的老校長用手碰一碰我，我發誓一定要扭斷他的脖子！”我猜爸爸了解了這番意思，這件事也就算了。

在我成長的年月里，哥哥姊姊在放假回家居住時對我的不懈幫助，具有永不磨滅的價值^①。

首先是大哥 比尔，在罗伯遜牧師的孩子當中，要講“聰明才智”，公認 比尔第一。我多少年來雖然也遇到許多聰穎過人的人物，但是時間並不能減少我對 比尔的智力的驚佩。像里德一樣，他現在已去世了；他的能力始終就沒有全部發揮。他好像經常在讀大學——上過林肯大學和賓州大學，在波士頓又上過霍華德大學——只有在錢耗光的時候才停學不上，去做那些讓黑人做的工作。他有好幾次作卜爾曼鐵路的乘務員，“專跑鐵路”，又有一個時期在紐約大中央車站當“紅帽”^②，他的同事們因為佩服他學識淵博，特別給他起了個綽號：“淵博之士”。

比尔的學識受到了更正式的承認：他專攻醫學，並且獲得了學位。但是從脾氣講來，比尔並不適于作一個開業醫生。我敢斷言，如果 比尔遇到一項醫治骨折的實際工作，他的思想會集中到“天曉得”的地方（也許是想起接骨工作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古埃及人時代，也許是在凝思一般骨頭的分子結構——最大的可能是思想里糾纏着與手上工作毫無關係的某一醫學理論問題）。 比尔應該在

① 見附錄甲，第135頁。

② 即行李搬運員。——譯者

某些科学研究机构里找一席位，他那转动不停、左思右想的脑筋也许可以在那儿用在寻找深奥答案的工作上（还得有个人在旁边，看他手持试管时确实是在作记录，而不是一时兴起又去发现别的东西）。

比尔在理论和分析上的才能对于自己的生活虽然颇少影响，对于我讲来，他却是我学会怎样用功的主要动力。我在桑默维尔读中学的时候，比尔每逢不上学不跑铁路，便常回家来，并且花了许多时间指导我用功。我即便说出一个正确答案，他从不认为这就够了。“不错，可是为什么呢？”他总是锋利地询问。这件事同那件事有什么关系？这道作业习题的规律和意义是什么？遇到我答不上来，比尔就马上清清楚楚地把这个谜解开；就是他从前没有学过的问题，他只要花几分钟研究一下，便可以解答清楚，这一点使我经常感到敬佩。直到现在，每逢我在文字和音乐研究上遇到某些困难问题，打算“解开”里面所包含的规律，我就会想到这位哥哥和导师，自言自语地说，“我敢打赌，如果比尔在这兒，他一转眼就把这问题解决了。”

最鼓励我提起运动的兴趣的是我哥哥班。从任何标准来看，班都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如果他当年上的是第一流大学，我相信他一定会当选全美选手。他的球艺的确可以和我后来在大学对抗赛和职业足球赛中所看到的著名明星选手不相上下。班还是一名杰出的棒球选手，奔跑迅速，击球勇猛；如果当时的全国大赛允许黑人参加的话，我想班一定属于成功的一个。

在几个哥哥中間，班的年岁同我最相近，我最喜欢他。是他第一个把我帶到小鎮生活以外的世界里。我十四岁时正上中学，那年夏天，班在罗得島納拉根賽特碼頭找到一个餐厅堂倌的职务，那是个有錢人的避暑胜地，許多黑人学生都在那兒找假期工作。我跟着班一塊兒去了，当上厨房学徒。我的工作——我敢說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这么拼命干过——从早晨四点钟开始，一直干到深夜，才能擦完堆积如山的碗碟，削完馬鈴薯，作完大师傅、二师傅和他們手下人永远吩咐不完的工作；这些人可以对厨房学徒發号施令，他們很早就結束了工作，小学徒則还要最后打扫干淨，把一切东西都擦得淨光閃亮，摆置整齐。可是令人心安的是我的哥哥永远就在近旁，分出一半心神关照着厨房里的小弟弟，因为这个孩子被平生第一次工作弄得手忙脚乱、头昏腦脹，而又在其他大多老于世故的工人中显得天真老实。我后来上大学的时候，还时常回到納拉根賽特，在那兒同堂倌們、公共汽車司机們和厨房下手們一起工作，結交了許多一直維持到今天的朋友。在这些兼职的学生之中，湧現了許多著名的黑人專家，我到現在还时常在全国各地会到他們。

我姐姐瑪丽安在家的時間不如班那样多，但是每逢想到姐姐，心里就不由得微笑。她現在和丈夫威廉·福塞博士住在費城。如果說班繼承父業作了牧师，瑪丽安則保持住母亲家的教書傳統。她这位姑娘給家庭帶來呵呵大笑的福音，她永远是兴高采烈。每逢放假回家，她便負責作飯，然而她一口咬定，女人的工作不應該限定在任何

家庭的厨房里——至少不能長做——，她永远把那一大堆盘子留下来……給我洗！（我們見面時，一提起這件事便大笑不止。）

瑪麗安是個樂天派，却深深了解（比我們弟兄敏銳得多）一個黑人婦女在爭取尊嚴和達到我們所提倡的“生活方式”時所必須肩起的双重重擔，因此她一心一意地要自立生活，為自己打開一條出路。從年青姑娘時期起，她就在費城做學校教師，一直做到最近才退休。我每逢回想起她致力於所謂落后兒童的教育工作，並且熱心地證明，他們如果受到專心致志的照顧，也可以同其他的兒童齊頭並進，我便感到驕傲。

瑪麗安和班——兩個人在脾氣上很像我父親。講話嚴謹，性格堅強，堅持原則——永不自私地照顧他們的小弟弟，他對他們的感激是不能用言詞來表達的。然而他的心裏蘊藏着一首歌，一首最親切的歌——願意獻給他們！

我十七歲那年，已經到了中學最末一個學期，但腦筋里還未決定將來的職業。歌唱家？不，那只是說着玩而已。戲劇家？我哪里行！另一個令我躊躇了很久，但始終未能決定下來的想法是繼續讀書去做牧師；我父親大概很喜歡這個打算，却從來不加任何慫恿。等我進入大學以後也許可以對於將來的事業做一番決定吧！大學早就選定了——林肯大學，父親和比爾都是該校校友。

可是後來我在桑默維爾中學最高班時，聽說有一個新澤西州全體學生都可以參加的競賽考試；獎品是路特格學院的四年獎學金。路特格現在已是州立大學，學生已

达一万二千人，那时则不过是一家私立学校，学生还不到一千名。我对于这家学院还有几分了解，因为它就在新布倫斯威克，离家只有十五哩路。它是美国最早期的学院之一（创建于1766年），一向被認為是相当高級的学府，虽然曾接受过一兩名黑人入学，許多年以来，却很少黑人进入路特格学院。

爸爸說我應該参加考試，我們这一县的試場就在桑默威尔鎮的县政府大楼。我是滿喜欢上林肯大学的，然而如果我能够努力爭取到这笔獎学金，我父亲的低微收入所負担的經濟压力便可以減輕不少。不过有一件最头痛的事：我原本應該在头一年参加初試，初試的課目包括中学前三年所学的課程，不曉得什么緣故，我竟把初試错过了，因此，我所面对的考試是要在三个鐘头之內考整整四年的課程，而其他报考人只要在同一時間內考中学最末一年的課程。尽管吃了这么大亏，我还是認定这笔獎学金值得爭取，于是我就着手溫課准备过关了。多添了几項課程就必須多添几分努力，我每天晚上都是埋头苦幹，一直幹到深夜。同学和教师們的鼓励和校長艾克尔曼博士的惡意，都是催促我前进的力量；而且，最重要的是，爸爸默默不言的信心起了更大的作用。

好了，我考中了这笔獎学金——这是我一生的一个轉折点。我到路特格学院去上学的可能性，原是微乎其微，因为我一向相信，在林肯大学念書一定会更加高兴。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全在此处：从那一天起，我的心灵深处就确定了一种信念，美国的艾克尔曼們从此沒有一个人

能夠予以動搖的信念。黑白平等儘管仍被否認，但我深知我絕不是劣者。

獎學金考試過了不久，在1915年春天，我參加了在路特格學院舉行的全州中學學生的演講比賽。我是桑默維爾中學的演講冠軍，曾經孜孜不倦地研究我父親的演講藝術，全家和同學們都寄予很大期望，認為我有可能拿第一名。我並沒有拿到。一個來自艾斯柏瑞公園的黑人學生希拉馬爾·詹森獲得第一獎（他父親也是一位牧師）；第二名是一個白人女學生；我是第三名。

那一次我朗誦的是溫德爾·菲利浦斯（Wendell Phillips）關於杜桑·盧維杜爾^①的著名演講詞。我不記得當時為什麼選取這篇演講詞參加比賽（我猜大概是比爾哥哥的主意），但現在我才稱讚，這篇演講詞選得真是太好了，當時我既未真正体会到它的含義，也從未想到由一個黑人向多數是白人的聽眾朗誦這篇演講詞具有何等意義。我只是站在那裡，用盡我所能掌握的情緒和演說技巧，背誦着溫德爾·菲利浦斯對於白人優越思想的火辣辣的攻擊。他對於這位偉大的海地革命者的讚詞，是在南北戰爭頭一年，亦即釋奴運動開始以前，在紐約和波士頓發表的，並且向他的“藍眼睛薩克遜人、為你們的民族而自傲的薩克遜人”聽眾們挑戰，問他們有沒有“一名薩克遜後裔，其熾熱崇拜者願意給他戴上一頂桂冠，就像那些受苦受難的敵

① 杜桑·盧維杜爾（Toussaint L'Ouverture）是美洲黑人國家海地的民族英雄，他率領海地人民抗西抗法多年，最後為法將黎克勒誘騙，被送往巴黎，死於獄中。——譯者

人曾在这位黑人的头頂上所加戴的一样!”

下面就是滿腔熱血的杜桑對黑人的講詞，他曾經在所向披靡的起義隊伍中領導過這些黑人，拿破侖派遣了黎克勒將軍率領三萬士兵來征服他們。

“我的孩子們，法國派人奴役我們來了。上帝給了我們自由，法國人就沒有權利把它搶走。我們要把城市燒光，把糧食毀掉，用大砲把道路轟斷，把井水下毒，讓白種人看看他們到這兒來一手造成的地獄!”

(這話是多麼有力量!我當時却一股勁兒把心思用在怎樣把語氣、音調搞好，根本就沒有想到這些令人激動的詞句所包含的意義。)

不錯，這篇演講詞中也有溫和的一面，溫德爾·菲利浦斯向他的白人聽眾提到，杜桑·盧維杜爾不但饒恕了他當年的男女主人，而且仁慈地照顧他們晚年的生活；他手下的黑人將軍也莫不對當初奴役他們的主人表現了同樣的寬容大度。(菲利浦斯演講詞的印本上在此處註有“聽眾高聲喝采”字樣，我的聽眾對於這一思想或許也是愉快地接受了。)

然而，這位廢奴論演說家尖銳地點中了主題：在南方還受奴役，在北方還受輕視的黑人，無論在任何地方都是與白人平等的。“純正血統非洲人”杜桑不僅是世所週知的黑人最優秀人物，而且在全人類中也是舉世無雙的。我把全篇講詞朗誦到最後，終於到達雄壯而激昂的高潮——

用尽我的声音和手势講道：

“今天晚上你們覺得我是个狂热的人，那是因为你們不用眼睛、而用你們的偏見去閱讀历史。然而……历史之神一定会把卜西安代表希臘，布魯圖斯代表羅馬，汉普敦代表英国，拉法叶特代表法国，一定会选出华盛顿作为我們早期文明的光彩夺人的花朵，选出約翰·布朗作为我們中期的盛开的花朵，然后，她会在燦爛陽光里蘸湿她的笔，在蔚藍的天空中，在上述人士之上，写下这位战士、政治家、烈士的大名——杜桑·盧維杜尔。”

（如果我此生还参加演講比賽，我还願意再朗誦这篇講詞。）

溫德尔·菲利浦斯——好样兒的美国人！黑人解放运动的战士，我們偉大的佛莱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白人同志，全国無数城鎮的演說家——“講文学題目，收費一百塊錢；講奴隶制度，免費。”在那次演講中，我只对他那雷霆万鈞的詞句暗暗心折，可是我后来才逐漸懂得他在奴隶私有制被取消以后，参加劳工解放的斗争时所揭示的偉大真理：“在我寻找人民的先鋒的时候，我首先深入观察貴族社会的夢境，看看他們最畏惧什么事情。”

我在1915年秋天进入大学学习更多的拉丁文和希臘文、更多的物理和数学、更多的既不包括杜桑又不包括菲利浦斯的历史，还多玩点足球的时候，对于上述那些思想还一無所知。在我走出家門踏入社会之际，只有一件事

高于一切，我是我父亲的兒子，我是一个在美国的黑人。
这都是必須堅守的障地。

在本書随后各章中，我就不再提兒童时期以后的生活情形了，因为这不是撰写本書的目的。后面各章虽然也提到我后来的許多經歷，但本書主要是打算說明我对于一項远比任何私人經歷更为重要的問題所持的見解，這問題就是我的同胞爭取自由的斗争。我在路特格学院和哥倫比亞法学院畢業后所有的事情——我在美国及国外开始了艺术家的事業，我参加了社会生活，我現在所有的見解等等——在序言中所回忆的兒时情况里都可以找得到它們的根源。

第一章

我認定了我的立場

近年来,我的政治見解——或是被指为我的政治見解的——已經成为一般公众生活以及黑人生活中間广泛討論和爭論的話題。关于这件事情,自說自話的人真是太多了,我也應該有个机会来为自己辯解一下,那才显得公平合理;因此,我就在这里直接討論这个問題。我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想引起任何政治辯論,只不过是想把过去的历史交代明白,以正視听。我要設法清楚而准确地說明我的思想是什么,并且說明这些思想是怎样形成的。

开宗明义,我要指出,由于我的見解和行动而引起的爭論,其根源并不在于黑人同胞之間,而是来自那些討厭我、痛恨我、甚至恫吓我的上層白人。在这些来自上層的非难里,尽管有几次也夾杂着某些黑人的声音,可是黑人社会对于这一問題始終保持着自己的看法,那是再清楚也不过的事了。

有一种反应是深切不滿我对白人批評中的某些思想,这种反应表現在从最保守直到最激进的广大范围黑人的意見里。有人提到(而且翻来复去地提到),美国的好心好意的白人把财产和名誉給了保罗·罗伯遜,而他却显得忘恩負义,其实他不該再有什么抱怨的地方了;这

種意見不可避免地要把黑人推向錯誤的道路。他們知道，從來也沒有什麼東西是“給”我們的；而他們也知道，人類的尊嚴是不能用金錢來衡量的。已故的瓦爾特·懷特在“烏木”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里就表現了這一意見：

“沒有一個正直的美國人，不論是白人還是黑人，能夠隨便批評羅伯遜，除非他已經犧牲過時間、才能、金錢和名譽，盡一切力量來剷除種族上和經濟上的惡勢力，最使羅伯遜這類人深惡痛絕的惡勢力。”

不過，在黑人生活里，另外還有一種普遍的反應引起了很大的混亂，他們問道，我為什麼一定要說出或做出某些事情，而其結果只會自找麻煩；而且還有人覺得，那些針對我而來的攻擊，也會使許多其他的黑人受到池魚之殃。常有人問我：“保羅，在這歇斯底里時代里，你這樣直言無隱，合適嗎？”有人說，“你能不能給我們黑人做件大好事，你就埋頭做你的藝術家，不要再發表那些讓白人怒氣沖天的言論吧！”又有人說，“老兄，你到底在巴黎講了什麼，才惹出這麼大的亂子？”

我願意在本書中把這些問題全部解答清楚，而且從目前所發生的事情來看，我相信同胞們對我的了解一定會比前幾年增多了。最近，路易斯·阿姆斯特朗^①（Louis Armstrong）也痛斥虐待黑人了，而且比我使用的詞句

① 美國著名黑人音樂家。——譯者

还厉害得多,其他的黑人(包括傑克·罗濱遜^① [Jack Robinson],我發現他也在內,很高兴)对此事也都有反应,这真是謝天謝地,你瞧,“古老的方舟在动盪”這句話真兌現了!

我对于世界問題的基本見解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大多数人已經忘記了我过去的見解,有許多年青人也許根本沒有接触过。我第一次訪問苏联、并且傾訴我对于苏联人民的友情,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訪苏之前,我还对于非洲人民的生活和文化有过極大兴趣,并且深切关怀他們的解放。說实話,在“冷战”帶來一种不同的气氛之前,許多黑人認為我这些广泛的兴趣是相当值得称羨的;在1944 那年,我接受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斯宾戈恩獎章,我的“为全人类爭取自由”的活动,当时被誉为特殊貢獻。1943年,我在亞特蘭大城摩尔豪斯学院接受荣誉学位的时候^②,又有人提出同样意見。我在接受学位的演說中提到,“苏联各族人民的巨大进展最有力不过地証明了:不但所謂不适于从事复杂工業技术的农業人民拥有潛在能力,連那些所謂落后人民(他們曾經清楚地表現出同一切其他人民具有同样本領),也拥有潛在能力。”当时,大家听了这些話,並沒有一个人表示一絲一毫的惊異。

我們当然知道,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后,我們国家的政治气候發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然而,即便是在麦卡錫主义盛行的最恶劣时期里——这种主义目前似

① 美国著名黑人棒球運動員。——譯者

② 見附录乙,第138頁。

乎已成过去了，真令人高兴——我也认为我的信念不应该随同气候而变化。我从小就没有这种随波逐流的习惯，任何利诱、任何威胁也从不能迫使我放弃我的坚定信念。我回想起1936年在伦敦的时候，当时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汉密尔顿来看我，劝我回到美国，为阿尔夫·兰敦在黑人中间竞选，来和罗斯福总统对抗。我可以获得这样的报酬：作为一个演员，我在未来的好莱坞合同中和主演的影片中提出任何要求都行，因为电影公司大老板们都是忠心耿耿的共和党员，深恨白宫里面的那个人。我拒绝了这项买卖，直到今天，我还好笑，居然有人幻想我愿意週遊全国发表竞选演说，要求黑人去反对新政，而协助胡佛的政党重新掌权！我刚开始在纽约登台的时候，也曾拒绝了一名地位显赫的经理人向我提出的条件，他要同我签订一项待遇十分优厚的十年合同，而由他全盤管制我的社会生活。当时我的成熟思想固然不多，然而其中之一恰巧是一个坚强的信念：引导我的应该是我自己的良知，谁也不能用一条金锁链或任何其他东西拉着我到处奔跑。

在刚刚作演员的时候，我也有黑人演员当时的一般想法——戏剧或影片脚本的内容和形式对于我们无关重要，甚至全不重要。最要紧的是机不可失，我们同胞如果能够舞台上或影片中担任一个角色——任何角色，那机会可真是难能可贵了；对于一个黑人演员来说，如果还有人请你作主要演员——嘿，那简直是福星高照！后来我才逐渐明了，黑人艺术家不能仅从个人利益出发来衡

量這一問題，他的同胞既然對於舞台上和銀幕上歷來的黑人形象表示深惡痛絕，他就應該對同胞負責。我因此決定：如果好萊塢和百老匯的演出人不給我值得扮演的角色來演，我就不同意扮演任何其他的角色。戰時，我有機會在莎士比亞的一個主要作品^①里在美國觀眾面前出現的時候（距離我在倫敦初次扮演這角色已是十五年了），我滿懷興奮地聽說，我的同胞覺得——正如班哲明·梅斯博士所說的——我在“奧賽羅”一劇中為黑人民族和全世界提供了一項偉大的貢獻，這表明了黑人足可以在戲劇的領域中有偉大而不朽的演出，而不是只能作好萊塢和百老匯永遠限定給黑人的標準廉價表演。”

情況有了進步，今天，黑人演員的機會增多了。然而，他們要想在戲劇、電影、廣播和電視中爭得平等地位，還是一場艱苦的鬥爭。我滿懷高興和驕傲地看到，我們許許多多才多藝的青年演員、歌唱家和舞蹈家正在為正當的劇本、為值得他們的藝術天才演出的角色而鬥爭。多年之前，我拒絕在種族隔離的聽眾面前歌唱的時候，這消息乃是頭條新聞，而在今天，我高興地看到，許多人也採取了這種立場。近年來，如果一個著名黑人藝術家同意在種族隔離的情況下表演，那反而被認為是新聞了——在我的同胞來說，壞新聞。我們有充分權利為我們新興的和成長中的青年藝術家感到極大驕傲，我們必須在他們爭取平等機會的鬥爭中支持他們。他們在藝術中忠實

① 指奧賽羅。——譯者

表現我們同胞的崇高努力，使我們人人都有加以支持的責任。

还是后来在倫敦，在我和英倫三島人民生活在一起、并且遨遊了其他許多国家的那几年里，我对于世界問題的整个看法才逐漸形成。要想了解我为什么在黑人生活某些問題上和許多同代人意見不同，這項事实就是关键。

自从我在美国开始音乐会歌唱家和演員的事業以后，我和許多其他黑人表演家一样，首先出国表演。如果說，黑人艺术家在我們国内所能获得的机会到現在还非常有限，那么，三十年前的情况还要坏上几倍。經過多次往来旅行之后，我决定留在欧洲、住家倫敦了。想当年曾有几十万、几百万黑人逃出美国南部，在国内其他地方居住，我定居倫敦的原因也正和这些黑人相同。但也應該說，我在倫敦的日子还远比从密士失必逃到芝加哥的黑人所过的日子强得多。

別人曾經介紹过我在英国一帆風順所获得的成就，这不是本書要講的事情。我能够在戏剧和影片中获得重要地位，成为音乐会歌唱家和流行唱片艺术家，我当然由衷地感激。但更令我感动的是我在英国社会中所获得的友好欢迎。起初，欢迎我的主要是“高級社会”——提倡艺术并且經常是音乐会座上客的上層人士；我自己也發現多半是在最貴族的圈子中間来往。我在那兒被視作紳士和学者（按照旧式的說法，这在英国仍然具有意义）。我在路特格学院的学历和我在研究學問方面的兴趣所受到的重視，远远超过美国对这些問題的重視；而在美国，鈔票

要远比知識吃香，鑽書本的人如果不被人疑心为“顛复分子”，也会被人嘲笑成“笨蛋”。因此我覺得倫敦有一种令人鼓舞、气味相投的文化气氛，大有宾至如归之乐。而且，对一个美国黑人來說，英国全国各地各阶層人民無不守法的精神，也特別令人感到舒暢。对福巴斯^①这样的人，他們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在那愉快的日子里，如果有人向我提出意見，說我的家應該“搬回”黑白隔离的美国去，我一定以为他瘋了。回去——你說吧，究竟为的是什么呢？后来，我改变了在英国的生活基础，覺得自己和普通羣众更合得来，这就更加喜爱那个国家了，原想从此可以定居下去，頂多偶尔回美国旅行一次。

然而倫敦乃是大英帝国的中心，我在那兒得到了“發現”非洲的机会。這項發現对我此生大有影响，它清清楚楚地說明，我不能当一輩子归化的英国人；我这才考虑到我原本是一个非洲人。

就同許多在美国的非洲后裔一样，我对于我們本乡本土的情况所知極少，还是到了英国，才結識了許多非洲人。其中有几个人現在是世界聞名的人物——恩克魯瑪、阿齐克衛和被投入怯尼亞獄中的肯雅塔^②。这些非

① 1957年多，美国阿肯色州小石城發生州立中央中学拒絕黑人学生入校事件，坚持种族隔离政策最力的即为該州州長福巴斯。

——譯者

② 恩克魯瑪是加納共和国总理，阿齐克衛是尼日利亚东部总理，肯雅塔是怯尼亞非洲人联盟領袖，于1953年10月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投入獄中。——譯者

洲人大部分是學生，我和他們經常長談，並且參加他們在西非洲聯盟大廈所舉行的活動。不知因為什麼，他們也拿我當作他們中間的一分子；他們為我的成就而驕傲；他們還邀請羅伯遜夫人和我作該聯盟的榮譽會員。除了這些大部出自高貴世家的學生之外，我還逐漸認識了另外一個階級的非洲人——倫敦、利物浦和加的夫等港口的海員。他們也有自己的組織，並且教給我許許多多有關他們生活和他們各民族的知識。

我既是一個藝術家，對非洲首先關心的問題自然是文化。文化？非洲大陸的外國統治者堅持說，非洲簡直就沒有名副其實的文化。然而，歐洲音樂家和雕塑家早就因為發現了非洲藝術而大為騷動了。自從我滿懷興奮在倫敦東方語文學院投入研究非洲的工作以後，這才認識到，非洲文化的全世界的寶庫。那些把非洲各種語言誣蔑成過多的“野蠻方言”的人，當然永遠不能認識這些語言和用這些古老語言傳留下來的偉大哲學和詩篇是多麼豐富。

我曾經研究過許多非洲語言，到現在還在繼續研究，這里面有約路巴文、伊菲克文、邊寧文、阿散蒂文等等。我覺得，這些文字不僅由於我研究它而重要，就是對於我在國內的同胞也是重要的。因此，我在“旁觀者”雜誌（1934年6月15日）發表的“黑人文化”文章中表達了這一意見，這裡是其中兩段：

“看到象斯瓦希利這樣的語言是如此靈活自如、

精巧細致，就是用来表达孔子的学說也足足够用，我真是惊服之至；我因此立下一个心願，要利用黑人本身特有的优点，順着它的自然發展的路線，把黑人民族引导到更高的境界。人类学家虽然时常提到非洲語言，但西方世界的一般羣众却絲毫不了解非洲語言的优点和造詣，而且令人吃惊的是，連黑人自己也不了解。我在美国还遇見过一些黑人，他們相信非洲黑人要用手勢来表达思想，認為非洲黑人事实上几乎不能講話，只会使用手勢語！

“对于自己所承襲的黑人民族傳統的价值，其無知竟至如此，真是令人遺憾，荒謬絕倫，我第一件工作就是要消除这种愚昧無知……”

我自覺和我的非洲朋友融合在一起了，并且为 我剛剛接触到的这样丰富文化感到無比的驕傲。我了解到，在古希臘和古中国文化的崇高成就的旁边，还有非洲文化同它們鼎足而立，而这是劫掠非洲物資財宝的帝国主义强盜从未看到并且从不承認的。我这才看到了自己民族的文化的根源，尤其是我們的音乐的根源；在美国，我們的音乐仍然是最丰富和最健康的。学者們曾發現，非洲音乐对欧洲有过影响——由摩尔斯人傳到西班牙，傳到波斯、印度和中国，并且西漸到美洲各地。我这才了解到，非洲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間具有極显著的血緣关系（关于这一問題，我希望將來再写文章詳細說明）。

我为非洲而驕傲，經過學習，这种感情而且与日俱

增，它从內心里催促我公开发言，駁斥那些誣蔑非洲的人。我在“新政治家与民族”、“旁观者”等等杂志中，宣揚非洲文化名不虛傳但湮沒無聞的輝煌成就。我曾就这一問題同威尔斯(H.G.Wells)、拉斯基、尼赫魯等等人物以及学生、学者們，有过爭辯和討論。

說起来，我所进行的文化斗争是会發生一些作用的，而有关当局也早在我之前就已經看清了这一点。一天，有一名英国特务来找我，警告我注意我的活动的政治意义。因为問題的本身就显得很清楚：如果非洲文化真是像我坚持認为的那样子，过去所提的非洲人要再經一千年才能自治的說法，该怎么办呢？

一位非洲人把我对非洲的注意轉移到他在苏联所看到的一些事情上。他在訪問苏联时曾經到过东部，看到了当年被沙皇視为“落后民族”的雅庫特族的情况。他特別注意到，雅庫特族的氏族生活同他的东非洲同胞極為相似。如果一个类似雅庫特族的民族，也能掙脫殖民主义压迫的桎梏，成为社会主义建設的一部分，它将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好吧，我自己也去看看，在我1934年第一次訪問苏联时，我亲眼看到雅庫特族、烏茲別克族和所有过去被压迫的民族怎样从氏族社会一躍而为現代的工業經濟；怎样从文盲状态攀登上知識的高峯。他們的古老文化开出了新鮮而絢爛的花朵。他們的青年男女掌握了科学和艺术。一千年？哪里！不到二十年！

因此，通过了我对非洲的关怀，我才去參觀和研究苏

联的發展情况。我曾經一再提到，我終于找到了有色人民被視為平等种族、可以在街头安全自由来往的地方，真是兴奋万分。有些人在我以前就看到了这一事实，在我以后，也陸續有人亲眼看到。不久以前，我在“非洲美洲人报”上，看到北卡罗来納州农业技术学院农学院院长威廉·里德博士的一篇关于他最近訪問苏联的报告，他說：

“我沒有看到任何种族歧視的跡象。我觉得可以公平地說，种族歧視在苏联是不存在的。……我沒有看到住在苏联的有色人民和白人在待遇上有任何差別。他們在任何地方都不是种族隔离的；信教的人到同样的教堂去作礼拜；他們所上的学校也是相同的。”

真相就是如此。我不能想像会有任何黑人看見这种情形而不感觉高兴，我当年就万分高兴。因此我想，如果我把我的孩子送到苏联去念書，一定是件好事情，而他的确去那兒念了兩年小学。这件小事引起的麻煩可多了，但小保罗——他后来回到馬薩諸塞州春田城进高中，又在紐約康奈尔大学畢業——說，在莫斯科念書可真是了不起的經驗，教师好，玩伴好，而且学好了俄文——这对于別人会有什么妨碍呢？（显然妨碍了国务院，因为它就將此事列为不發給我护照的原因之一了！）

我这才相信，苏联——它是个佔地球陆地六分之一面积辽阔的大国——国内許多人民和种族的經驗，对于东方其他人民怎样追上近代世界的工作，具有重大价值。

今天，亞非兩洲有許多這樣的民族正在獲得自由，他們中間就有許多人（包括傑出的領袖們）提到，他們在蘇聯的成就和新中国的成就中汲取了許多極有價值的經驗。例如，在印度這樣的國家里，也有廣泛意見認為應該考慮採取某一種形式的社會主義，作為本國問題的可能答案。

我也覺得，蘇聯在世界事務中正在迅速發展的力量乃是幫助殖民地解放運動的一個重要因素；不久以前，全世界都看到了蘇聯怎樣堅強而有效地攔住西方帝國主義，不讓它們從解放了的埃及的手里奪回蘇伊士運河，這一看法的正確性由此可獲得充分證明。就在紐約這裡，在聯合國，我們人人都能親眼看見，在每一項提交討論的問題上，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總是投票支持世界各地的有色人民。有些人說，這不過是玩弄政治的手法；既然如此，如果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也玩弄一下政治，改為投票支持，豈不也會得到各地有色人民的稱讚嗎？

亞洲和非洲正在密切注意世界局勢的發展，決不會忽略任何事情。有影響的“西非洲先鋒報”在社評（1953年6月30日）中就曾這樣說過：

“我們對共產主義的了解並不多，只是聽到美英誹謗者極力向我們灌輸的說法，說那是宣傳……但是，從我們一天天看到的和體會到的事情來判斷，我們覺得所謂‘自由世界’和‘鐵幕’的說法，乃是欺騙、迷惑殖民地人民的偽裝。這是強權政治的主要組成部分，在我們能夠自由地選擇哪一種意識

形态最适合我們之前，我們拒絕被拉入强权政治。

“目前，我們要根据每个国家对待我們民族願望的善惡态度，来严格衡量这些国家。我們有充分理由感謝共产主义国家，因为它们積極关怀殖民地人民的命运，不断地譴責帝国主义的陰謀詭計。現在就輪到那些所謂‘自由’国家来設法使我們相信，它們是比共产主义国家更关怀我們的福利，在这件事情上，我們認為行动更重于言辞。”

聖經說，“你从他們的行动来了解他們”，有色人民的国家把这句多年真理做为指路南針，就决不会走錯道路。

我对于苏联的見解，我对苏联人民的热烈友情以及他們屢次对我表示的友好感情，被华盛顿官員和我国白人統治集团的發言人認為蛇蝎。甚至有人指称，我是某种“国际陰謀組織”的一分子。

事实是：我現在既沒有、而过去也从来不曾牽連到任何国际陰謀組織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組織里，而且从来不知道有任何一个人屬於这种組織。每一个人——尤其是黑人——都應該看得清楚，如果政府官員有一絲一毫能够支持这种罪名的証据，你可以用任何条件打賭，他們早就尽一切力量把我投入他們的監獄了！就因为这种指摘乃是漫天大謊，他們才拿不出这样的証据。我在法庭上始終坚持指出，他們就憑了專断和非法判決，竟拒絕發給我出国护照。在另一章里，我要詳細說明护照案所牽

涉的各种問題，可是我要在这里先講一句，拒絕發給我护照的作法，正好証明了国务院忽視民权自由的專橫态度。

1946年，我在国会委员会在加利福尼亞州举行的調查会上曾宣誓供証，我不是共产党員，但自此以后，我就拒絕再就此項事实重提供証或簽署上項口供。這項拒絕並沒有神秘之处。由于政治迫害逐漸扩大，这样的調查审詢显然牽涉到宪法权这一重要問題，后来被称为好萊塢十君子的电影編剧家和导演們就曾提出，任何調查者都無权破坏宪法修正案第一条中有关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条款。他們虽然在法庭上敗訴，并且被投入獄中，但自此以后，最高法院在类似案件上都作了比較开明的判決。話虽如此，最基本的問題依然沒有获得解决，我因此做照其他許多人的做法，定下一个原則，对于国会委员会或政府官員違犯了全体美国人的宪法权而提出的任何要求，我一概拒絕作答。

我曾多次公开表示，我服膺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各項原則，并且确信，对于全人类來說，社会主义社会所表現的是將生活提高到更高的程度——这种形式的社会，比起以“为私人利潤而生产”作基础的那种制度，無論在經經上、社会上、文化上和倫理上都要优越。历史証明，社会变化的进程和“陰謀詭計”的愚蠢提法毫無共同之处。人类社会的發展——从氏族社会到封建主义、到資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是由于人类需要和期望更好的生活而产生的。今天，我們看到亿万人民——世界人口的

大部分——或是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或是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而新解放的亞非国家也正在郑重考虑它們适宜于采納哪一种經濟制度的問題。它們中間有几位最傑出的領袖認為，只有通过社会主义的發展才是达到他們同胞的目标的最好道路，他們并且指出了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进展，作为立論根据。

我不打算在这里为我的政治見解进行辯解，而且，說老實話，哪一种社会对人类最好这样大的問題，也决不会通过辯論得出結論。空論不如實証，还是讓不同的社会制度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互爭高下吧，人民是能够自作抉擇的。我并不坚持要求別人都同意我的意見，因此，我觉得也沒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坚持我必須順从他的主張。这难道不公平嗎？

在我多年来的广泛交往中，只要遇到抱有不作順民思想或激进主張的人，我便毫不迟疑地同他們来往，自从我早年在美國戏院登台，在那兒首次遇到反对墨守成規的人以来，我便是如此做法。因此，时到今天，班哲明·戴維斯乃是我的一位好友，我并且始終願意这样称呼他；而多年以来，他是我国共产党的一位領袖。我認識班·戴維斯已經多年了：我敬佩他当年在亞特蘭大城作一名年青的律师的时候，曾經見义勇为，替一个被陷害的黑人青年进行辯护，終获胜訴；我敬佩他后来在做紐約市議員的时候，極力維護自己同胞的权益；我敬佩他在被关到監獄里的时候，还展开了打倒联邦監獄中黑白隔离制

度的法律的斗争。我怎能不对这样的人物抱有好感呢？

我坚决相信，班·戴維斯和他的同事被判有罪是不公正的，布萊克大法官和道格拉斯大法官所坚持的少数意見也正是如此^①；我認为，他們的少数意見在历史进程中終有一天会推翻原判。1896年，哈蘭大法官在“普里塞对福格森”一案中曾独自坚持少数意見，后来的發展也正是如此；該案在1954年終于在最高法院合議庭中一致通过推翻原判，判定臭名昭彰的“隔离但平等”原則为違宪，种族隔离的学校因此也屬非法。而事实上，已經有不少因史密斯法被定罪的人，通过了高一級的法庭而获得銷案。在一件上告到联邦法庭的案件里，威廉·哈斯泰法官是唯一反对判罪的少数意見；但在后来上訴到該庭的另一樁案件里，哈斯泰法官坚持民权自由的立場获得了多数意見的支持，該案所牽涉到的史密斯法受害者因此全部無罪。

攻击我的主要指責集中在我在1949年巴黎世界和平大会上發表的言論，他們故意歪曲和誤引我当时所說的話，用以攻击我不是一个忠誠的美国人。我是从英国到巴黎去的，就在动身的头天晚上，我在倫敦殖民地人民協調委员会开会，在座的还有南非洲印度人大会主席达杜博士。那次开会的情形和我在巴黎講話的內容，都包括在我被众議院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更正确的說法应是“非美委员会”！）于1956年6月12日傳訊时所發表的証

① 美国最高法院是合庭裁判，按照多数意見通过，少数意見可保留。——譯者

詞里面。(这离另外一个人——他当时既未在巴黎,又不知道我在巴黎講了些什么——被傳到該委員會,要他就所謂我的言論發表意見一事已达七年之久!)

关于那次倫敦會議和我第二天在巴黎所發表的言論,我的証詞如下:

“那次會議一共有来自殖民地世界各地的二千名學生參加,他們来自六亿到七亿之多的人民,而不是一千五百万人民。他們要求我在這次〔巴黎〕大會上發言,代表他們申述,他們不要戰爭。這就是我的演講的內容。我在巴黎的演講絲毫沒有提到一千五百万黑人要怎么做……但是現在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另外還有九亿有色人民已經告訴你們,他們决不〔和蘇聯打仗〕。這話不對嗎?印度的四亿人民和其他國家的亿万人民已經斬釘截鐵地告訴你們,有色人民不願為任何人犧牲,他們願為自己的獨立而犧牲。我們不是和一千五百万黑人打交道,我們是在和几亿有色人民打交道……但是,我的確曾附帶說道,我決不相信有哪一個人願意為伊斯特蘭^①這樣的人去打任何人,諸位先生,我現在還是這樣講。我認為美國人值得想一想,黑人是不是應該為虐待他們的人去打仗?”

① 伊斯特蘭是美國密士失必州參議員,在小石城事件中,堅持種族隔離政策,支持反動的阿肯色州州長福巴斯。——譯者

“應該做的事情，倒是美国政府應該深入密士失必去保护我的同胞。那才是應該做的事情。”

委员会主席华尔特，歧视种族的华尔特—麦卡倫移民法案(我在另一章中會談到这法案)起草人之一，不喜欢我的话，把主席木槌敲得梆梆作响，叫我停止發言。但是我意犹未尽，便繼續說下去：

“我在这兒为我的同胞在本国作为正式公民的权利而斗争。在密士失必——他們不是正式公民。在蒙哥馬利——他們也不是。这就是今天我到这兒来的原因……而你們則想禁止每一个为自己同胞的权利而进行斗争的黑人發言！”

在那次傳訊之后，黑人报纸上有許多評論对我在华盛顿所采取的立場表示同情的了解，我对此深为感动和感激。由于国内白人报纸只字不提黑人报纸关于这一問題的評論意見(这些白人报纸却从来不放過任何可以誹謗我的名譽，并且引述被利用的黑人对我进行的誹謗的机会)，我在这里將一些黑人报纸就我的供証所發表的評論摘录如下：

“非洲美洲人报”(巴尔的摩)，1956年6月23日：

“罗伯遜先生做得对

“如果他坚立在国会委员会面前，并且告訴委员会的委員們，全国各地的黑人在談到由于种族不同

而产生的隔离、权利不公和歧视的状态的时候說些什么，那末他在华盛顿所做的也就正是赤胆忠心的美国人，不論是白人和黑人，正在美国各地所做的事情。

“我們同意罗伯遜先生的話，〔該委员会的〕委員們最好把時間……用在傳訊那种非美分子，例如那些白人至上論者和專門出布告的人，他們曾經亲口宣誓遵守和尊重宪法，現在却要信誓旦旦地要誣蔑和推开宪法。”

“太陽一記者报”（旧金山），1956年6月23日：

“对于大部分黑人來說，罗伯遜無論是在美国，还是在全世界，在这个問題上都有他独特的立場。白种人就因为他在种族关系的問題上代表了美国的良知而痛恨和惧怕他。那些流汗謀生的黑人和一些知識分子則非常崇拜他。他說出了他們大家关于种族关系要說的話，他在發表这些言論时所采取的态度吸引了全世界报纸的注意。”

“夏綠蒂斯維尔—阿尔比馬尔論壇报”（弗吉尼亞），1956年6月22日：

“众議院非美活动調查委员会大失敗

“保罗·罗伯遜是一位偉大的艺术家，是一位極富同情心的人士。他並沒有因为自己的成就而忽視他的种族所受到的虐待……。剝夺他自由旅行、歌唱

和講演的权利；把他放到国会委员会的頸手枷^①里，并且曠使小流氓来欺侮他，对于美国在国外声望所起的作用，比他过去所發表的任何激烈言論都坏。”

“匹茲堡信使报”(宾夕法尼亞)，1956年7月7日：

“有人深恐他在黑人問題上在国外使美国难堪。这真是愚蠢透頂。全世界对于美国怎样对待它的黑种人民了若指掌。外国报纸在这些事情上所使用的篇幅有时比美国报纸还要多……。提尔事件、奧塞灵·露西事件以及其他类似事件乃是世所週知的事情。如果这些不幸的事实并没有引起紛紛議論，那么罗伯遜还有什么可講的呢？……不發他护照就是劫夺了他一生中一段最寶貴的光陰。”

“加利福尼亞呼声报”(奧克蘭)，1956年6月22日：

“罗伯遜具体地表现了不可遏止的和正义的憤怒，而憤怒已經冲破桎梏而爆發出来了。为了获得一百年前所保証的权利，这一局棋拖了近百年之久，他就代表了極不滿意这种故意拖延的憤怒情緒。

“罗伯遜的呼声是要求此时此地，在我們还活着的时候，就享有公平、快乐和自由，而不是在遙远的未来才实现，他的呼声……压倒了‘慢慢来’的諾言，而大声疾呼道：‘不行！現在就要！’

“他是一个敏感、痛苦的人，他是黑人的另一个自我，千千万万黑人在自衛时不承認的自我。他的抗

^① 古刑具，將罪犯的头和兩手挟在木板間示众。——譯者

議就是黑人的真正抗議……。在保羅·羅伯遜說：
‘我不認為一個黑人會為伊斯特蘭這樣的人去打仗’的時候，羅伯遜是正確的。”

這些報紙沒有一家不是左翼報紙，而且，在發表上面引述的評論時，其中幾家報紙還特地把這一事實交代得清清楚楚。“非洲美洲人報”就說，“我們並不是共產黨，而且也不走共產黨路綫。此外，我們對於羅伯遜先生的某些活動和言論也并不表示同意。”

我說，我是相當公正的；而且，在我感謝黑人報紙對我的基本立場表現的了解時，我還要指出這一點：我的同胞的報紙比起我們國家一般的報紙顯然民主得多！這個例子說明了黑人同胞充滿了志氣，而這種志氣在美國生活中偏偏是大為缺乏的。大家所關心的爭取自由運動就在國內進行着。凡是希望國與國之間獲致和平的美国人——我相信他們絕大多數都是如此期望——都來和我的同胞一起高唱我們的多年歌曲吧——

**我要把刀劍和盾牌放下，
放在河岸上……
我要把戰爭渾忘！**

1949年在巴黎的時候，我確信——這種信念後來而且與日俱深——除了瘋人之外，和蘇聯開戰，打第三次世界大戰，對於任何人都是不可思議的事。可以肯定地說，全世界有色人種大多數人都會明白表示他們渴望和平，

1955年在印度尼西亞万隆举行的偉大会議里，他們并且在一個政綱之下團結起來促進和平。戰爭對於亞非人民為什麼是不可思議的，万隆會議所通過的決議對此曾有清楚的說明：

“會議認為裁減軍備和禁止生產、試驗和使用核子和熱核子作戰武器，對於拯救人類和文明免受大規模毀滅的恐懼和前景是迫切需要的。它認為，在這裡開會的亞非國家，為了人類和文明，有責任宣佈它們支持裁軍和禁止這些武器，並呼喚主要有關國家和世界輿論來促進裁軍和禁止這些武器。”

我原本願意以觀察員資格參加那次歷史性集會，但因護照不能發下，我拍了一封賀電。（後來，國務院又以這封電報做借口，說這是不能允許我出國旅行的又一原因！）在給万隆會議的賀電里，象我在巴黎的演講一樣，我強調阻止另一次戰爭的迫切必要，並且指出了有色人民在維護和平事業中的直接利益。我是這樣寫的：

“協商和互相尊重是各國之間發展和平的第一要義。如果世界各國都採用亞非國家所建立的范例，就可以發展出另外一種辦法來代替實力政策，並且結束氫彈戰爭的威脅。如所週知，原子武器只會對亞洲人民使用過，因此亞非人民對於發展和平的工作具有直接利益。目前，還有人以再一次使用原子武器來威脅某一亞洲民族。

“我完全支持會議的阻止这种浩劫的宗旨，浩劫如一旦出現，將無可避免地使全世界人民都遭受苦难以至牺牲。在全世界範圍內，一切善良人民都应该为會議的促使亞非国家在世界和平事業中作出最大貢獻的目标而欢呼！”

我还指出，东方有色人民的會議对于西方有色人民也具有高度意义：

“听说万隆會議的召开是‘要考虑具有特殊意义的问题……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于美国的和加勒比羣島的黑人来说，这是一項好消息——極好極好的消息。我們黑人的著名週报‘紐約阿姆斯特丹新聞’在这一段話中表现了典型的黑人感情：‘美国黑人应当注意万隆會議的进展情况。我們曾进行同样的斗争达三百多年之久，因此會議的成果与我們具有密切关系。’”

我們的确具有“密切关系”，这是無人怀疑的，我們应当伸出双手，尽一切办法和正在升起的世界的大多数人民加强联系。至于我，現在如果有人問我在世界事務中支持什么观点，我就提出万隆會議的十項原則：

- 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則。
- 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領土完整。
- 三、承認一切种族的平等、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
- 四、不干預或干涉他国内政。

- 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衛的权利。
- 六、(子)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
(丑)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
- 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 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談判、調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的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爭端。
- 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
- 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我衷心支持这十項原則。以这个宣言为基础,我認定了我的立場。

第二章

“心有灵犀一点通”

我旅居国外住家倫敦十二年(1927—1939年)的經驗使我了解,不論我还要到什么地方去旅行,我的家园必須是美國。国会委員會在傳訊我時就曾提到這一點,我說,“到了俄國以後,我才第一次感覺到真正是個人——沒有在密士失必那樣的膚色歧視,沒有在華盛頓那樣的膚色歧視,”一位委員就怒火沖天地問道,“你為什麼不留在俄國呢?”

“因為我父親過去是個農奴!”我駁斥道,“因為我的同胞為建設這個國家送了命,我就要留在这里,这里有你的一份兒,也有我的一份兒。法西斯思想的人絕對不能把我從這兒趕出去。你聽明白了沒有?”

那麼,就讓我在這兒交代清楚,我是怎麼樣才会有這樣的認識吧。還是在英國——在那兒的英格蘭人、蘇格蘭人、威爾士人和愛爾蘭人之間——的時候,我了解到,一個國家的主要性質並不是由上層社會、而是由人民大眾來決定的,而且,一切國家的人民大眾在人類大家庭中都是情深義重的手足。英國固然有以劫掠殖民地人民為生的人,但也有千千万萬用真正的勞動來換取麵包的人。就在我越來越覺得自己在精神上是黑人——或者象我后

来所说的，自觉是非洲人——的同时，我还体会到，我逐渐和他们认识和亲近的白种劳动人民，同我都是一家人。

我时常在音乐会和别的场合里提到人类一家的信念，在我内心里，这种信念和我对于自己种族事业坚持不渝的感情是同时并存的。有些人认为两者之间大有矛盾：有些白人由于我用各国人民的言语歌唱各国歌曲，便拿我当“世界公民”看待，因此不时怀疑，我怎么会始终为有色人民坚强战斗；而在另一方面，黑人却又不能了解，我为什么总是对于在他们看来距离又远、又无关系的人民表示热烈的感情。不过，我自己并不认为我这些感情有什么矛盾；我在英国的时候就深切了解，全人类之间确实存在着血肉关系，这种关系乃是互相尊重、视同手足的根本基础。

使我认识这一观点的第一个启发来自歌曲，说来也并不奇怪，因为凡是能够历久不衰的歌曲，一定是人类感情最纯洁的表达。在我刚开始以音乐事业为职业的时候，我极其幸运地能和劳伦斯·勃朗(Lawrence Brown)合作；他是一位才华绝顶的黑人作曲家和编曲家，我们合作多年，在事业上成功的伙伴，在私交上是极好的朋友。是这位音乐家澄清了我的直觉认识，我在儿童时期每星期日在教堂以及每天在家庭和黑人社会中所听到的那些简单、美丽的歌曲——黑人牧师和教徒们唱的动人而充满诗意的佈道歌，同我父亲从北卡罗来纳州种植园跑出来的黑人们所唱的劳动歌曲和小调——应该成为歌唱表演中的重要材料。劳伦斯·勃朗虽然也会演奏其他

民族的民間音樂，以及西方歌曲文學的偉大古典歌曲（其中有許多是以民間題材做基礎的），却堅決認為，我們的歌曲——非洲和美洲演變下來的黑人音樂——乃是世界上偉大民間音樂的傳統^①。因此，在我初做歌唱家的頭五年中，我的歌唱節目全部是我的同胞的歌曲。

後來，我繼續學習其他民族的歌曲，在英國，英格蘭、威爾士和蓋爾^②民歌極其豐富，俯拾即是。我唱起這些動人的曲調，覺得它們也非常接近我的心靈，並且同樣表現了我在黑人音樂中所體會到的熱情洋溢的感情。在我之前，也有人曾經提到這種血肉關係，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在他的自傳里，回想起他當年做農奴時聽到的“又有快樂又有哀愁”的歌曲時寫道：“我雖然是個孩子，這些田野間的歌曲使得我精神沮喪。除了在心愛的古老愛爾蘭、在那餓殍遍野嗷嗷待哺的日子，我從未聽見過這般傷感的歌聲。”（道格拉斯曾在1847年訪問愛爾蘭）在蘇格蘭，麥殊麗·肯尼迪—法拉塞爾，一位現代專研究蓋爾民歌的著名權威人士，認為黑人歌曲是她本族同胞文化的直接產物。我在這裡暫不討論這種看法是否恰當，但不妨把肯尼迪—法拉塞爾女士在她的編著之一“喜布里底斯歌曲”^③一書的前言中所表示的見解介紹如下：

“在我執筆時，我正在美國的中西部進行一次簡

① 附錄四對這一問題作了學術性探討。

② 蓋爾人是蘇格蘭高原及愛爾蘭等地的人。——譯者

③ 喜布里底斯羣島在蘇格蘭旁邊。——譯者

短的訪問，由此認識到，德沃夏克在他的‘新世界交響曲’中使用了黑人曲調。凱爾特人^①和蘇格蘭、愛爾蘭一樣，在所謂美國黑人曲調中，並不是只盡了微不足道力量，在兩個世紀以前，喜布里底斯人的子弟們和其他人在一起，來到美國南部，成了種植園主，他們隨帶來了蓋爾人禱姆和凱爾特催眠曲。黑人不但學會了催眠曲，而且學會了蓋爾話。據說，有一個婦人從羣島上來到美國南部，當天不由得大吃一驚，因為她決想不到，會說蓋爾話的黑人身上的黑色，也就是太陽晒到他們同胞身上的黑色！”

話雖如此，我們大家都知道，單是欣賞另一個民族的艺术并不能將分割兩個民族的溝壑填平。喜歡非洲雕刻艺术的人，對於精心雕刻那些偉大作品的非洲人也會絲毫不關心；就在美國本國之內，也有很多人一邊欣賞——而且壟斷——黑人音樂，一邊完全輕視黑人音樂的創造人。在我來說，他們的民歌的纖麗使我在精神上靠近了歐洲的人民大眾；然而，還是現代歷史的不祥戰鼓聲才使我親身站到了他們中間。

我在國外居住的那幾年，正是法西斯主義的興起的時候：軍樂的鞑鞑聲和正步前進的長統皮靴的聲音淹沒了和平和友愛的歌聲。1933年，希特勒在德國抬頭，攫取了政權，“優秀民族”的叫囂聲作了其後大屠殺的開路先鋒。在意大利，一個自視為凱撒的人——他不穿羅馬單袍

^① 凱爾特語流行於威爾士、蘇格蘭高原和愛爾蘭。——譯者

而穿黑衫——开始創建帝国；1935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軍团进攻埃塞俄比亚，轟炸机和坦克击败了旧式火槍和長矛。在日内瓦，国联对于海尔·塞拉西^①要求制裁侵略者的絕望呼吁裝聒作哑，对于李維諾夫^②提出的“和平不可分割”的警告也同样充耳不聞。

到了第二年，于是輪到西班牙——法西斯卖国者佛朗哥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武力支持之下，进攻西班牙共和国。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次实彈演習：被飞机轟炸夷平的西班牙戈尔尼加村庄的瓦礫場，实际成了被毀灭的模型，这样的毀灭不久以后也降临鹿特丹、华沙、考文垂和斯大林格勒——最后，柏林本身的身上。西方大国眼看着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所受的苦痛，却显得平靜無事，無动于衷。那些拒絕投票制裁法西斯意大利的国家，反而对西班牙共和国实行了軍火禁运；納粹在德国針對着社会民主党员和共产党员、开明人士和工会領袖、犹太人和其他所謂“低級种族”展开了恐怖行动，这些国家也漠不关心。

在英国，在我时常以嘉宾身份被邀前往和某某爵士和夫人一道喝茶、交換笑臉的巨大乡村別墅里，也都是安謐如常。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嗯，他們也許真是一对“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粗鹵不堪，在交际往来上絕對不能令人接受；不过，上流社会的英国却对于这两名独裁者的所作所为表示相当高兴。無論如何，这一对納粹—法

① 埃塞俄比亚皇帝。——譯者

② 当时苏联外長。——譯者

西斯搭擋是根据“反共产国际协定”办事的，他們出头露面，是要把欧洲高門显第从“布尔什維主义”的威胁下拯救出来；而且，在德国和意大利，工人再也不会找什么麻煩了，去掉工会，生意就会大大發展。至于战争，你看，把捷克斯洛伐克奉送给希特勒的那一次慕尼黑会议处理得不是很好么，再说，如果纳粹真要进军，他們一定东进——那可一点都不坏啊，是不是？

然而，張伯倫高举的妥协之伞在英国并没有遮掩住人民大众在天空中所看到的凶兆，他們为了展开反法西斯的行动，到处动员。这一运动的核心是劳工力量——工会、合作社和左翼各政党——但全国人民其他广泛阶层也都参加了运动，里面有許多人来自中产阶级，还有艺术界、科学界和各种职业的人士。我是一个艺术家，因此我也被吸入了这个运动，我这才了解，反法西斯的斗争必须置于一切其他利益之上。

在我从欧洲大陆向为保卫西班牙而举行的伦敦示威大会发表的广播演说里，我解释了我的立场：

“每一个艺术家，每一个科学家，必须现在就决定自己的立场。他没有第二条路好走。他决不能在奥林匹克山峯上坐山观虎斗。世界上绝对没有大公无私的旁观者。在某些国家里，人类最伟大的文学遗产被毁坏了，优秀民族和优秀国家的谬论正在广事宣传，艺术家、科学家、作家因此面临着挑战。这项斗争侵入了我们各大学和其他学府的原属与世隔绝的

大樓。四面八方都是戰場，決沒有可資隱蔽的後方。”

我還認為，為爭取黑人權利而進行的鬥爭，乃是反法西斯鬥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說道：

“藝術家必須選擇，是為了爭取自由還是為了奴隸制度而戰鬥。我自己已經選定了。我沒有第二條路。目前時代歷史的特點就是我的同胞的地位日趨低落——他們的土地被強奪，他們的文​​化被摧毀，他們得不到法律的平等保護，他們的合法地位也被剝奪。

“我並不是由於盲目信仰和一時沖動，而是由於認清了自己的方向，才和你們站在同一立場上。我和你們並肩站在一起，堅持不渝地支持西班牙的合法政府，由西班牙兒女們正式、合法地選定的政府。”

我在1938年前往西班牙，這是我一生中一個主要轉折點。我在那里看到，在那次流血衝突中，是西班牙的勞動男女為了民主事業英勇地獻出了“他們最後的、全部生命”；而是那些上層階級——地主、銀行家和工業家——鬆開了法西斯野獸身上的繩索，讓牠們撲向自己的同胞。來自其他國家工人隊伍的志願兵，到西班牙參加史詩性的馬德里防衛戰，我在西班牙也拿出全部感情和精神，為“國際旅”的英勇戰士而歌唱。我在那兒會到“林肯營”的人——成千上萬的美​​國青年遠跨大洋，為另一個“民有、民治、民享和永不會從地球上消滅的政府”而戰鬥和牺

牲，我由此重新生出了一股热烈的思乡之感。我的内心对于这些白种美国人充满了爱慕，我在西班牙的“林肯营”队伍中也看到了黑人，更为自己的同胞感到无限骄傲。他们中间有一些人，例如奥利华·劳斯和密尔顿·赫尔恩敦都是志愿军中的牺牲者，而且和他们的白人同志们一同葬在西班牙土地里……长眠于远离祖国的地下。远离祖国吗？是的，远离美国，我自己的祖国，我当时深深知道，我有朝一日一定要回到那里去。

西班牙——这一次反法西斯斗争和我在斗争中所认识到的一切——促成我重回美国。我又在英国多留了一年，我越是深入参加工人运动，便越发体会到应该把自己的家庭安置在美国。我回想起一位曼彻斯特的朋友怎样加深了我对于人类一家的了解：他对我解释，我们两人是被历史和人类的苦难及希望的网联系到一起的，关系密切极了。他告诉我，他的父亲和祖父在英国那个大纺织中心的工厂里，过的是什么样艰难困苦的生活，他的前辈们所纺织的棉花又是怎样和远在美国出汗下力、种植棉花的劳动者——黑人农奴、我自己的同胞、我自己的父亲——联系到一起。在美国南北战争时，虽然联邦对南方的封锁切断了棉花的供应而为曼彻斯特工人带来了更大困难，虽然纱厂老板和他们的政府支持坚持奴隶制度的一方，曼彻斯特工人却支持主张废奴运动的一方。由此可见，这些力量在世界生活中具有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它们不仅表现了共同的利益，而且真正体现了国际上兄弟般的友谊。

曾經大力支持反法西斯运动的威尔士矿工們，在我为發动援助西班牙运动前往演唱时，对我極表欢迎，并且邀請我直入他們的工会大厦和他們的家庭。威尔士矿工們，以及我在英格蘭和苏格蘭各地遇到的其他工人們，都明白表示，在一般的对抗法西斯敌人、保衛民主的斗争之外，我們还有更进一層的关系。他們指出，这一項斗争的症結所在，还是由于阶级立場的不同，我虽然有名声有财产，而事实上我同他們一模一样，也是出身于工人阶级，因此，他們說，我和他們同属于工人队伍。

我自忖道，是啊，美国人也并非都是老闆，也有工人。如果我在这里英国劳动人民中間，找到了帶有兄弟情誼的手，我也一定能够在美国找到同样的手。而最重要的是，在山雨欲来的世界大危机中，我必須同黑人同胞站在一起，参加他們为追求正在到来的新世界而展开的斗争。我打定主意，要給他們帶回关于非洲的訊息，并且設法使他們和正在非洲进行斗争的他們同宗兄弟团結起来。作为艺术家和公民，作为一个黑人和工人的一个朋友，国内一定有許許多多我應該去做的事情。我在1939年回国了……

最近七年来，尽管我被切断了和国外朋友的直接联系，我却时常想到我在許多音乐会上歌唱的一首歌——“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歌詞中所表现的真理。通过信件，通过电话和电报，并且通过出国訪問的朋友們，我曾經接到全世界各地人民的許多措辞热烈、友好愉快的問候。国外

听众們曾經多次邀請我在音乐会、舞台上和影片上演出，我囿于环境無法接納，但我还是通过文字、通过录音和訪問紀錄影片，經常設法同他們保持联系。

在我前往加拿大(从美国去是不需要护照的)都被禁止的时候，最令人兴奋万分的是加拿大金屬矿工們在边界上举办了音乐会。1952年，加拿大采矿和冶金工会邀請我参加它們的年会，国务院攔住我不許我亲身到会，工人們就在和平門公园組織了一次音乐会，这地方正在华盛顿州和英屬哥倫比亞省的交界处。我終生都会紧記住1952年5月18日这次音乐会，三万名加拿大人从几十哩、几百哩的地方来听我歌唱，来表示他們的友誼，并且来抗議一切阻碍文化交流的障碍物。

在那边界地帶，这样的音乐会又一連举行了三年，直到后来，国务院終于被迫取消了禁止我前往不需要护照的地方的專断非法禁令。帶有兄弟情誼的手——是的，我在加拿大也找到了帶有这种感情的手。

就在几个星期之前——1957年的秋天——我获得了再一次为威尔士矿工們歌唱的难得經驗。他們举办了一个“詩人乐人大会”——威尔士人民傳統的文化节日——并且給我筹划好在長途电话里为他們歌唱。我真說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之下是多么感动，因为这些观众早就把我当做一家人看待，我虽然不能亲眼看到他們，在感情上却覺得再亲密不过了。沒过几天，我接到了南威尔士全国矿工工会的一封信，里面說：

“橫越大西洋的播音是一次巨大成功，这不仅是由大会的立場来看，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对于参加我們‘詩人乐人大会’的五千多听众發生了鼓舞作用。你如果能够看到偌大听众席上一致全神貫注傾听每一个音符和每一句歌詞，你就了解到威尔士人对你的感情是多么深厚，是多么希望你能够从現在加諸在你身上的枷鎖获得自由。

工会主席 佩恩特尔”

像这样的电话音乐会第一次是那一年年初安排妥当的，我在5月26日对倫敦的一千名听众歌唱，那次音乐会系由保罗·罗伯遜全国委员会的一次會議所發起，这个委员会是由英国一批名流組成的，但这些人的言論和活动在美国却沒沒無聞。由此可見，我們国家的一般“自由报纸”对于这一問題只采取單一路線，这些报纸之中，也包括了那个自詡为新聞網無远弗届、可以給它的讀者“一切值得登載的新聞”的“紐約时报”。因此，照此推測，像这类十几个国会議員作了該委员会發起人的新聞，以及許多其他知名之士——作家、学者、演員、律師、工会領袖、有爵位的人物等等——也参加了該运动的新聞，似乎都对美国人無益，因而完全不予登載了①。

在过去七年中，英国許多人士或是以私人名义，或是通过他們的各种团体，为我要求重新訪問他們的權利——其他很多国家的無数人士也是如此要求——在1956

① 見附录丁，第142頁。

年3月，一个全国性运动在曼徹斯特举行的一次會議上發起了。翻砂工人工会主席卡薩索拉在会上說：

“……我們在1956年在此开会，其目的是要求將一个小冊子^①發給一位高貴人士，这个小冊子里有他的照片，有承認他生来就是一个美国人的声明。这里乃是当年宪章議員为爭取自由选举而进行第一次斗争的地方，我們就在这兒發动一次为爭取一切人民都享有随时出国和随时回国权利的斗争。美国必須在臭名远揚全世界之前，重新实行当年离开英国、飄洋过海、寻求自由的‘五月花’移民^②所奉行的原則。”

我給那次會議打了一封电报，設法表示——其实沒有任何文字能够确切表示——我对进行这一工作的全体英国人民的衷心感謝，我說：

“我听说你們和全英国許許多多其他的人为我大声疾呼，为我要求自由旅行的权利，要求恢复我从差不多三十年前就已經开始的国际艺术家事業的权利，我深为感动。虽然我必須从遙远的地方表达此意，我敢說，我从沒有像今天这样感覺我同你們的关系是更加密切了。你們的友情的溫暖冲过了暫時將我們分开的障碍，并且使我重新激动地回想起当初

① 指美国护照。——譯者

② “五月花”移民是当年乘坐“五月花”号帆船第一批前往美国的英国移民。——譯者

和你們一起生活的那許多年歡樂的日子。”

在這封電報里，我回憶到我最後一次在曼徹斯特的情況，曼徹斯特人民當時曾動員起來支持我在美國的同胞的權利：

“我到現在還清清楚楚記得我在1949年最後一次訪問曼徹斯特的情況——你們在會場上歡迎的熱情——幾千人開大會支持我們在美國為拯救‘特蘭敦六青年’性命所展開的鬥爭。你們都知道，這場鬥爭是勝利了；這些被判在電椅中處死的黑人青年獲得了自由。曼徹斯特和其他英國城市的人民，以及許多國家的人民，在這次勝利中起了極大的作用。”

1957年春天，我聽說英國演員協會在倫敦舉行的年會中通過一項決議，贊成我前往英國，我高興萬分。下面就是倫敦“泰晤士報”關於這項決議報道中的一段。

“……蓋·維爾尼先生提出一項議案，建議大會支持正在進行的促使羅伯遜先生來此歌唱的努力。不論是英國劇院還是全世界劇院，都不應該坐視像羅伯遜先生這樣的天才為了一項‘毫不相干的原因’而浪費光陰……維爾尼先生說，就他所知，並沒有任何陰險的國際地下運動來發動這項議案，這不過是一羣藝術家的建議，以便他們可以聽到一位偉大的國際藝術家的演唱並且和他共事……這項綜合議案獲得通過。”

1957年5月4日，“曼徹斯特衛報”發表了下面報道：

“一件由二十七名議員簽署的信件申明，合作黨和英國演員協會參加了邀請羅伯遜先生到英國演唱、並且要求美國政府准他來英的運動。信件申明，因為他的政治見解——‘我們雖然不需要同意他的任何政治見解，我們卻認為這些見解與旅行自由和藝術自由問題毫無關係’——羅伯遜先生的政府認為應該不准他享有向千百萬希望他歌唱的英國人民演唱的權利。因此，自從他在自己國內被列入‘黑名單’以後，羅伯遜先生就被禁止執行他的職業了。本函簽署人認為，‘自由國家在任何重要關頭都不應該使用限制旅行自由的方法來阻撓人家的職業，因為聯合國人權宣言會莊嚴保證了旅行自由。’該信最後說道：‘像保羅·羅伯遜這樣傑出的藝術家、真正屬於全人类的藝術家遭遇到這一事件，豈不是更具重要性嗎？’”

最近我接到莎士比亞紀念劇院董事長格林·畢耶姆·蕭先生（曾獲大英帝國軍令勳爵）1957年10月16日的信，邀請我參加他們在斯特拉佛鎮^①舉行的1958年戲劇節。象這樣的邀請對於任何地方的戲劇工作人員都的確是極大光榮，但是，國務院能允許我去嗎？我當然還要像接到來自英國以外的國家的邀請——到歐洲大陸和其他地方

^① 斯特拉佛鎮是莎士比亞的故鄉。——譯者

演唱，在一部苏联影片中演出和其他类似的建議——时所采取的办法一样，再度向国务院申請护照。

在下章里，我要分析我的护照案件的各方面問題，但是，我願在这里講一講另一种經驗：尽管是阻碍重重，我还是設法多多少少进行一个国际艺术家的活动。

在欧洲的朋友正在进行一項重要的文化計劃——为世界工会联合会拍攝一部影片，他們要我为这部影片录音一首歌。这就是1954年夏天我所收到的一封信的主要内容。这封信很簡短，沒有談到任何細節。歌詞和歌譜倒是隨信寄来了，但是撰詞人和作曲人的姓名却沒有写明。歌詞是用德文写的，但須用英文来唱。各节独唱和合唱都必須按照規定的秒数不差分毫地唱完；而且唱时不能使用伴奏（毫無疑問，在配音完畢时，在我声音的“下边”一定配有乐队伴奏）。

这是一支爭取和平和自由的歌，一支歌唱各国劳动人民手足之情的歌——我当然願意唱好这支歌。

但是，怎么唱呢？我想起过去我在倫敦和好萊塢拍影片时唱歌录音的情形……裝有全部音响設備、構造精美、可防杂音的录音室，導演，他的助手，录音工程人員，帶着耳机的乐队指揮，陣容整齐的交响乐队，成批的技术人員和杂工，乱堆乱放的貴重設備——而我只要唱就是了！显然，現在的作法必須有些不同。現在我必須远在紐約为歐洲某地正在攝制的影片充任一名助理制片人。也好，就这么办吧……

制片人罗伯遜的第一項任务并不困难：他指示歌唱

家罗伯遜赶快練習这支歌。時間很短促，歌唱家可以先用德文歌詞練唱，唱到制片人找到人把它譯成英文时为止。那时，我自己已經沒有房子，为这支歌录音的“录音室”就設在我哥哥在哈萊姆区的家里——他做牧师那所教堂的牧师住宅。沒有多久，在他的書房中就可以听到我練唱的这支新歌了：

“密士失必河老人咆哮了，
搶走我們的牛羣，冲毀田地和河岸……”①

这是一支动人心弦的歌，歌頌六条偉大河流——密士失必河、恒河、尼罗河、長江、伏尔加河、亞馬孙河——和在这些河流兩岸肥沃的土地上辛勤劳动的人民；在德文歌詞里洋溢着美感和热情。但是英文歌詞是必需的。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作家劳埃德·布朗在我練唱时偶然来了，我把这个計劃告訴了他，問他是否願意帮忙把歌詞譯成英文。他同意了，因此不久就有英文歌詞可以練唱了：

“密士失必河老人咆哮了，
搶走我們的牛羣，冲毀田地和河岸……”②

好極了……歌唱家已經把歌詞和調子唱熟了，可是怎样录音呢，制片人先生？時間很短促，这是你自己講过的啊。

这又是一个問題了。大的唱片公司屬於大企業，它們

① 这一段原文是德文歌詞。——譯者

② 这一段原文是英文歌詞。——譯者

会断然拒绝出借录音室来做这种工作；而小公司又害怕出借。而且，最近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这些两耳最能接受麦卡锡的叫嚣而不愿意听一个和平歌唱者的歌声的录音技师们，曾经干过破坏的勾当。

我的儿子提供了办法。小保罗是个电机工程师，近年来他在录音工作方面已经相当内行了。他可以充当这项工作中的录音技师；他的轻便录音设备可以在牧师住宅内安装起来进行录音。

我们开始录音时，情况并不十分理想。家里的孩子可以叫他们保持安静（嘘！保罗叔叔正在录音呢！），电话可以把听筒拿下来，以防铃响，可是谁能保证外边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没有一辆出租汽车按一下喇叭，因而破坏了一些完整的录音呢？在这种情况下，制片人如果显露出一次为难的情绪，那是可以原谅的。但这一次他正忙于充当歌唱家，还要紧盯着站在房间另一端的儿子——他正紧皱眉头，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手里的手表，另一只手举过头部，以便在每节歌词必须停止时准确地发出讯号。

可不是，出租汽车的喇叭果然响了，一个小男孩大叫起来，一架飞机怒吼着飞过屋顶，因为一录再录，六条大河变成了六十条——可是，最后这件工作还是完成了。这些伟大的河流汇集到一条薄薄的录音磁带上，装在小盒里，寄过大西洋……

几个月后，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几份欧洲报纸的剪报，报道说，伟大的荷兰电影制片人约·伊文思已摄制成一部新的纪录片，名为“激流之歌”。评论家们说，这是“一

部傑作”，“一部永垂青史的作品”，“它歌頌人民，尊敬勞動而抨擊殖民主義”。評論家們把這部影片的樂曲描寫為“莊麗”，作曲人原來是……蕭斯塔科維奇！而那個“無名”的撰詞人竟是著名的德國作家貝托爾特·布萊希特。影片的說明是著名的法國小說家符拉狄米爾·波茲納所作，而畢加索正在畫一幅宣傳這部影片的招貼畫呢！

文化大師們，和平戰士們——我參加的是個多麼了不起的電影制片公司啊。我對他們給予我的邀請表示熱烈感謝；它使一個美國黑人得以與荷蘭人、蘇聯人、德國人、法國人和其他所有的人們，一道進行和平和解放事業的創造性工作。

一年之後我獲得了訪問加拿大的機會，我非常高興地在一間工會大廳里看到了這部把哈萊姆區一個家庭中的歌聲帶給全世界觀眾的影片。在許多國家中，千千萬萬的人已看過“激流之歌”，聽過用阿拉伯語、日語、波斯語、中國語、捷克語、斯洛伐克語、波蘭語、英語、俄語、法語和其他各種語言的說明；可是在美國的人民卻得不到這種機會。

但是我們知道，像這一類擁護和平的影片終有一天會再度被歡迎到我們的國家里來，而和平的歌唱者也必將終于獲得旅行國外的護照。沒有任何障礙可以擋得住這條萬眾一心的最強大的河流——目前正在全世界各地怒潮般高漲的人民爭取和平和自由的意志！

第三章

我們的旅行權利

我的護照案件不過是近年來提交到聯邦法庭的許許多多護照案件之一，這些案件認為，國務院護照局無權禁止這個或那個申請護照人旅行國外。每當華盛頓的官員自作主張，認定這種旅行“違反了美國最好的利益”，就拒絕發給護照。在這些開審的案件中，包括我自己的案件，牽涉到憲法問題部份，不久就將由最高法院裁決；但是我並不想在本書中討論這一問題的法律面貌。我也不打算在本書中從由於拒絕發給護照使我受到多大損失的觀點來討論這一問題。只要提出這一點就足夠了：雖然沒有任何一個人曾經指控我違反了任何法律，我却因不能夠接受人家向我提出來的演唱合同，而受到了千千萬萬元的金錢損失；此外，在過去七年中，為了打這場官司而花費的法律費用，也是極為龐大的。

我要在這裡提出的乃是旅行權利與黑人各種權利的關係的問題。國務院一定會告訴你，我極力要求黑人權利這一事實與這一案件並無絲毫關係；在某些人看來，由於在“冷戰”時期里也有白人同黑人一樣不能獲得護照，這一說法好像頗有道理。雖然如此，却有各樣證據——

無可爭辯的証据——显示出,我对于黑人权利的关注,确实是我这件案子的内在問題。

我的护照在1950年被沒收的时候(我从1922年起就領有护照),我在法庭上提出控訴;从一开始,黑人問題显然就是这一事件的癥結問題。上訴法庭于1952年2月开庭审訊,国务院在答辯中反对我所要求的旅行权利,辯詞里面就包括了下面这一段露骨的声明:

“……而且,即使上訴理由中提到(而事实上并未提到),护照之所以被吊銷系完全由于上訴人被公認为大部份美国黑人的發言人;而我們却要向庭上指出,鑒于上訴人坦白承認,他多年来为非洲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运动进行極为積極的政治活动,行为不軌乃是吊銷护照的最重要理由。”

国务院这种态度势必激怒每一个正直的美国人,因为我国(这个国家本身就是由反抗外国統治的殖民地大革命而誕生的)的傳統始終認为,一个政府只有在被管轄的人民的同意之下才能存在。对于黑人來說,国务院的見解显然还有更大的意义。我,一个美国黑人,既然被指控为从事非洲解放工作違反了“美国最好的利益”,并且被限制了活动,这就引起了一些極为重要的問題:在这項事件里,美国黑人的最好的利益是什么呢?我們能不能只反对南卡罗来納州的“白人至上”制度,而不反对南非洲同样的邪惡制度呢?

不錯,我曾为爭取非洲自由而活动了多年,不管国务

院或任何人的看法如何，我永远也不会停止这种活动。这是我的权利——作为一个黑人，一个美国人，一个人的权利！

我不仅反对用这种活动指我为“非美”的說法，而且还要指出：**那些反对要求非洲殖民地人民独立的人，才是真正的非美！**不管华盛顿任何官員怎样“决定”，我們从剧烈变动的現代世界大事里所看到的历史判决却是明察秋毫：那些坚持反对各国都有自由的势力，不仅是錯誤的——它們而且註定要最后失敗，遭人唾棄！我国在世界各国当中是强大有力的，但是，美国如果硬要为正在崩潰中的帝国主义制度負担一切后果，它就無法繼續生存下去。不管是誰的“最好的利益”从中作梗，殖民地人民——全世界的有色人民——势必获得自由和平等。

把我們国家的真实利益說成与殖民地独立积不相能，乃是絕對不正确的說法，大多数美国人，不論是白人还是黑人，都認識这一項事实。不錯，那些指揮我們政府的人竟然觉得有必要把他們对帝国主义的支持遮上保衛“自由世界”的幌子，这就証明，美国人民普遍都有民主眼光，相信各国应有独立性。

有許多美国人深深相信，我們的国务卿杜勒斯先生有許多篇声明和許多次行动違反了美国最好的利益（更不用提世界其他国家对此問題的几乎一致的輿論了）。既是如此，像这样一个人——他被恰如其分地称为“美国的錯向飞彈”，他的“战争边缘”政策震驚了人类——怎能讓他潜取裁判另一个公民的权力，而决定那个人的旅行是

不是符合“美国最好的利益”呢？尤其是对于黑人講来，沒有任何白种美国人，不論他为人好坏，地位高低，能够專断地判决什么符合、什么不符合黑人同胞最好的利益。

1955年，联邦法庭开庭审訊我的护照案，美国政府檢察官里奥·罗維尔在解釋国务院的立場时說，保罗·罗伯遜“到国外演唱旅行时，一再批評美国国内黑人所受到的待遇。”我說：这又怎么了？我在国内批評过那些待遇，在国外也是如此，我还要繼續批評到那些待遇获得改变为止。黑人旅行者应该怎样做才对呢——是一句話不說，还是为国内他的同胞的遭遇編一套謊話呢？我决不这样干！而且，既然不要求其他的美国人对他們利益攸关的事保持緘默或者說謊，我就坚决認為，加諸黑人身上的这种限制乃是不公平的、歧視的和不能容忍的。

我們政府訓令它的僱員在旅行国外时什么当講、什么不当講，也許是适当的；但是，以私人資格出国的人并不是国务院的僱工：相反地，国务院却應該是人民的僱工。因此，沒有一个華盛頓的官員拥有法律或道德的权利，来要求任何出国旅行的美国人，如果想領到护照，就必须拥护那个官員的見解。爱国主义——爱护自己的国家，坚守自己同胞的利益——豈能和那位被任命为国务卿的华尔街大公司屬下律師的看法、或那个被提拔到担任發护照工作的貪圖高官厚祿的人的見解等量齐观。一个坚守独立宣言和人权法案原則的人，在国外仍然坚守这些原則，就完全是一个爱国者，如果这种行为使国内某

某人感到“难堪”——哼，去他的吧！

但是，除去這項問題所牽涉到的一般原則以外，事實是，在國外把真相述說明白，曾經對在美國爭取黑人權利的鬥爭起了巨大作用。這樣作法始終符合我們**最好的**利益。然而，在進一步討論這一問題之前，我應當先就旅行權利同我的同胞爭取自由的鬥爭之間的关系，發表一些意見。

從我國黑人歷史的最初時期開始，黑人就維護行動自由的權利。成千上萬的黑人農奴，例如我自己的父親，就經過“地下鐵路”投奔北方的自由世界——不僅到了美國北部，而且遠入加拿大。在這些尋找自由的人之中，有許多人關懷留在南方飽受壓制的同胞，因此，他們和善良的白種美國人——廢奴運動的同道們——團結在一起，協助發展這種旅行。從奴隸私有制的時期起直到今天，**旅行**的觀念在我的同胞的思想里，一直和**自由**的觀念完全不能分割地聯繫在一起。因此，在我們的民間傳說里——在聖詩和民歌中——形容火車的詞句經常出現，並且總是把火車說成“駛向光榮”或“前往天國”。歌詞里也常提到船只，“郁山古船”和“古老方舟”會將我們渡過海洋，使我們獲得自由和拯救，就是例子。

有一些外逃的農奴去到外國，他們並不是只求自己獲得自由，而是要為他們的還在桎梏之下的骨肉求得解放。他們在國外成績卓著的工作，到現在還發生着作用，直到今天，自歐洲傳來的同情我們的壓力，還有一部份是早期為了爭取自由而僑居國外的人所發生的珍貴影響，

他們当年是为维护美国黑人的权利才远越重洋的。也有一些自由黑人前往国外述說真相，动員力量来支持他們的事業。其中一个人就是納桑尼尔·保罗牧师，紐約州阿尔巴尼市非洲人循道教会的牧师。他由一羣住在加拿大的黑人难民派到英国，發展反对奴隶制度的活动，并且为他們征集經費。他在1883年向国内的主張廢奴运动的报纸报道了他在那边的工作：

“在过去几个月中，我一直忙于週遊全国，發表演講，專講美国現存的奴隶制度，美国国内的自由有色人民所受到的待遇，以及在有色人民之間普遍發展教育和宗教工作的重要性。每逢我演說，听众总有兩三千名之多，講堂和教堂內座無虛席，成千成百的人無法入內。我始終不忘記从兩百万名奴隶来对山姆大叔进行他应得的批評；也从不忘記暴露美国人对于我們有色人民的殘酷偏見……这些事情使得此間人民大吃一惊。他們說，难道这就是共和国自由嗎？多謝老天爷，幸亏我們沒搞这一套。”^①

当时，爭取黑人入学权利的斗争集中在多数自由黑人居住的北方，就在保罗牧师还在英国的时候，康涅狄格州就發生了一樁当时的“奥塞灵·露西”案，一位名叫普魯当斯·克蘭黛尔的教友会妇女，由于允准一名黑人女

① 見阿普特克 (Herbert Aptheker) 編写的“美国黑人史料”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Negro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第139頁。本章其他历史資料也引自該書。

孩子进入她所負責的学校而被投入獄中。保罗牧师写信給判处克蘭黛尔的法官說，他要把这件案子当做“無上良机”，来暴露黑人在美国所受到的压迫。他跟着說：

“是的，閣下，英国人会知道，美国有人，而且是滿城的美国人，虽然并不是完全缺乏真正的英雄主义，却能够襲击一个無依無靠的妇女，晚間包圍她的住宅，打爛她的玻璃，而且把她送入監獄，其原因就是为了她采取背叛行动，教授黑人女学生讀書!!!”

另一位爭取自由的黑人鼓动家威廉·布朗在1849年从倫敦写信給溫达尔·菲利浦斯說：

“所以你看，我的朋友，我們虽然在美国享受不到公民权，虽然希望訪問外国时在國內拿不到护照，但在古老的英国，我們只要申請护照，他們就不敢拒絕發給。这里有一种普遍的情緒，由于美国人心硬無情，他們对美国人有点害怕。美国人既是在其他国家提倡自由，他們几时才能認識到也應該在本国实行自由呢？”

这問題在一个世紀以后的今天，有如雷鳴一般响徹了全世界：美国人既是在其他国家提倡自由，他們几时才能認識到也應該在本国实行自由呢？一切被“渐进主义”的吹嘘者所蒙混了的人應該仔細考虑一項事实，美国到現在依然有“心硬無情”的仇恨黑人的人，一百年的光陰并没有使他們軟化！由于這項事实，我們就可以引申出

另外一項批評。那時，黑人雖然不能拿到旅行國外的護照，但在法律上並沒有規定出國旅行一定需要護照，因此，他們就能夠將他們的案件訴諸世界輿論，那些否決他們行動的美國頑固官員就無法從中作梗。從這方面來看，我國在1957年顯然還不及1847年來得民主。

話雖如此，在廢奴運動鬥爭時期，在國外宣揚真相的黑人依然受到國內高等白人的痛罵。美國報紙在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週遊歐洲發動反對奴隸制度輿論的時候，稱他為“油嘴滑舌的無賴”，而且說他跑到外國去反對美國的国家制度和人民。道格拉斯蔑視地駁道：

“我一字一句也沒有反對美國的国家制度以及美國的人民，因此我否認這種指責。我必須大聲疾呼的是反對奴隸制度和奴隸主。我要讓奴隸主感覺到，他在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都得不到同情；他在加拿大、在墨西哥、在窮困流浪的印地安人中間都得不到同情；文明世界，對，還有野蠻世界的呼聲，都是反對他的。【道格拉斯兄弟真是要打動每一個人啊！】我要使四面八方的譴責都集中在他身上，直到他由於羞愧難當、狼狽不堪而致目瞪口呆手足無措。他要被迫打開他的受害者身上的桎梏，將他們失去多年的權利重新歸還他們。”

對於道格拉斯這位潛逃的農奴，黑人廢奴運動的一位最偉大的領袖，曾有人提出在英國安置他和他的全家，有房子、有土地還有優渥的生活條件，但是他馬上回絕

了。在他那篇有名的向英国人民告别的演说里，他说明了他为什么启程返美：

“我这次回美国，并不是为了安坐不动、一言不发去享受清福……我极愿展开斗争，唯有斗争，我将来才有为胜利而欢呼的机会。我知道胜利是必然的。我是放弃了可以在这里得到的安乐和地位而走的，……可是，为了我的骨肉，我必须回去。我要和他们一起受苦，一起劳动；一起忍受欺凌；一起饱受摧残；我要为他们大声疾呼；为他们的要求发言和写作；在他们的队伍中为还没有成功的解放事业一起斗争。”

道格拉斯的这种战斗精神到现在还贯穿在我的同胞的精神里，但是自从他那时代以后，我们看到有一些黑人领袖认为，到国外旅行时最好还是向人表示，自己的同胞在国内外一切都好。在“美国生活方式”的第一批黑人信徒里，有一个就是布克·华盛顿，他打算既满足自己的同胞的需要，又符合压迫他们的人的利益。然而，在1910年华盛顿先生前往英国赞扬他的同胞在美国所受到的待遇时，有一批著名的黑人教育家、医生、律师、牧师和编辑共同签署了一封给欧洲人民的公开信，揭穿了他的谎言，并且说明了黑人在国内继续受压迫的苦况：

“【信内称】针对着这种显明的趋势，坚强勇敢的美国人，包括白人和黑人，正在展开斗争；但是在

他們要求承認人格的運動里，他們需要，非常需要英國和歐洲的道義支持……對於一個每天在美國受到欺侮、輕視，却力稱一切都好的人，這種支持無異於當面打了他一巴掌。”

在這個歷史文件上簽名的，杜波依斯、威廉·特洛特爾、亞歷山大·沃特爾斯牧師、馬克斯·巴爾伯爾和艾契鮑爾·葛瑞姆基都在內。此外，還有我的姨父弗蘭西斯——費城道格拉斯醫院醫務主任莫塞爾醫生。故莫塞爾醫生是我母親的妹妹吉爾特洛的丈夫，他在生前一直是我的摯友，對我多所鼓勵。

對於黑人藝術家，以及對於黑人發言人來說，“英國和歐洲的道義支持”一向具有極大的重要性，而且，旅行權利對於黑人藝術家確實具有迫切的必要性。一個世紀以前，一個黑人演員無論扮演什麼角色都不能在美國舞台上登場——就連扮演個滑稽演員都不行（就是當年在塗黑臉唱黑人歌的巡迴劇團中，這種角色也是“專限白人”，直到那個時代的末期，也不過“進步”到准許黑人在美國戲院裡扮演一個塗黑臉裝死的滑稽角色）。因此，有一位在戲劇歷史上最偉大的演員從來沒有在我們的舞台上出現的機會——他就是伊拉·阿爾德里奇（Ira Aldridge），一位黑人。他在英國和歐洲其他地方聲望極高，被認為是歷來最傑出的莎士比亞戲劇的演員，美國人對他卻毫無所知。阿爾德里奇在1807年左右生於紐約，是一位長老會牧師的兒子，畢業於格拉斯哥大學。1930年為我在

倫敦扮演奧賽羅而打開的那扇門，也曾在1830年為阿爾德里奇打開，那時，他在倫敦的皇家戲院扮演這一角色。阿爾德里奇偕同著名的莎士比亞戲劇藝術家愛德蒙·凱恩——扮演埃古，^①在歐洲大陸各地——法國、普魯士、瑞典和波蘭也受到熱烈歡迎，他在1867年死於波蘭。

還有許多黑人演員、歌唱家和舞蹈家由於行使了旅行的權利，在藝術上獲得了一席之地，我就無須一一提名了——他們的姓名幾乎就是黑人藝術成就的名冊。在這些藝術家當中，有幾位根據自己的權利決定留在外國——這裡只舉幾個例子：約瑟芬·貝克（Josephine Baker）留在法國，威蘭·路德（Wayland Rudd）留在蘇聯，端納·雷頓（Turner Layton）留在英國。

任何思想公正的美國人都應該認識清楚，在我國全部歷史里和在今天，旅行權利對於黑人藝術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由此看來，現在先要求他閉口不談他的同胞的生活情況，才給予他以演出和維持生計的機會，豈能說是公平？

即將訪問蘇聯的偉大音樂家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由於小石城事件而感情激動地問道：“如果人家問起我，我的國家是怎麼了，我該怎麼說才好呢？”

那麼，我就這麼回答：“講你心里的真話，阿姆斯特朗兄弟，就跟你在哈萊姆區街頭巷尾所講的話一樣。”我們全體黑人也應該告訴他：“如果他們因為你講了真心話而

^① 在“奧賽羅”劇中，埃古是奧賽羅的旗官。——譯者

迫害你，我們一定保衛你。我們一定要掀起一場讓那些思想狹窄、充滿偏見的華盛頓官僚不敢沒收你的護照的風暴！”

的確，我們在杜波依斯被拒絕發給護照的案件上，未曾熱烈響應聲援，豈非錯誤？豈不感到慚愧？杜波依斯的言行和工作的聲譽以及他的才能是無與倫比的，他是我們中間的第一流學者和哲人。他是今天我們自由運動之父。杜波依斯博士智慧過人、人品端正、博愛無私，他不僅是黑人生活中的傑出人才，而且是我們這一世紀里真正偉大的美國人中間的一個。

由此可見，位居高官的小人物們竟然敢說這樣的人物沒有資格領取護照，說他不能到熟知他並且尊敬他的國度去旅行，這是多么荒謬的罪惡！然而，這樣的事畢竟真正出現了。只是幾年以前，統治這個國家的既不開明又無原則的白種人因為杜波依斯敢于堅持世界和平事業，就把他加上手銬帶到法院，以“外國間諜”的罪名來控告他，這個故入人罪的案件終告失敗，杜波依斯獲得自由。但是，他也就從此不能自由旅行了。

杜波依斯博士被邀參加加納獨立的典禮，國務院不許他前往；然而，在所有出國參加加納慶典的美國人里，沒有一個人像杜波依斯那樣值得到場。他曾致力於非洲和平事業達四十餘年之久，他的著作首先提出了非洲同現代世界的關係。他是泛非洲運動的奠基人和設計人，在他被荊斬棘領導之下，第一屆泛非洲會議才得以在1919年于巴黎舉行。第五屆泛非洲會議于1945年在英國曼徹

斯特举行时，杜波依斯亲任主席。参加那次会议的有恩克魯瑪，他后来做了自由加納的第一任总理，有肯雅塔，还有来自非洲每一个角落，来自西印度羣島、英屬圭亞那、英屬洪都拉斯、巴西和美国的二百多名其他領袖。

老实講，杜波依斯博士的旅行不仅符合美国人民最好的利益，而且符合世界人民最好的利益。在这位偉大的人道主义者、导师和領袖沒有获得旅行自由以前，我們怎能沉默，我們怎能心安呢？

享有正式公民的权利，乃是我們合情合理的要求，我們必須像自由民一样，享有講話和行动的权利。我們在批評黑人在美国所受到的待遇，并且向国内同胞、国外人民述說我們国家有什么毛病的时候，我們每一个人 都可以引用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这句话：

“我在这样做的时候，觉得我是在尽一个真正爱国者所应尽的义务；因为凡是痛斥和不肯寬恕自己国家錯誤的人，正是一个爱护国家的人。”

第四章

时机到了

在我看来，在美国的黑人同胞所面对的挑战可以用两个命题来说明：

一、此时此地，我们可以获得自由：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争取宪法所规定的正式公民权——现在是可以达到的。

二、我们有力量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自己的行动将是决定力量。

国内有许多人坚决反对或深切怀疑这两项意见，而且，在我们当前的危机里，他们用行动或袖手旁观的态度来表示了反对和怀疑。让我先谈一谈第一个命题吧。

那些公开以我们敌人的面貌出现的人——“白人至上”神话的公开拥护者——曾经直截了当地就这一问题申明了他们的立场：种族隔离制度现在既不能废除，而且永远不能废除。在最高法院裁定学校实行种族隔离制度为非法后，过了十天，这一集团的主要发言人伊斯特兰在参议院宣称：“我要把话讲清楚，南方还要保持隔离制度。”为了表示他们对这一观点的力量，另外有从南方来的一百名参议员和众议员签署了一项宣言，谴责最高法

院的裁决,并且声称要反对裁决的实施。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些荒唐的话怎样变成了荒唐的行动。

还有一些自称我们的朋友的人,认为不可能立刻实现我们的法律权利。他们说,我们必须等待,直等到那些迫害我们的人心肠变软——直等到黑白隔离制度无疾而终。这种思想名为“渐进主义”。据说,美国黑人如要获得祈求中的民主,这才是现实而积极的办法。然而,这种思想的本身实际就是种族歧视的另一种形式:就在我们的社会里,竟准许违法乱纪的人可以无限期地违犯法律。在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我们的正式公民权的法律保证)里,没有一字一句说到,宪法关于黑人部份可以“渐进”实行。

“渐进主义”是一条漫无止境的长路。回顾过去,它一直往回延伸了长得令人厌倦的一百年;再望前瞻,它毫无终点可言。早在黑人解放运动获得胜利以前,我们的同胞就了解,将来可以自由的诺言是不可靠的,从奴隶制度时代起,群众的认识就转化成这首歌里的辛酸幽默:

我的老主人答应过我等他死时就让我自由,他长命得连头也秃光还没有一点要死的样。

后来,奴隶私有制终于废除了——不是渐进,而是一下子就废除了。奴隶主们绝不会接受开明思想,他们的腐朽制度受到压倒力量的反对,他们就是被这种力量摧毁的。人们并不是要求他们一分一毫地放弃他们的亿万元奴隶财产;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一下子就把它全部拿

走了。

我們有一些“最好的朋友”乃是真正的敌人，“渐进主义”不过是遮掩他們双重面孔的一个面具。但是，也有一些用意善良的白人开明分子和各方面的黑人發言人衷心相信，有色人民的前进只能逐步进行，不能强求进步，对反动分子的压力不該过大，必須再等五年或十年，甚至几辈子，才能把坏事变成好事，把我們的“民錯”变成“民权”。我的同胞也有許多人看着像密士失必州这样的地方而憂愁地搖頭，認為要过很多很多年才能有真正的变化出現：白人大亨过于自行其是，他們是积重难返了。

这种必須逐漸进展的見解是有其根源的，这种根源認為，黑人与白人不同，民主权利并不是不可去掉的，也并不是自然应有的。我們的二等公民地位，如果能有任何进展，都要視為仁慈和寬大。黑人必須寄望于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的善意，希望善意的劝說有朝一日多少能够使盲目的偏見重新看到光明。

在政府和全国各地社会的上層人士里，这种看法最为显著。高高在上的人当然容易采取一种若無其事的冷淡見解，叫那些深受压迫的人好好約束自己，靜待公道正义出現。可是，上帝知道，我的同胞早就忍气吞声忍受多年了，他們具有人类的美德，仁慈厚道，寬宏大量，这是很少人有的。正如“紐約时报”所說：“我們看到世界其他地方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动乱历史，就應該感謝在美国的黑人所表現的令人吃惊的溫和易与。”

可是忍耐也有到头的时候——如果我們有一些人比

別人先忍耐不住了，這在今天也無關緊要。事實很簡單，許許多多的黑人就想到這兩個字：**現在**；我相信並且願意證明，**現在**就享受平等權利的目標是能夠達到的。

有人曾經說過但許多人忘記了這句話，到了1963年，黑人解放宣言百週年時，就一定獲得充分自由。噫，我到現在還相信它。到1963年，我們就可以切切實實地歡慶，國內每一城、每一縣和每一州的每一個黑人都獲得正式公民權利，是真正的慶祝，而不是紙上空談。在1963年，從密士失必州來的一位黑人政治家可以坐在現在被伊斯特蘭沾污的參議院議席上，就像當年黑人參議員希拉姆·里夫斯一度替換了叛徒賈夫·戴維斯的情形一樣，我敢說，黑白隔離制度——連同“漸進主義”——都要被深深埋葬而無法復起，而且這件事情現在就可以做到，在我們自己的時代里就可以做到！

這種事情是不是夢想、幻想，“不會在這兒出現”呢？為了尋找答案，讓我們把我們的眼睛睜大看看四周的世界吧；讓我們看看我們時代的現實，看看**改變了的局勢**吧，它表示時間已經成熟，時機已在掌握中了！

改變了的局勢是這樣的：**由於國內和國外情勢的發展，毫不延緩地准予黑人同胞享有民主權利這件事已經成了當務之急。**自從佛萊德里克·道格拉斯指出：“我國白人和黑人之間的關係乃是當前的中心問題”之後，一個世紀已經過去了，自從杜波依斯博士宣稱“二十世紀的問題乃是膚色界線”以後，也有半個世紀已經過去了。今天我們看到，這些宣言所包含的預見性真理已經發展了一

千倍，而且現在已經到了这个时代問題和本世紀难题必須解决的时候。

今天，事情摆得很明显，黑人权利的問題乃是我們国家生活的中心問題。“展望”雜誌的編輯們認為這一問題“是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后最大的法律、政治和感情危机”，这是一个典型的評論；“紐約时报”的評論也很典型，它說，“我国正面对着一个对內部团结和世界领导权具有深刻意义的社会革命。”然而，在报纸和广播中，以及在演講台、講道壇和會議桌上有关这一問題的討論，却很少接触到內中的基本因素。

我們国家危机并不仅是一个“內部团结”問題。事实是这样的，如果还把黑人限为二等公民，美国的宪法政府就無法維持下去。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事非得已的情况下被迫承認，小石城福巴斯的挑畔使我們政府的組織都受到了威胁；而且，自从重建时期以来，出动联邦军队去执行宪法，也以这为第一次。但是，政府和它所代表的統治集团到現在还没有被迫承認另一項更基本的問題：在种族歧视的美国，民主是無法存在的。政府發言人向“白人至上”主义者呼吁，要他們“在坚持偏見的同时也要記得美国”，就反映出那些还希望矛盾的兩方面能够同时存在的人也是一向盲目無知。

我要指出，許多人認為問題的癥結在于私人的偏見，这乃是大錯而特錯的看法。在一場棒球賽里，裁判員的裁決也許是根据他腦筋中的某些偏見而来的；但是写明黑人与白人一起打棒球就是犯罪行为的州定法律已經編

纂成書了。否認南方——而且不仅是南方！——千千万万黑人有平等权利的黑白隔离法律和慣例，并不是私人感情和个人情緒：它們是蹂躪和廢棄美国宪法的合法和非合法势力所制定的一种制度。

我們知道，这种情形早已存在多年了，那么就难免有人問：它为什么不能像以往一样，今后再維持多年呢？在我們的国家生活里，有沒有什么迫不及待的因素要求現在就要改变呢？

答案是：佔压倒多数的美国人的利益要求解决黑人問題。这并不仅是公平对待少数民族的問題：它是一个对全体国民都关重要的問題。当年在林肯时代，美国多数人的基本利益要求必須打倒黑奴制度，今天也正是如此，他們的利益也要求必須取消把黑人当作二等公民的制度。

事情越来越明显，我国社会进步——对劳工、对教育、对公众健康和福利——的最大阻碍就是坚决反对黑人享有平等权利的那个集团。在南方宣言上签字反对禁止种族隔离的一百名国會議員不仅是黑人少数民族的敌人，他們乃是反对全体人民的巨大反动力量。他們靠着褫夺黑人选举权而位居要津，憑着少数白人的选票一而再、再而三地当选連任，这些無法無天的南方議員就成了整个国家的立法者。他們所倡导的“白人至上”論調，并没有提高白人企業工人或穷苦的白人农民的地位，他們反而对几乎榨干了南方富源資財的經濟措施大加助力，使得南方比全国其他地方更为困苦。

坚持“州权”、反对黑人权利的人，同时又是反对工会权利的所谓“合法工作”法律的支持者。那些破坏罗斯福“新政”成就的反动法律——反劳工的塔夫特—哈特莱法案，反外籍人民的华尔特—麦卡伦法案，管制思想的史密斯法案——都获得了国会南方议员的强力支持。在他们的政治力量瓦解以前，不论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任何地方的老百姓都不会获得真正的社会或经济进步。真的，如果这样的政治毒瘤不从公众生活中割掉，其结果就很明显，不但一定不会有进步，而且一定还会进一步地恶化。

全国的注意力现在都集中于那些反对最高法院裁决种族隔离学校为非法的人，看看他们的言行如何。曾经把种族隔离当作“当地习惯”而对此长期忍受的全国良知，决不能够而且决不允许黑白隔离制度的拥护者使用暴力和无政府手段来代替宪政政府。目前的冲突主要在于学校方面，但是南方宣言的签名人看得不错，他们认为最高法院的裁决对于“白人至上”论的“习惯、风俗、传统和生活方式”都发生威胁。如果这种“隔离但平等”的邪恶理论在公众学校问题上就被打垮了，它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还怎能说合法呢？

隔离制度必须取消：这是大势所趋、已成定局的事了。白人公民委员会也许会煽动暴力反抗，南方参议员和州长们也许会对于新的重建工作大罵大叫，总统也许会有另外一种看法——但美国人民的广大群众，不管是漠不关心的和不冷不热的人，还是极为激进的人，都不会

为了反对將民主傳統給予黑人同胞，反而放棄自己的民主傳統。

我們当然知道，具有民主思想的广大羣众，其行动是迟緩的，而且种族歧視的毒藥已經在我們国家生活的各方面侵蝕得很深。联邦政府的作法同南方州政府的作法並沒有太大差別：因为它也是一个白人政府。在大权在握的參議院里，連一名黑人議員都沒有，在众議院四百三十五名議員中，也只有三名是黑人。南方議員們如果得不到来自全国其他地区的議員們的支持，也不能击败或削弱有关民权的立法。在下一章里，我还要多談一下南方以外各地黑人的情况，但是在这里只說一句就够了，自从独立宣言確認“所有人民生来都平等”的真理以后，全国各地对于黑人权利这件事始終普遍保持着伪善态度。因此必須承認，如果在國內因素之外沒有另一种因素，我所提到的改变了的局势是不可能出現的。

另外一个因素，一个不留情面、力量浩大、迫人而来的因素，乃是反对美国國內种族主义的世界輿論压力。这项压力在我們国家生活中获得了广泛的注意，压力和我們的注意，而且都在繼續不断地增長。艾米特·提尔在密士失必州被吊死事件，奧塞灵·露西被禁止进入亞拉巴馬大学事件，都在国外掀起了譴責的浪潮；小石城事件的报道——不論是文字还是圖片——震驚了世界。是的，最高法院受到阿肯色州州長的挑战以后，世界輿論的压力本身对于最高法院的裁决乃是一个重要因素。美国总檢察長在支持反对隔离制度的辯詞中，提醒最高法院說，“在

美国实行种族歧视、反对少数团体，对于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有不良效果。”

然而，在美国生活中有人对于这项压力的来源缺乏了解，而把它当作敌对力量来看待，认为它会威胁我国作为世界领导国家的合法（自封的）地位。他们把压力的来源说成在占有世界大多数人口的黑人中间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这种压力既然是由于散布“谎言”和“诬蔑”而引起的，那就可以用“真相运动”来把它肃清，要表现出美国黑人的情况非但不值得叹息，而且值得钦羨。黑人虽然普遍认为这种压力对于争取我们的权利的斗争大有作用，而且已经发生了作用（华盛顿立即取消学校、餐馆和旅馆的种族隔离制度就是一个极明显的例子），却有一些知名的黑人自愿投效，参加到那种要把压力取消的大运动里！纽约“阿姆斯特丹新闻”报的一个专栏作家对于这些人物曾经有过一次相当不客气的评论：

“我们政府多年来僱用了黑人知识分子、表演家、牧师和许多其他人士来担任黑人大使的角色。他们的工作是要在铁幕后面露一露他们那些肥头大耳、刻意修饰的面孔，作为美国人人都是自由平等而种族界线纯属无稽之谈的活证据。”

现在，我不打算对这些人进行任何样式的私人批评，我也知道，有一些表演家在政府的主持下旅行国外是因为他们需要工作，而且他们是想让全世界知道，美国黑人有才华、有声望，到处都受尊敬。不过，也必须指出，那些

專誠为平息反对美国种族主义的世界輿論的憤怒而出国的黑人發言人,严重地伤害了他們的同胞和他們的国家。在海外宣称“一夜之間,出現了和平革命;在美国作一个黑人極为高貴”的話——這兩句話确实出自一个向亞洲人听众演說的著名黑人牧师之口——除了使演講人自己出丑之外,全無其他作用。

現在大家都應該承認,这种否認現實的全球性广告运动並沒有达到目的。事实的說服力还是比空話来得大。有人說,外国对这問題的抗議是被“共产主义宣傳”煽动起来的,这种論調表现出它不仅蔑視黑人的智力和感情,而且也蔑視一切种族、一切主义具有民主思想的人的智力和感情。当然,世界上共产主义者是譴責种族主义的,这並沒有什么新鮮之处,任何人只要走进圖書館,讀一讀馬克思一百年前所說的話,“只要黑皮膚的劳动者还受到污辱,白皮膚的劳动者就不能有自由”,就知道那些把它說成“冷战”的某种新武器的論調是多么愚蠢了。不过,一定要把世界輿論对于美国种族主义暴行的不滿,單純說是共产主义煽动的結果,那就只能侮辱国外的公众輿論,其荒謬正如同伊斯特蘭指称我們最高法院“曾接受左翼压力集团的說教和洗腦”的說法。美国公众輿論拒絕同意伊斯特蘭的話。

世界各地对这一問題的壓力始終不断,而且在繼續增長,那么,这壓力又是因为什么而形成的呢?其中一个原因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慘痛經驗——納粹四出侵略,要讓他們所謂的“优秀民族”統治天下,造成了述說不

尽的蹂躏和恐怖。千千万万人被杀戮了，还有更多的人饱受苦难。全世界都认识了希特勒的可怕教训：由一个近代化工业国家的政权和技术所支持的种族主义，乃是一股穷凶极恶的力量，今后决不能再允许它抬头。希特勒的“优秀民族”思想和伊斯特兰的“白人至上”主义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有谁能够说服欧洲人民，让他们相信白袍的三K党人焚烧的十字架与褐衫党的卐并不相同呢？美国国内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它的暴行，引起了在希特勒主义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人最大恐惧。

有人向世界宣称，美国生活中的种族主义不过是过去历史正在衰退中的遗物，而且这种情形主要局限在我国一个地区，那么，这些人就无法说明，国会为什么又在战后为什么又通过臭名昭彰的华尔特—麦卡伦移民法案。这个法案充满了错误的种族主义思想，连纳粹德国的命令都赶不上它。正如参议员李门所说，这法案“是根据声名狼藉的种族理论制定的，当年希特勒就从同一理论发展出臭名昭彰的纽伦堡法案”。看看我们的移民限额是怎样分配的吧：三百万人口的爱尔兰，每年可以向我国移民一万七千人；可是四亿人口的印度，限额却是——一百！我们黑人一般对于移民法律并不十分关心，因为我们已经在这儿住了好几个世纪了，但在我们中间还有许多来自西印度群岛的人，他们的才能对于我们社会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他们的人数。在华尔特—麦卡伦法案之下，在它的减少“非北欧”移民的条款之下，能够从加勒比海和其他地方来此的黑人数目是大大地被削减了。

在希特勒主义潰敗之后,各国組成了一个世界性机构;我国过去沒有参加旧国联,現在則成为联合国的一个领导力量。联合国成立于旧金山,总机构又設在紐約,就把全世界的注意力都帶到美国身上。自从一开始,有远見的黑人領袖就認為这一个新組織提供了爭取支持他們同胞民主要求的新机会。杜波依斯博士在他被赶下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这是他协助創建的机构)领导职位前不久,曾为黑人权利向联合国提出呼吁。在那項历史性的文件里,他指出在美国的种族主义現在已經成了国际問題。他写道:

“在美国实行的歧視本国公民、而且尽量違反本国法律的行为,絕不会長此以往而不違犯世界人民的权利……这一問題本身毫無疑問原是一个国际和民族問題,現在已經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問題,由于世界各国越靠越近,它在將來勢將更加国际化。”

过去所發生的事确是如此;在我們中間,那些在十年前过于盲目而看不到這項真理的人,現在可以在世界报纸的头条新聞标题上看到了。“由于各国越靠越近”,联合国本身就反映了絡繹出現的巨大变化。今天,联合国的亞非集团里共有二十九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唱名的时候,我們听到了剛成为会员国的新国家名称——其中便有加納、苏丹等非洲国家。联合国像一个巨大的溫度表,它記錄下世界上由于殖民地解放浪潮壯闊前进而正在变化的气候。

此外，国外正在变换中的势力基础，乃是迫使国内必须变化的主要力量。“白人至上”的时代，少数西方国家对东方的帝国主义统治，转眼就要结束。一个新的时代正在诞生中。我们，在美国和在加勒比海的黑人，乃是正在兴起的世界有色人民的一部份。这不仅是膚色相同、感情一致的问题：这是历史进程註定的事。欧洲国家对非洲的劫掠——我们的祖先就是被这些国家当作奴隶送到这个半球的——就展开了这一个时代，并且把大部份亚洲国家也置于白人统治之下。现在，这一时代已近尾声，我们自己的命运必然大有关連。

自由乃是难以到手的东西，千千万万的人还在饱受桎梏，但是他们奋力走向就要到来的新时代。例如，在怯尼亚殖民地，非洲爱国者——所謂“茅茅”——像野兽般遭受屠杀，人民领袖肯雅塔被关在獄监里。我住家伦敦那些年，和这位勇士很熟稔；像印度的尼赫魯以及我在英国結識的許多来自殖民地的人一样，他渴望自己的同胞早获自由。看吧，尼赫魯曾經在印度坐过牢，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也坐过牢；然而，通往独立和政权的道路还是打通了那些監獄的牆壁，肯雅塔也一定繼續前进。

一个新的中国兴起了，它具有青春的力量和古老的文化，它是个拥有六亿人口的世界大国。这个中国乃是一项偉大的事实，無須乎“承認”，华盛顿却还有几个死硬的政治家，坚持認為“中国”应该是那个海島避難所、蔣介石和他的亡命集团浪費美国納稅人的錢苟延殘喘的地方。但是，中国在亞洲的真正鄰居——印度、巴基斯坦、

緬甸、錫蘭、朝鮮、越南、印度尼西亞的人民——承認它是一個強大的朋友。因此，尼赫魯總理願意和毛主席握手，緬甸總理吳努對於東方這個領導國家也說過這樣的話：

“緬甸雖然不喜歡國內的共產主義，中國人民既然認為共產主義最適合他們的情況，我們就無意干涉中國人民的事務。中國共產黨領袖廢除了外國經濟剝削，第一次肅清了貪污腐化，因此獲得了亞洲同胞的讚揚。他們正在為他們的羣眾建設一個新世界。”

（我們黑人應該了解，在我們每天看到報紙痛責中國這樣新解放的國家的時候，報上所講的都是口是心非的話。我們還記得，道格拉斯當年看到報紙把剛解放了的海地罵成“殺人犯和土匪的國家”時，曾經說過，“白種人無法講黑人的真話。他們是用塞着一塊錢硬幣的眼睛看我們的。”）

華盛頓雖然還沒有承認已經興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比起當年歐洲人在上海公園懸掛“華人与狗不得入內”標誌的“過去的好日子”，這個國家的變化可真是太大了——然而亞非兩洲自由國家在萬隆舉行的那一次偉大會議，却歡迎新中國作為它們之間的領導國家。

現在該是黑人領袖重新衡量一下我們國境以外的世界，不要再跟着華盛頓官場大驚小怪的高叫“自由世界要失掉”亞洲和非洲的時候了。殖民地人民一旦收回了自己的土地和資源，毫無疑問，必有一些人受到重大損失，

但是美国黑人在那边有什么损失可言呢？我们的问题是怎样能够像其他有色人民最近正在得到的那样，也得到一些自由和尊严。我们需要关心的正是我们能够**得到**什么，而不必自伤脑筋去担心白人大老爷会**损失**什么！

黑人领袖最好去推敲一下联合国最近发生的一件事的意义。1957年9月19日，杜勒斯先生在联合国发表演说，他的讲词虽然全無新意，仍然重复过去的老话，说什么亚非两洲的共产党正在“煽动民族主义来切断和西方的一切关系”，他的话却在全国范围之内都有报道。报纸和广播忽略了下一位演讲人的话，但我相信他的意见具有历史意义。这位演讲人是加纳（在非洲西海岸，我们祖先有许多人来自那边）财政部长阿科·阿杰伊，他对联合国大会说：

“……对于正在争取摆脱外国统治获得自由的全体非洲人民或世界各地的非洲人后裔，甚至对于**因为他们的膚色而享受不到本国宪法所保证一切公民都可以享受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的人**，加纳都有特别的责任和义务。我应当要求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注意，新国加纳关怀全体非洲人民的自由，也关怀世界任何地方的非洲人后裔所受到的待遇。我们向各国，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的良知提出呼吁，希望它们参加这一项履行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基本人权和自由的运动。”（加重字号为作者所加）

阿們，兄弟，阿們！我保准你的話一定吹暖了散佈在

这个国家各地的非洲人后裔的心。

是的，自由的有色人民国家的人民，乃是我們与生俱来的朋友：他們正在增加的力量也是我們的力量。在印度駐美大使在得克薩斯州受到黑白隔离待遇的时候，在加納財政部長在特拉华州受到黑白隔离待遇的时候，他們和他們同胞的情緒和我們完全是一样的。也有人向他們提出外交上的致歉，然而他們知道，總統和国务卿既沒有向每天忍受种族歧視侮辱的我們一千六百万人道歉或賠償，也沒有向在这个“自由人民的国家”遭受侮辱和虐待的千千万万 其他的人——美国印地安人、墨西哥裔美国人、波多黎各人以及美籍亞洲人——道歉或賠償。正是因为这个緣故，佔有全人类三分之二数目的有色人民正在大声疾呼，必須摧垮“吉瑞科的牆壁”^①。

我們国家有一些死硬的“白人至上”論者，他們对于必須考虑国外公众輿論的主張大加嘲笑。南卡罗来納州州長田默尔曼对記者說，“印度并不关心黑人——也不关心白人。說这些人会担心美国人所作的事，乃是荒謬的想法。”然后，他又提出，有色人民国家的大使在美国南方旅行的时候，應該守在“能够找到的最好的黑鬼旅館里”別出来。

但是我們还算幸运——整个国家則更为幸运，国家領導的统治集团还不是像那样愚蠢。不管他們具有多少私人偏見，那些指揮我們外交政策的人毫不怀疑地知道，

① 吉瑞科是巴勒斯坦的監獄。——譯者

美国不能忽略来自国外的压力。种族歧视使我们付出去的代价会比国家声望的代价大得多：它能够严重地打击我们的国家经济。凡是那些与国外贸易和国外投资有密切关系的人，以及与我们的工业必须从其他国家输入的原料有密切关系的人，就比伊斯特兰、田默尔曼和福巴斯这类人要现实得多，力量也大得多。面对着我国必须与新兴的国家和平共处（而且首先要自己生存下去）的事实，毫无疑问，美国的当局一定得把这新形势估计在内。

我的上述意见并不是对重要新闻及当前局势的匆促评价：它是根据我多年来的思想体系提炼出来的。早在“冷战”开始之前——在我国还是苏联的盟友、共同与希特勒主义作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就指出了某些新的发展，认为这些发展会为我的同胞带来不同的局势。我在1944年4月12日“纽约时报”刊登的访问记里说道：

“我国的黑人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在美国批评许多国家。我们知道，尽管在战争期间，国际良知也具有极大影响。黑人问题解决之道的一个重要部分，必将是其他国家从外面对美国施加的压力。在英国战区內，现在有十万黑人在军队中。美国人要他们和在國內一样，与白人隔离。英国人却坚持认为应该将他们混编在队伍中，不应隔离。这一事实显示出在英国人区域內有所行动的可能性，它也同样的显示出外国舆论的力量。”

在指出外界压力的同时,我也相信,黑人同胞自己所加的压力也是应当被估计在内的一个因素,我还这样说:

“这显然不是种族战争——其关键就在于有自由的人的思想和无自由的人的思想。美国黑人改变了脾气。现在他要求自由了。不管他是不是冲着你笑,他要求他的自由。人剥削人的旧制度是肯定地一去不返了。”

这是我在十几年前的见解,这也是我今天的立场。

我在这一章里提出了在我认为黑人权利在目前有可能争取到手的几个因素。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单是靠机会是不行的。单纯依仗客观情况,不管它是多么有利,也不能解决问题。道格拉斯曾经教导我们,“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不争取,强权就不会让步。过去如此,将来一定也是如此。”我们在下一章里就要讨论到必须进行的斗争,以及能够使我们的要求获得胜利的黑人力量。

第五章

黑人行动的力量

“还有多久啊，主啊，还有多久啊？”——被压迫者自古以来的呼声现在也经常在黑人的报纸上出现了，这些报纸的篇幅充满了有关迫害我们同胞的暴行的文字和图片报道。一张黑人被白人暴徒猛踢的图片，有如重重的一拳猛捶在读者的心口上；报上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恐怖照片——燃烧中的十字架，被痛殴的牧师，挨了炸弹的学校，受惊吓的儿童们，被残害受伤的男人，被禁锢的母亲，被封锁的家庭——这些照片说明了目前的情况。

还有多久啊？答案是：**我们让它多久便是多久**。我认为黑人的行动具有决定性。我认为我们自己有力量结束那些恐怖行为，并且为自己在全国范围内争取到和平和安全。认清了这项事实，就一定可以产生新的力量、胆量和决心，为争取达到目标来计划我们的行动和新战斗纲领。

对于这一看法的否认和怀疑——我们今天面对着的挑战的第二部分——要比我所提到的第一部分要明显得多。那些高喊权利平等“永远不能！”的死硬种族主义者，和那些嘀咕着“现在不行”的渐进主义者，都很相信，

黑人是沒有能力取得另外一種決定的。很不幸，大部分黑人同胞也不認識他們自己的力量，看不到他們怎樣才能達到他們迫切要求的目標，這些情況都是事實。這種普遍看法的根據是很明顯的。我們是少數民族，只佔全國人口的十分之一。在一切都要從實力加以估計的美國，我們無論在哪一方面——經濟力量、政治實力、社會地位——都處於劣勢；結論就由此得出來了，黑人很難或者根本不能促成變化。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這並不是一個少數民族與多數民族為敵的問題。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如果我們要从遠為有力的多數民族手中搶走而使自己得到什麼東西，這種作法根本毫無希望。可是我們的要求並不是這種情況。我們既然是生來平等，我們就要取得法律規定我們應該有的平等權利。實現了我們的要求，並不等於削減白人的民主權利；相反的是，它會大大地加強全體美國人的民主基礎。我們並不要求不該屬於我們的東西，因此，我們的要求具有極大的道義力量。正是因為大家公認我們的要求是正義的，它才贏得了多數白種美國人的道義支持。

實現了我們要做頭等公民、和其他人平起平坐的要求，並不等於我們就獲得了平等地位。長期迫害一向把我們壓在梯子的最下几層，就是一切障礙都清除了，我們還要往上爬一大截路，才能趕得上一般的生活水平。但是，沒有我們所要求的平等權利，我們就不能達到我們所期望的平等地位，因此，把這些權利爭取到手並不是最高

的期望，而是最低的需要，我們一絲一毫也不能讓步。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在我們國家並不是少數意見。雖然最熱衷於“白人至上”論的狂人不願意給予黑人以平等機會，來考驗一下自己的信念，我相信大部分美國人的思想是夠開明的，而承認應該給予我們這個機會。

在今天，美國多數人的道義支持，還多半是消極的，但必須承認的是（我們在這裡也看到了黑人行動的決定性力量）：

只要我們黑人同胞隨時隨地盡一切力量，以全部熱誠、尊嚴和決心來要求我們的合法權利，美國人民的道義支持一定會成為站在我們這一邊的積極力量。

小石城事件的最重要部分既不是福巴斯州長和當地暴徒們的所作所為，也不是艾森豪威爾總統準備有什麼行動：重要的乃是那九名黑人少年，在他們的父母、黑人社會和黑人社會領導人的支持下，決心堅持他們到州立中央中學讀書的權利。這些少年在堅持他們的權利時，所表現的無比勇敢和尊嚴，受到了美國公眾的欽佩。他們的行動比起過去所有只談“容忍”的演說，更容易獲得具有民主思想的白種人的同情和支持。

在取消黑白隔離學校的戰鬥中，小石城不過是第一次衝突；我們的決心不久就要受到更大的考驗。在公眾教育中反對種族隔離不過剛展開初步階段，還沒有遇到抵抗的核心。不過我們義無反顧，作好未來鬥爭的準備已成當務之急了。

我已經指出國內和國外的力量來源。那麼，我們自

己有什么力量呢？

我們有人口众多的力量、組織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我現在解釋一下這句話的意義。

一千六百万同胞是一个應該正視的力量，联合国里的确还有許多国家的人口不及这个数目。决不能再說黑人問題仅仅是个地方事件：不断逃离南方的黑人已將黑人社会扩展到全国各地，并且有大批黑人聚集在全国經濟上和政治上最为重要的地方。近几年，很多文章提到黑人选民在紐約、俄亥俄、宾夕法尼亞、密执安、伊利諾和加利福尼亞等关键性的州^①内所佔据的战略地位，但是一般來說，我們人口众多的力量还没有显现出来發揮作用。我們不妨把几件众所週知的事联系起来，研究一下这个看法。

近来我們經常在報紙和雜誌上看到照片，一个黑人家庭——丈夫、妻子、他們的孩子們——在他們新买或新租的房子里慌作一团，外面則圍攏了几百几千名仇視黑人的，扔石头，罵髒話，高喊杀人放火；當場也許有几个警察，也許根本没有警察。可是，照片里缺乏了一些應該到場的人，这些人避不出面就会引起难以平息的追問：**其他的黑人到哪儿去了？**那个城市里應該出来保护自己的成千上万的其他黑人到哪儿去了？現場上所缺少的人口**众多的力量**如果出現，就会使局面整个改观，而且比什么都有效。对于孤立無援的少数人，种族仇視的人就大事

① 关键性的州，指美国选举时，民主党和共和党势力不相上下而对于选举具有極大影响的州。——譯者

恫吓；但是，这些厚颜无耻狂呼乱喊的人一旦發現自己是处在一对一千的劣势，他们的气焰就远不如一千对一时那样嚣张了。

当然，我并不是主張黑人同胞應該把法律措施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我們有权利，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們有責任拿出力量来支援我們整个社会，保护每一个家庭的生命和财产。不錯，只要我們大众的力量一有出动的跡象，法律就会比我們来得快一百倍。現在是全国各地——芝加哥、底特律、紐約、伯明翰等等地方——的龐大黑人社会表示他們絕不能容忍有任何一个人再受暴力襲击的时候了。傑弗遜在历数人类不可剝夺的权利时，把生命放在自由和寻求快乐的前面；應該指出，对于今天的美国黑人來說，个人安全问题必須放在第一位，并且要在触及其他問題之前，首先解决这个問題。每逢有人要黑人“安份一点”的时候，这話便内含威胁，他如不遵命，便要受到暴力对付。因此，据我看来，最重要的就是要用事实表示，我們对迫害我們的暴力絕對不再容忍。只要一發現暴徒聚众襲击的跡象，那一个城市的黑人同胞就尽一切力量声援吧——羣众示威，罢工，組織抵制——大干一場，这对于四面八方的人都有教育意义。

要大家在1957年5月17日，亦即最高法院裁决^①三週年紀念日，举行“爭取自由祈禱巡遊”，到华盛顿集合的号召，是一个極為高明的主意。成千上万的人齐集华盛顿，

^① 这一項裁决是指最高法院推翻黑白“隔离但平等”的政策，而指为違宪。——譯者

当时都有团结之感，大家临场听了几篇演讲，情绪很高。从威信和纪律讲来，这次集会是一件值得大大夸耀的事。不过，就示威的规模讲来，也不免令人感到失望，因为它不象一次全国总动员，没有真正地反映出我们人口众多的力量。后来，报纸上有许多指摘，说领导阶层的重要分子在准备工作中“扯了后腿”，有关人士对此矢口否认，本书也不打算详谈此事的是非，因为这样做并没有积极目的。我要指出来的问题则是：在我们再度号召总动员的时候（这次应该不等再过三年就进行号召），我们必须全面发动，举行一次不是一千人一万人示威，而是十万人百万人的示威，用以表示我们确是郑重其事。我们也不应该仅仅限于听几篇演讲就默然回家。我们的发言人应该前往白宫和国会，在我们同胞的集体力量支持下，提出我们促请采取行动的要求。发言人然后应该回到大队，告诉大家“当局”说了什么话，大家听了就可以决定是否满意，还要采取什么步骤。

骑墙不定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如果有一两个人害怕这样的代表团会使某些政客“受窘”，或者至少认为这种行动过于大胆——那么，就让那种畏首畏尾的人站开吧，因为我们的行列里有许多人时时愿意同政府的任何高级人物或全体高级人物“一本正经地谈公事”。我们必须认识清楚——每一位领袖都该认识清楚——在我们坚持政府应该倾全力保护黑人在南方享有选民登记权和投票权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向白人大老爷请求“开恩”。而且，一旦我们真正以全力提出这项要求，答案必须就是同意。

人口众多的力量是通过**組織的力量**表达出来的,組織的力量乃是黑人同胞的另一个偉大力量。在美国生活的其他領域里,很少有像黑人社会这样紧密的組織。有些人說,我們的組織过多了——过多不同的教堂和教派,过多的兄弟会、俱乐部和协会——可是我們既已組成这些組織,也就沒有感到遺憾的必要。重要的是我們要承認一項时常被否定但有意义的事实:黑人能够而且的确是团结在一起,由于集体努力,他們曾經完成了非凡的工作。“我們同胞最麻煩的事就是我們根本不想团结”——你一定时常听到这句话(也許你自己也这样講哩);而最确切的事实則是,我們的团结合作比任何人都要好。我們听人說道,“我們同胞就是不願意拿出錢来做好事”;而我們在全国各地看到的却是,几百家穷戶組成的教会团体年年不断地要為他們心甘情愿的事業捐募成千上万塊錢。

黑人社会是有組織的;我們同胞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和願望固然又組成了許許多多的团体,但黑人社会的組織并不因此而絲毫減色。像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这样的团体,它曾經在法庭中为爭取我們的权利贏得許多名傳一时的胜利,并且作了很多另外的优越工作,現在的問題則是它應該获得更多的會員和更多的財政支持。不过,事情很明显,为了發揮我們的組織力量,我們还必須团结所有由我們羣众組成的团体,以期一致行动。为了反对种族隔离的公共汽車而在亞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城进行的偉大斗争和所获的胜利,無可怀疑地証明,黑人社会中各式各样的現有团体为了共同目的,能够有效地团结一致。当

然，領導的因素（我在本章最後再分析這一點）是一個關鍵，但我願意在這裡強調指出，能夠獲得鬥爭勝利的**組織基礎**在其他黑人社會里也都有，而且並不比蒙哥馬利城來得差。面對着我們在蒙哥馬利城的同胞籌劃和執行一切細節的高明組織，誰還能再說黑人沒有能力組織有效的集體行動呢？我國還有什麼另外的羣眾運動籌劃和執行得更好嗎？

教堂和它們的牧師在蒙哥馬利城事件中擔負了主要的任務，這就益發證明，曾經在我們歷史中擔負了重要工作的黑人教堂，現在還是我們的組織力量的最堅強基地。這不僅是因我們的宗教團體人多勢眾，而主要的還是因為我們的教堂是獨立的黑人團體。教堂和其他具有同樣獨立性質的團體——諸如兄弟會、婦女會等等——今後一定更加在前領導，這就是因為它們更為接近黑人老百姓，更能表達他們的需要，並且很少接受黑人社會以外力量的控制。

我要在這裡指出，在這些老百姓中，有一個很大的團體在我們的社會中具有最強大、最有效的潛力——兩百萬有組織的男女黑人勞工。我們是一個勞動民族，黑人工人的薪水袋就是我們一般福利和進步的尺度表。政府的平均工資統計表說明，白人每拿一塊錢工資，黑人只能拿到五角三分；黑人家庭每年的平均收入是二、四一〇元，而白人家庭的平均收入每年是四、三三九元。現在，就在這個基本的吃飯問題上，就是我們爭取平等的一條激烈戰線，黑人工會會員應該是在前開路的主要力量。

也應該看到，在我們爭取公民權的一般鬥爭上，黑人工會會員也處于關鍵性地位。他們既是我們社會團體的大部分成員，同時又是黑白兼收的團體中我們同胞的最大部分。因此，黑人工會成員乃是一個戰略性的橋樑，可以把我們同美國一般人民的廣大羣眾現實地聯繫起來；這些羣眾在爭取民主的鬥爭中乃是我們天然的盟友，而在這樣的危險時刻里，我們必須爭取得到他們的積極支援。

對於我們的有組織的男女勞工們，我願意指出，你們面對着雙重挑戰。黑人工會會員必須在我們同胞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加強發揮他們的影響。你們在偉大的美國勞工運動的鬥爭里曾經獲得了知識和經驗；現在就應該將這些知識和經驗引用到教堂、兄弟會和公民或社會團體里，否則就不許它們活動。必須把多年來我們同胞為平等和自由而鬥爭的精神、決心、組織技巧、永不屈服和永遠戰鬥的鋼鐵意志提供出來。

其次，你們的肩頭負有發動全部工會運動力量的責任，不論白人和黑人，要發動他們參加爭取我們同胞解放的戰鬥。雖然你們有大多數人在勞工領導最高階層中還沒有代表，你們必須運用人數眾多的力量，使得一向顯得專愛注意所謂國外“爭取自由運動”的勞聯—產聯的領導，對於我們在國內爭取自由的運動不能再繼續保持緘默和無動于中。你們必須發動你們的白人工人同事支持黑人工人爭取完全平等，爭取做任何工作的權利，爭取同工同酬，爭取取消種族隔離的工會，爭取選舉有資格的黑

人担任工会领导职位；争取每一个工业都要公平僱人，并且争取在工会中采取教育性措施来肃清“白人优秀”論調，因为这种論調乃是僱主用来毒化白人工人的思想的，以便唆使他們与你們为敌。

多年以来，我曾經密切注視和参加你們在四面八方进行的战斗性斗争，和芝加哥倉庫工人，底特律的汽車工人，两岸的海員和碼頭工人，北卡罗来納州的烟草工人，匹茲堡和西弗吉尼亞州的矿工，伊利諾州、宾夕法尼亞州、印第安納州和俄亥俄州的鋼鐵工人，紐約和費城的毛皮工人、公務員和服裝工人，以及全国各地無数其他地方的工人一起斗争，我敢完全肯定，你們一定能够克服今天你們所面对的挑战。

我要对黑人生活中各派系全体人民指出，發揮我們組織力量的关键在于对**一致行动**的認識，在于把現有的許許多多团体团結在一起，以便策划和进行共同斗争。我們非常了解，这工作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我們在許多不同之处分成了派系——在政治上，在宗教信仰上，在經濟和社会階級上；除了这些派系以外，某些領袖的个人野心和嫉妬也是障碍。可是自从我由东海岸旅行到西海岸与各地同胞接触之后，我体会到大家对于那些鼠目寸光的想法和作法越来越觉得不能忍耐。我看到大家越来越不滿意由白人控制我們的事务，不管这种控制是由政治大亨公开命令的，还是由我們必須当心的白人自由主义分子“献計”而暗中安排的。有一种觉悟正在迅速发展：尽管我們有很多不同之处，我們还是必須团結起来；

我認为这一思想的力量一定能克服一切障碍。当然，一致行动并不是立刻能够出現的，它必須先在基層中發展，然后从这一个黑人社会傳播到另外一个社会。这种建立团結的工作乃是我們每一个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着手进行的工作。

一个統一的民族應該有一个統一的領導，我要把这句話的意义解釋清楚。最近，曾經在“烏木”雜誌上發表过我的訪問記的著名黑人記者卡尔·魯万，自己也被別人訪問了，他在联播节目中就这一問題發表意見說：“罗伯遜認为，黑人如果不能以差不多一致的声音來發言，我国的黑人就永远得不到自由；而且，非常明显，罗伯遜觉得那个一致的声音多少應該接近于他的声音。”

事实上，这并不是我的看法，我不希望魯万先生或任何其他的人誤解我对这一問題的見解。我們在發言中應該采取的一致声音，必須是我們全体同胞对于个个黑人都感重要的癥結問題的意見——這個問題就是我們应当获得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在許多其他問題上，我們之間分歧意見甚多，因此不可能設想有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个派系能够代表我們全体發言。

我不但不是为自己提出任何类似的要求，而事实上我所提出的意見恰好与此相反！我提議以站在黑人立場的共同見解为基础建立团結，無派系的团結，取消一切分化的团結，不排除任何一个人的团結，沒有一系一派可以強把自己的特殊看法加諸別人的团結。統一运动的統一領導的意思就是，一切政治見解不同的同胞——保守主

义的、自由主义的、急进主义的人——都应该有代表参加在内。不过也应当一视同仁地提出一项条件：黑人领导和领导集团中每一名男女，都要把我们同胞的利益以及为这些利益所进行的斗争放在一切之上。

现在需要——迫切地需要——举行一次黑人领导的全国性会议，不要只是几个人参加，而是要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人物广泛地参加，要代表各种职业，要代表每一种见解，以便在当前的危机里制定出美国黑人的**共同行动纲领**。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一项纲领，没有这纲领，我们就成了一只没有舵的船；我们只能过一天算一天，东鑽一头，西鑽一下，遇事只能事后打补钉来补救。我们必须眼前的惊涛骇浪的日子里以及在未来的更大风浪的日子里绘制出一幅航行路线图，找出一条开足马力奔向自由的航线。

报纸上有许多社论认为需要设立一个**中央基金**，它不仅可供法律用款，而且可用于黑人一致行动的所有目的上，我所提议的全国性会议就可以解决这问题。中央基金可以作为“社会资金”，用以协助任何地方的斗争。这项基金不属于任何派系，也不归任何单独的团体来控制，它将是全体同胞的全国性措施，只要好好组织一次筹募运动，一定会得到美国黑人的热烈响应。而且还有：这样的基金毫无疑问会获得同情我们斗争的白人的大力支持。

我们既然必须根据人口众多的力量来大胆设想，那么我们也应该根据组织来提高我们的理想。我们的事业

是全体同胞的事業，因此我們达到目标的方法也必須是全体同胞都能参加一份的方法。全国各地每一个城每一个州的黑人同胞組織力量的潛力都應該發动起来。

我們同胞具有的**精神的力量**是無形的，但在今天的斗争里，这是一股必須發揮出来的巨大力量。这是一种面对着考驗还能够坚定不移、斗志昂揚的精神——这是我們同胞在奔向自由、長途跋涉的冗長岁月中磨煉出来的真正精神。这是过去領導我們同胞的偉大人物——道格拉斯、特普曼等等——和千千万万始終“稳步前进”的人的不死精神。这种精神还活在我們同胞的歌声里——在庄严偉大的“深河”里，在感人肺腑的“雅各之梯”里，在战斗性的“約書亞准备吉瑞科战役”里，也活在生动瑰丽的我們全部聖詩里。

它既活在希望孩子“早日長大有所成就”的每一个黑人母亲的心里，也活在每天用沉着勇敢和乐观的心情来应付侮辱和暴力的各地我們一般同胞的心里。它就是使我們的運動員、我們的艺术家以及要公开演出的一切黑人获得“特殊力量”的那种精神。肯塔基州克莱城小童傑姆斯·戈登当記者問他为什么要和白人小孩去上学时答道，“我为什么不該去呢？”他就有这种精神；南方所有其他的孩子們像威武的英雄一般，昂然穿过大事恫吓的暴徒队伍去上学，他們也有这种精神。蒙哥馬利城那位一把年紀的老大娘在談到她参加抵制公共汽車事件时，这样說道：“过去我坐在种族隔离的公共汽車上，我的身体在汽車上，可是我的灵魂却在走路；可是現在我的身体是在

走路,我的灵魂却在汽车上了!”她也有这种精神。

是的,这种精神的力量乃是我的同胞的骄傲和光荣,在全体美国人中,还没有任何人类的品质能够在它之上。它是一种与人为善的力量:丝毫没有仇恨。它倡导的是生命中最高尚的东西——公平和平等,人类的尊严和诺言的实践。它是土生土长的,根深蒂固,并且直冲云霄,直达到人类最崇高的期望。现在是在我们所作所为中加强和表现这种精神的时候了,因为它是一股远比我们全体敌人为有力的力量,一定会打倒他们的一切邪恶做法。

要使黑人行动具有决定性——有了我在前一章提到的有利机会,有了上面所指出的力量来源——还需要另外一个因素:有效的黑人领导。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不涉及任何私人,也不打算讚扬或抨击今天在我們队伍中位居要津的任何人士。像这样对于自己领袖的严格评价,当然应该由黑人同胞自己提出,因此我不准备在这里讨论这个或那个人物,而愿意讨论一下问题的原则,衡量的标准,以及当前所需要的领导品质。

“领导”这个名词曾经用来表示许多不同的概念,其中有許多意义与我在这里所讲的毫无相同之处。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地位显赫,原因很多,各有不同;每逢有人在梯子上爬得高了一些,便被称为领袖;而事实上他们表现得很清楚,他们唯一的利益就是个人的发展,他们越是能够比其他全体黑人爬得高,他们就越高兴。此外,白人统治集团也有一个传统做法,不论是在地方社会还是在全国范围之内,都要指定某些人士作为“黑人领袖”,而不管

黑人同胞对此感想如何；这种思想就等于說，黑人領袖乃是白人在獎賞时可以賜給、在懲罰时可以取消的东西。

我現在所談的概念則與新聞大字標題、個人名成利就或為當局所賞識的那種概念毫無相同之處。我所着重的乃是在爭取黑人權利鬥爭中的黑人領袖。这里面包括為爭取權利而設立的團體或其他團體的直接負責人——黑人教堂、兄弟會和公民組織的領袖，政府里的當選代表，工會職員，以及其行動或旁觀態度都會直接影響我們共同事業的其他人士。

據我看來，黑人領袖必須具有的主要品質，乃是一心一意致力於自己同胞的福利。任何一個黑人，像任何一個其他的人一樣，在一生中都會有許多不同的利益；但是在真正的領袖講來，一切其他的利益都應該從屬於他所領導的人民的利益。如果今天能夠說，其他國家的有色人民都在進步，而美國的黑人卻落到了後面，它的一項基本原因就是，黑人領袖缺乏殖民解放運動領袖們所表現出來的對自己同胞福利的無私感情。我們大家都普遍承認——而且是憤憤不平地承認，我們有一些領袖非但不願意有所犧牲，而且每作一事必先考慮對自己有什麼利益。一小撮人拿到一小撮麵包渣，就每每有人歡呼為“民族的進步”。一個人要想享有自由，就應該決心不惜一死，以求達到目的；儘管截至目前我們還沒有人或很少人必須作出這種最大的犧牲，人人都不該忽略一項事實：在一個艱難困苦的鬥爭里，那些站在最前列的人很可能受到殘暴的打擊。一個人如果不打算面對戰鬥的考驗，他就永遠不

可能走向胜利。我已經指出,这种牺牲的精神在我們同胞的队伍中是極其充沛的;但在领导品質也充分显现这种精神以前,进步勢將緩慢。

为黑人同胞福利而牺牲乃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則是**独立**。有效的黑人领导必須依仗和响应自己同胞的意志,而不能以别人的控制为依归。我們在我們白人公民中是有盟友的,而且有重要的盟友,我們必須不懈地使他們更靠近我們,并且要爭取更多的朋友。但是,黑人同胞的运动必須由**黑人**来领导,不仅在名义上和地位上如此,而在实际情况上也必須如此。不論是哪一方面提出好意見,對我們都有好处;不論是哪一方面願意帮忙,我們也都需要和感謝;然而,如果提意見的人和帮忙的人紧抓指揮权不放,黑人的行动就不会起决定性作用。因为,無論其他的人心地有多么善良,事实上我們的利益在他們看来还是处于次要地位。

今天,外力控制是減少黑人领导独立性和有效性的一个因素。我所考虑的并不是那批厚顏無恥为伊斯特蘭服务的黑人集团,他們的人数正越来越少,而且令人高兴的是他們已經不起重要作用。我所考虑的却是那些根据應該依仗白人力量而不應該依仗黑人力量的意見而执行黑人领导的人。自从布克·华盛顿以来,这种概念成了傳統概念,就是許多反对一切“白人至上”論的人,也承襲了这种思想。就連馬尔科斯·加維(Marcus Garvey)这个人,尽管他在二十年代的民族主义羣众运动里擢升到领导地位,并且向全世界黑人同胞呼吁,“勇往直前爭取自己

所安排的命运”，却也相信白人力量具有决定性。不错，从没有一个人把这种思想比加维说得更清楚，加维在他的随笔集“黑人在世界重整中的地位”一书中说：

“美国的白人是天生的世界领袖。由于他地位崇高，他就被要求在人类的一切努力中加以协助。凡是影响到人类的问题，无论从国家到私人他都向他呼吁请求援助。由于世界的动向都要经他同意和按照他的意旨进行，因此，任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或变化，势必都要先得到他的同意。”

这一段文字出现之后，世界上有了巨大变化，我毫不怀疑，如果加维今天还在世的话，他一定会承认“美国的白人”已经不再是强大无敌的，全世界有色人民正在把那“同意和意旨”推到一边，而独立行事。

在布克·华盛顿的时代，有人把南方统治阶层白人的同意看作是不可或缺的；而在今天，也有人把北方统治集团的自由主义分子的善意称为黑人进步的希望。有许多黑人领袖显然以这种思想为进退根据。他们虽然否定了“白人即是公理”的概念，却承认了“强权即是公理”，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这种思想一旦佔到上风，黑人领导就缺乏独立的品质，而缺乏了独立的品质，领导是无法有效的。

牺牲和独立——这两者都是迫切需要的。领导的其他品质还有很多：我们拥有许多训练有素的男女，这些人在法律上、政治上和民政上素有经验；我们还有口若悬河

的發言人、能干的組織家和善于应对的交涉代表。如果我特別強調在全國範圍內最需要這些品質，我並不是說有許多令人感動的事例不值得稱讚。尤其是在地方範圍內，犧牲自己而進行獨立領導的事例是很多的。不錯，蒙哥馬利城的黑人力量——人口眾多的、組織的、精神的力量——之所以能夠有效地使用，就是因為黑人領導發揮了最大力量。全國人士都曾經看到南方許多其他領袖的英勇犧牲，他們甘冒生命和財產地位的危險，正在領導自己同胞進行鬥爭。我們的隊伍中有許多人應該擢升到全國性領導地位，因為他們的表現充分證明了他們有權擔任這一職務。

我們應當擴大我們的領導概念，並且使黑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人士在最高一層領導中都有代表。上層領導必須容納來自下層的同胞。我所指的乃是在工廠里和在田地里工作的我們大多數同胞：他們可以帶來深入下層的意見，其實這就是最高明的意見，他們能用許許多多的辦法披荊斬棘，展開工作。是的，我們非常需要他們參加領導，我們立即需要他們。

我們在高級領導中也非常需要我們的婦女，我們應該比哈利特·特普曼、蘇綽納·杜魯斯和瑪麗·泰瑞爾（Mary Church Terrell）的子孫知道得更清楚，我們的婦女一向是開路先鋒。黑人婦女今天提供了許多令人鼓舞的事例，她們對事業堅定不渝，在困難中沉着勇敢，在我們同胞的鬥爭中指揮若定；這是黑人各階層領導的新力量的一項主要來源。

但是，如果說有些人應該擢升到上層領導的地位，那麼，原有的上層領導中也有一些人應該退休了。我在提到另外一個問題時曾經指出，黑人同胞忍氣吞聲忍受了多年——有時就忍得出了錯誤。這錯誤時常就是允許那些與地位毫不相稱的領袖幾乎奪走了一切。似乎一個人一旦當了領導，他對於自己同胞所負的責任對他就不再有約束作用了。

但是，在目前的緊急關頭，我們應該減少幾分容忍，增多幾分要求，希望全體黑人領袖“做事公正”。舉例來說，在小石城暴徒阻止黑人子弟進入中央中學並且毆打黑人記者的時候，我曾經看到北方某大城市的一位重要黑人領袖在他的同胞面前站起身來說道：“我們不能以武力對武力來處理這次危機。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能使用聯邦軍隊。這種做法就等於承認我們道德墮落，它會引起第二次內戰——它會打開水閘，把民主沖到陰溝里去，至少在我們這一代，甚至永遠不得抬頭。”這些簡直毫不關切自己同胞而且與事實毫不相符的話剛一出口，總統就派出了聯邦軍隊！內戰並沒有打起來，民主獲得了新生命，暴徒被驅散了，黑人子弟被護送入學；自從1876年以來，這是聯邦政府第一次調動執法力量，來應付南方“白人至上”論者的無法無天的力量。

以這一事件來說，在一個黑人領袖強烈反對他本來應該進行鬥爭的事務、並且彰明昭著地表現出他對其他一些人的利益比對自己同胞的利益還更為關心時——嚶，這些所謂“政治智囊”也許要說：“哦，那完全是政治，

別提它吧。”然而，所謂“政治蠢人”却不能这样看問題。我們怎能讓不是我們的同路人來領導我們呢？

另外還有一些人，儘管他們無可懷疑地都是正直人，熱誠關心自己同胞的福利，却似乎認為作為一個領袖，就有責任阻止黑人的羣眾行動。他們認為，只要通過他們所進行的暗中談判，就能獲得最好的結果。因此，每逢發生了激怒羣眾的事件，每逢羣眾燃起正義的怒火，開會要求開始戰鬥行動，那些人就認為他們有責任息事寧人。

我們不久前曾經看到，青年艾米特·提爾被殘酷吊死事件發生後，從東海岸到西海岸，全國羣情激憤，當時就發生了上述的事情。我在特為這一事件舉行的羣眾抗議大會上，聽到我們一位最重要的領袖對羣眾這樣講道：

“今天你們憤怒了，可是你們並不打算就此採取任何行動。我知道你們一定不採取行動。你們吵着要向密士失必州進軍。可是你們誰也不打算真去。所以，我們還是不必空談進軍吧。還是向我們團體繳一塊錢的會費，把其他的事情都交給你們的領袖去辦吧。如果你們一定要親自作點事情，那麼你們就各自去找你們那一區的民主黨領袖，和他們談談這問題吧！”

你看，如果有一個牧師光是對他的教會團體說：“你們是一幫罪人，你們是無法再改過的了。你們毫無前途了，我知道得很清楚。所以，兄弟姊妹們，把你們的捐款放在捐獻盤上就回家去吧，把拯救你們的任務留給我好了。”

不，一個領袖應該鼓勵，而不應該潑冷水；他應該發

动羣众，而不应该分散他們。一条湿氈子^①絕不能充做自由的旗帜。

当然，为了爭取我們的权利，必須进行談判，然而，談判代表如果没有覺醒的和战斗的羣众加以支持，他們的热誠呼吁一定不会發生任何作用。因为，黑人行动如想發生效力——發生决定性作用，我想是能够做到的——它就必須是羣众运动。要想投票的力量發生作用，也只有在选民羣众都团結在一个共同綱領之下才行；显然，如果黑人同胞一半这样投票，而另一半人那样投票，便很难收效了。現在的做法正好是只注意張罗和計算个别票数，反而撇开和放棄了集体力量。

羣众行动——在政治生活中以及在其他地方——就是黑人力量見諸行动；要想胜利，就要走这条路。

我們今天所面对的一項紧急任务，就是要展开一次全面斗争，来击败“白人至上”論者在南方取締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行动。正如有人在南非利用臭名远揚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来攻击解放运动一样，黑人自由在我們国内的敌人曾經指称，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是一个“顛复性陰謀組織”。这个机构在路易斯安那州、得克薩斯州和亞拉巴馬州已經被宣佈为非法，并且在佐治亞州、弗吉尼亞州、南卡罗来納州和密士失必州受到法律限制。小石城等城市也使用城市条例来达到这一目的。

① 这是一句寓意双关的話，“湿氈子”意为潑冷水。——譯者

非洲人事务理事会^①在1955年被诬称为“共产党陣線”而遭取締，当时，有許多团体对此事漠不关心；如今，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事件上，無論哪一个团体也不應該再采取这种态度了。就連制造罪名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这种給該会乱扣紅帽子的罪名絕對是虛構的。黑人領導中某些人士过去曾經把扣紅帽子視為“高明”战术，現在也應該認清，这种办法除了对于我們同胞最惡毒的敌人有利以外，对于其他人全無好处。

在南方各地——在小石城，在蒙哥馬利城等地——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州級領袖和地方領袖們，为各地黑人領導树立了令人鼓舞的英勇范例。我們全体人民——全国黑人同胞——必須立刻動員起来，支援和保衛他們。

我在上面提出了关于黑人行动力量、这种力量的来源以及最有效地指揮这种力量所需要的領導品質的意見，目前正是局勢的發展要求澄清意見和一致行动的时候，我建議他們对我的意見加以考慮并展开辯論。显然，沒有哪一个人能提出全部答案，必須依靠集体的力量来繪制我們的航線。我們一定要有彼此忍讓的精神，不同的意見必須要找到一致的地方。派系利益必須从屬於黑人

① 見第144頁附录戊 韓頓所写的“非洲人事务理事会簡介”。韓頓博士曾在霍华德大学任教达十七年之久，后来加入理事会在1943—1955年間任理事会教育部主任，其后又任执行秘書。他的近著“非洲的抉擇”（編者按：本書已由世界知識出版社譯出，即將出版）为非洲当前实况提供了珍貴材料。

利益——人人都要做到。我們必須設法排除那些分化我們的東西而團結起來，全體黑人都團結起來。我們的團結一定會加強我們朋友的力量，並且爭取到更多的人站到我們這邊；我們的團結而且一定會使得本來已經覺得大勢不妙的敵人更加削弱。

要自由——要在肥沃的美國土地上作為平等的公民自由行走，要過得無憂無慮，要享受我國土地的收成，要使我們的子弟在一生中一帆風順——我們長久以來蘊藏在心頭的夢想，在今天已經是我們抓在自己手裡的命運了。

尾 語

我們的孩子，我們的世界

映着書桌上的燈光，我凝視着当前时代一个令人惊嘆的征象，使未来充滿了希望和前途的征象……我看着新聞圖片里我們的少年英雄——小石城孩子們——的面孔，不禁微笑。这些面孔是那么光彩，那么庄严。他們的姓名是：伊丽莎白·埃克佛尔德、卡洛塔·沃尔斯、梅妮·珍·布斯、葛蘿丽亞·瑞、泰尔瑪·馬塞尔謝德、梅尔芭·帕蒂洛、杰弗遜·杜瑪斯、泰倫斯·罗伯茨和厄尔奈斯特·格林。在这名單之外，还可以加上南方全体黑人兒童的姓名，因為他們曾經用勇敢和尊严給我們写下了新的偉大史詩。在他們穿过种族隔离的障碍去上学时，他們的脚步声就等于約書亞前进队伍的奔騰声，整个世界都在他們的脚步声中震动。

亲愛的小石城的孩子們——你們和你們的父母和你們社会的黑人同胞打动了我們的心，使我們再度相信，我們現在就可以获得充分自由。你們是我們同胞的驕傲和榮耀，我的内心充滿了热爱，激动地为你們歌唱。在你們和全体黑人青年得以絢爛成長起来、你們的才能得以达到我們国家生活的最高水平以前，我們的国家就永远說

不上是真正的偉大和健全。

你們是我們的孩子，但全世界人民也一樣可以把你們當做他們的孩子。他們曾經看到過你們的面孔，也看到過那些仇恨你們的人的面孔，他們是站在你們這一邊的。他們在你們的身上發現了天下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應該具有的品質，他們的祝福——一切善良人民對待子女的愛情——都集中在你們身上。

是的，美國——這些孩子也是你的孩子，你應該為他們深感驕傲。美國人的夢想——傑弗遜和林肯的精神，愛默生和吐溫的精神——被小石城的孩子們增添了新生命。這些孩子應該永遠受到珍愛，因為他們不僅是我們同胞的希望和前途：美國民主的未來命運也系在他們身上。

……我從書桌上抬起頭來，從我的房間的高窗眺望哈萊姆區的天空，我又想到當前時代另一個令人驚嘆的徵象。在遙遠的天際，星兒們看到地球老婆婆又增添了一對剛剛出生的孩子——一對圍着她轉得又快又歡的小型人造月亮，不禁吃驚得不斷雲眼。我又笑着想道，人造衛星正在天邊奔馳，為整個世界尋找偉大的真理，以便讓大家知道：天地間決沒有人類達不到的高度！我因此想起我的朋友，蘇聯各族人民，他們的勞動和智慧創造了這個奇蹟，它為地球上的人類打開了無邊無際的太空。

在第一個車輪製成、第一本書籍印刷出版的時候，當年就有些人認為這些新發明多少是一種威脅；而在今天，我們國內也有專潑冷水的發言人硬說人造衛星是威脅我

国的灾难。这真是荒唐之至——人造卫星的出现乃是全人类的胜利，它突破了作为提高我们全体人民生活工具的科学和技术，这是一项又新又伟大的突破。毫无疑问，有一些主张战争边缘政策的政客和一些好战的将军在人造卫星的“嗶、嗶”电波声中领悟到告诉他们的话——“小人物们，你们最好撤掉你们发动战争的疯狂计划吧！”——如果他们确是如此了解，那真是最好不过的事了。

不论是聪明人还是傻瓜，都能够看到东方升起了一颗和平新星：人造卫星告诉我们，战争的确是不可思议的，地球上的国家必须寻出和平共处的道路——美国 and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尤其需要和平共处，它们的友谊就可以保证整个世界和平。

我书桌上的黑人报纸登满了我的同胞看到当前时代这两种征象——小石城和小月亮——以后的感想。他们在社论和读者投书中指出了他们所看到和体会到的威胁：敌人就是种族主义。他们把这一敌人视为人类进步的大敌。他们说，人造卫星是由一种包括各种种族的教育制度所产生出来的；他们并且指责，我国所实行的不许多数黑人儿童获得平等教育的种族隔离制度，也是美国走向科学成就新高峰的一项障碍物。

所以，天空中的小人造卫星，你好啊——十分感谢你给我们同胞带来的讯息！我敢肯定说，它对于我们大有好处。

和平——是的，这是比一切都重要的问题。保证了和平，一切国家和一切种族就一定欣欣向荣。不久，在人

类顺着这些小月亮开拓出来的道路旅行太空的时候，他一定俯视着我们的地球老婆婆，带着人类的无限深情和骄傲，复述着莎士比亚当年描述他故国的话：“这些在快活中长大的人，这个渺小的世界……”

我想起了当前美洲一位大诗人，智利的巴勃罗·聂鲁达，他在他的史诗“伐木者，醒来吧！”^①的结尾数行中，也替我说道：

讓我們想到这整个世界，
充滿热爱和激情，我忍不住重重地拍桌高呼。
我不願意鮮血
再浸透面包，豆荚和音乐。
我盼望人們和我一起去：
那矿工，那小女孩，
那律师，那水手，
那洋田田的制造者，
一起到电影院去，出来
喝一杯最紅最紅的酒……
我到这儿来是为了歌唱，
为了和你一起歌唱。

① 根据袁水拍的译本。——译者

附 录

甲

我的弟弟，保罗

班哲明·罗伯遜牧师

一家人刚吃完晚饭，天气又热又闷。我们懒散地聚在我们常聚会的地方，比尔忽然提议唱几只歌。三个人，比尔、保罗和我，便兴冲冲地唱起来。“在老磨房的小河旁”是当时最流行的民歌。一唱开了头，我们不知不觉把会唱的歌一个接一个地唱了起来，从“稻草里的火鸡”到“平安夜”，什么都唱到了。我们正在举行着一个只有那些热爱家庭的年青人才知道的小音乐会；保罗带着孩子气的兴头，全神贯注到歌声里；而事实上，我们三个人都是如此。正在唱得乱哄哄的时候，比尔叫道：“停一下，把这个音再唱一遍，保罗。”保罗放开嗓子唱了一声，比尔说道：“保罗，你能唱。”

“别哄弄我了，小子。”

“我的音乐教育是不幸忽略过去了，”比尔说。“不过，保罗，好音乐听着就是好听，就跟好吃的必然好吃一样。你能唱，可是为了保证我们没有弄错，等今天晚上我们回家时，我要你再唱‘安妮·劳瑞’给我听听。你要是能让我认为满意，罗伯遜牧师住宅就颁发它的第一张音乐文凭。”

我们停了唱，到空地上去打棒球，每逢晴朗天气，这就是全天的最后精彩节目。回到家里，我们就准备消磨夜晚的时间（说来

奇怪，晚間大都是在家里过的)。比尔点唱他刚才选定的歌了。他的记忆力真强，什么也忘不了。保罗不得不满足他，要不然就得不到片刻安静。他一边高唱，比尔一边倾听；最后，比尔下了结论：“保罗，你能唱。”

当然，保罗认为这是开玩笑，我也有此同感。根据我们判断，唱歌是罗伯遜一家人最缺乏的天才。全讓父亲把才气用光了，我們老早就有了这种看法。

但是，談到保罗的唱，却有許多客观因素逐渐促使保罗相信，比尔的話可能有几分道理。他因此拿出更多的精神，帮助教堂的唱詩班。文娱机会一向是很多的，牧师住宅里有一項家規，每一个孩子必須拿出点表演节目。我們其他的人別無他法，只有依靠朗誦，至于保罗，为了要有所不同，別人一定要他唱歌。他从这时起一直唱到参加中学歌詠队，最后，他才至少有几分承認，自己果然能唱。可是，把唱歌發展到公开演唱的念头，在那时則連个影兒都沒有。他現在在歌唱事業上的一切發展，都是从那个7月的下午，比尔、保罗和我一塊兒唱歌时开始的。沒有那一次事情，我猜他連任何歌詠队都不願參加。

比尔今天是長眠地下了，滿怀着在医学職業上未能實現的願望資志以歿；但是，我回想一下过去，他的工作成就实在比他本人的估价要高。保罗就是我的良藥——他的灵性的音乐曾經治好我許多种疾病。比尔事实上在那天已經用他的神秘的前見治了病，作了診斷，开出了治疗方法。

母亲對我們有很大影响——她把全部教育事業的力量投入精神領域里，在这工作上她称得起是皇后。她写的佈道詞也有父亲写的那么多，我在今天重讀这些佈道詞，时常惊異她是怎样写出来的；她怎能这样神奇地表达出那么精彩的思想 and 感情。她把教友会的气質傳給了我們，包括它一切精神上的傾向。这种气質

在瑪麗安、保羅和我的身上表現得較顯著。我想，這是由於當我們日益接近她的時候，她正飽受雙目近於失明之苦，而痛苦總是能触及我們的靈魂深處，把我們的最好的品質發揚出來。

要想知道保羅，就必須知道這些事情。他是根據內在的啓示而行動的。經驗教導他必須如此行事。在他根據一剎那間的決定處理事情時，他從未失敗過，也從未失望或徬徨過。他到處都安詳自若。在一剎那間，他可以体会到一切事情。他在正常的思想中提出所有的問題，不論能不能找到答案，他都按照剎那間的靈感行事。

在少年時期，他曾經決定作牧師。父親的逝世，粉碎了許多美夢的戰爭，使得他投入他現在剛剛領悟的深處。誰敢說他現在不是作牧師工作呢？他唱歌、他演戲不過是他維持生計的手段而已。他正在背負著一個被歧視、被壓制、被輕視的民族十字架；他唱出他所經歷的年代的憂傷——以及那些回想他的父親如何追述當年帶著血淚從“地下鐵路”逃亡出來，投奔到可以宣佈什麼是他所知道的“好消息”的自由講壇上。

你們聽見過保羅唱“見證”這首歌嗎？他在唱這首歌時成了他父親的化身，又加上了自己的個性。他在那時是為他的上帝和他的主人而歌唱；在作禮拜方面講來，他也許不是正統，他自己却相信和明了，他的一切已經奉獻給誰。他在歌唱和演戲時的感情也全系于此。他想像自己在粉碎多少世紀以來禁錮他的種族的桎梏。他知道，在非洲人的千萬名後裔里，一定還有旁人，只要生而逢辰，也可以一樣大有可為，為人類的進步作出健康的貢獻。

他的看法的出發點是：他認為無論在什麼形式之下，偏見都是盲目和不理智的；他看到偏見如何緊抓著世界，在每一個待解決的問題上——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問題，它還強要窒息死我們全體人民的最崇高最美好的東西。一個在工作上有輝煌成就的

挖溝工人，會比一個滿腹學問但死守事實法則而永遠不願意當他們面前脫鞋的科學家，更容易使保羅感動。一個人只要努力探索他視野以外的領域，而又全心全意地來擴大他的視野，在任何時候都能抓牢保羅的注意力，不論他是不是在運動場中難望其項背的貝爾特·威廉斯(Bert Williams)，還是攀登到不朽高峯的夏里亞平(Chaliapin俄羅斯著名的歌唱家。——譯者)。

乙

(這是1943年6月1日摩爾豪斯學院以古代文學博士榮譽學位授給羅伯遜先生時，該院院長班普明·梅斯博士演說中的一段。)

“你使全世界公認黑人音樂為第一流藝術，在這工作上，你大概比誰做得都多。你在‘奧賽羅’一劇中，為黑人民族和全世界提供了一項偉大的貢獻，這表明黑人足以在戲劇的領域里有偉大不朽的演出，而不是只能作好萊塢和百老匯永遠限定給黑人的標準廉價表演。

“你有勇氣提高地球上被壓迫人民所作的民歌的地位，並且使它們廣受歡迎。你證明了你在歌唱中負有使命，並對這使命具有堅定不渝的信仰。你在歌聲中倡導人民大眾的事業。不論它是一首黑人聖詩，是法國或加拿大的民歌，是墨西哥散工的歌曲，是渴望不受迫害的猶太人的願望，是俄國士兵的雄壯吟唱，是馬德里在遭受轟炸時的歌聲，還是描繪倫敦和中國的英雄事業的歌曲，你，羅伯遜先生，你亲身体現了人類的苦難。

“你的歌聲是信仰的宣言。你似乎是被上帝派遣到塵世上來歌唱，倡導人民大眾的事業。你真正是人民藝術家。

“在你尋求自由的'工作中，你体会到全世界受苦受難的人民

具有共同的联系,民歌是世界一致的,各地人民也都相同。在这一代里很可能没有并且也许永远没有一个和你相称的民歌歌唱家。

“你有打动人心的天才,不论他们走的是皇帝的阳关大道,或踏的是农民的坎坷小路。你在歌唱中、影片中、戏剧中打动了千万人的心。你使得每一个国家的千千万万被压迫人民,从心里产生了希望和温暖。你在人格上、在能力上和在思想上代表了本学院所坚持、并将继续坚守的事业。

“因此,我们非常高兴地作为全世界第一个黑人学院来为一个人的领导盖下承认的校章。这个人体现了黑种人的一切希望,这个人尽管在活动上受到限制,而所呼吸的乃是自由纯洁的空气。”

丙

民间音乐的共同体^①——作者的学术探讨

近年来,由于我的职业受到压力而无法开展,我转向探寻各种民间音乐的起源和相互关系的工作,倒也发现了无穷乐趣,而且归结出一些有趣而耐人寻味的、获得许多世界著名音乐学家所支持的概念,这些概念进一步证实和解释了我自己同劳伦斯·勃朗对于民间音乐世界体的兴趣和注意。

进一步调查和研究世界各地不同民族的民间音乐的起源,就会发现民间音乐具有一个世界体——一个共同体,也就是所有的

① “共同体”的原文是“Universal body”,本文中的“世界体”原文是“World body”。——译者

民間音樂都以一種普遍存在的五聲音階為基礎。正像我對人類的共同性——對一切民族彼此間的基本關係——感到興趣一樣，音樂的世界共同性的概念迷住了我，我便順着許多引人入勝的道路來追求它。

我的同胞，美國的黑人，在非洲和在美洲都是在五聲音階和五聲音階的旋律中成長起來的。難怪勞倫斯當年要向我介紹莫索爾斯基(Moussorgsky)(俄國“五人團”【或稱“強力集團”】成員之一)的音樂；德沃夏克和亞那切克的音樂；古代希伯來人的聖歌；蘇格蘭和愛爾蘭的古老的曲調；佛拉敏科^①和西班牙的德法拉；一切東歐的音樂：亞美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和波蘭，尤其是柯達伊和巴爾托克的歌曲；現代蘇聯作曲家的音樂；古非洲的音樂；泰勒(S. Coleridge Taylor)的音樂；埃塞俄比亞的音樂；巴西和加勒比羣島的曲調——它們都是以非洲的節奏和旋律作基礎的；此外，還介紹了北美和南美印地安人的音樂。而我自己也鑽研了中國、中亞細亞、蒙古、印度尼西亞、越南和印度的音樂。

由於我具有“習慣於五聲音階的耳朵”，所以我對於基本的五聲音階的興趣越來越濃厚。在這個問題上，約翰遜(J. Rosamond Johnson)對於非洲人和非洲美洲人音樂的評論極有興趣。他在他的著作“歌聲滾滾來”(紐約維京出版社1937年出版)中寫道：

“黑人沉吟思索了一陣，然後滿懷溫情地把他的班卓琴掛在牆上，他只要敲打鋼琴的黑鍵就能得到一種新型節奏的靈感。他的自然的本性會把他領到五聲音階上去。只彈黑鍵，他很容易就能找到特別能表現非洲音樂風格的五音的公式。”

瑪麗安·布爾(Marion Bauer)在她的著作“二十世紀音樂”(紐約和倫敦波特南出版社1947年出版)中對五聲音階所提出的

① 一種流行的西班牙歌曲，特別指吉普賽的音樂。——譯者

評論意見在這個問題上也很有興趣，並且也很有啟發性，她說：

“五聲音階，只彈鋼琴上的黑鍵就能發現的五聲音階，毫無疑問，是一個全世界性的音階，它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但在人類意識的演化上則標誌着一個階段。中國人和日本人多少世紀以來都一直使用它；我們在許多有代表性的蘇格蘭和愛爾蘭的民歌中對它也很熟悉；五聲音階的痕跡也可以在美國印地安人和愛斯基摩人的音樂中發現，在非洲人的音樂中亦復如此。”

異常耐人尋味的是，近年來許多西方作曲家又回到他們舊時的五聲音階旋律調式的民間音樂上，在這項財富里尋找到新的靈感，並且以此為基礎創造了許多新作品；正如巴赫以古代調式的眾讚歌為基礎，寫出他的大部份音樂作品一樣。這些作曲家之所以發現五聲音階旋律調式的曲調極為富麗，乃是由于如約瑟夫·雅塞爾(Joseph Yasser)無可爭辯地證明了，中國、非洲、印度尼西亞等地，以及追溯到公元1500年時期的歐洲，都會長時期保有和發展一種五聲音階的和聲。這就是說，早在眾所週知的自然音體系或七音體系——在1700年以後歐洲古典音樂普遍採用的一種體系——之前，就有了五音體系的音樂，而且兩者一直共存下來。但是，這種五音體系始終在民間音樂中得到延續。我的至友和同事勞倫斯·勃朗也曾經吸取這一寶藏，並且根據我們自己的民間音樂改編了許多優美的曲子。正如柯達伊和巴爾托克所指出和無可爭辯地證明的，他們的和聲是由五聲音階旋律調式的曲調的內在邏輯中引伸出來的。

李治頓特瑞特(Hugo Leichtentritt)在“曲式學”(哈佛大學出版社，1951年)中談到巴爾托克時說。

“在當代的作曲家中，貝拉·巴爾托克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愛使用不尋常的音階和由此演變出來的奇特的和聲效果……在鋼琴曲‘快板巴巴羅’中，他使用了由C大調和昇F小調一大調構

成的一个音阶,然后轉到同一音阶的移高五度——G大調和昇C小調一大調……这里面包括了一个九音的,有时甚至是十音的音阶。”

巴尔托克在他为孩子们所写的“小天地”(卷二)的“两个大調五声音阶”(C和昇F大調)一节里,給我們提供了一条真实的線索。这里可以把音阶看作两个相对的五声音阶,形成了一种自然的民歌式的双重調性。这就使得巴尔托克的作品有了一种非常先进的和現代的和声的感觉。

如果孩子們在幼年学会了調式旋律和五声音阶的旋律,就可以教給他們把鋼琴看作是包含兩組五声音阶或兩種民歌(每組音阶都有共同的两个輔助音),这样也許会減少教导的时间,并且減輕他們的負担。每一个五声音阶本身各自成为一种民間曲調。由于这种音乐語言对于孩子正如他們的語言一样重要,也不妨教他們練習这两种五声音阶并使其明了这二者之間的內在关系,尤其是三音关系。

在走了許多引人入胜而有价值的歧路以后,我們又重新流入了世界音乐——包括亞洲、非洲、欧洲和美洲音乐——的主流,它在未来能發揮这無穷的音乐财富的潛在力量,通过奇妙的音乐世界的河岸,彼此吸收,彼此交換。

丁

英国人为保罗·罗伯遜發起的运动

(下列消息摘自保罗·罗伯遜全国委员会和罗伯遜倫敦委员会發行的刊物)

保罗·罗伯遜全国委员会發起人理事会理事名單如下:

貝尔德先生,議員;貝尔徹先生,运输工会总書記;塞·貝尔弗

雷奇先生；安·比万爵士，議員；鮑多美女士；布瑞丹先生；布洛克威先生，議員；卡薩索拉先生，鑄造工会主席；卡塞尔夫夫人，議員；柯尔夫人；柯林斯牧师，聖保罗教堂；戴維斯先生，議員；德萊柏格先生；格勒克曼教授，文学碩士，哲学博士；格林伍德先生，議員；格萊菲斯先生，議員；傑姆斯先生，合作党全国执行委員；奈特先生，管理人員和工师技術人員协会秘書長；李先生，議員；李維先生；郎斯戴尔教授，科学博士，皇家学会會員；麥克迪尔米德先生；麥克因尼那先生，和平法官，議員；米凱尔都先生，議員；莫法特先生，蘇格蘭全国矿工工会主席；紐波德先生，曼徹斯特和賽尔佛德工会理事会書記；罗森費尔德教授，哲学博士，科学碩士；罗耀尔先生，議員；錫維尔曼，議員；斯罗特基博士，牧师，文学碩士，文學博士，皇家文学学会會員；索披尔博士，牧师，文学碩士；斯文格勒尔先生，議員；維基，“每日鏡报”；瓦尔貝先生，議員；威格伍德·貝恩先生，議員；威廉姆先生，議員；威尔遜爵士，牧师，文学碩士，神学博士，伯明翰大主教。

对于該委员会的目标所表示的同情散見于各报刊，例如“观察家”、“天主教簡报”、“新政治家与民族”、“雷諾新聞”、“每日电訊报”、“每日鏡报”、“曼徹斯特衛报”和“泰晤士报”等。

下列各团体或曾邀請保罗·罗伯遜訪問本国，或坚决認為应重發他的护照：

倫敦合作协会政治委员会，鉄匠协会，鑄造冶煉工人协会，英国演員协会，英国工人体育联合会，电影机制造及有关技術人員协会，全国矿工工会（蘇格蘭、威爾士、約克郡、德爾比郡）以及其他許多全国性工会；我国一些最大的工会理事会，如曼徹斯特和賽尔佛德、諾丁汉、考文垂等地；無数工会分会，工党支部，十余位議員和知名之士，如鮑特爵士、沃汉·威廉斯、哈丁；还有全国各大地区罗伯遜委员会，文化团体，艺术家，宗教領袖和其他人士，

支持者达数百人。

著名的莎士比亚作品权威多维尔·威尔逊(J. Dover Wilson)先生,在写给“泰晤士报”(1957年5月10日)的读者投书中说道:

“先生,在弗洛拉·罗伯逊女士5月4日的信中看到,在演员协会的发动下——演员永远是这样豁达的啊!——一项运动已经展开,要邀请那位伟大的金嗓子非洲绅士,保罗·罗伯逊先生,重新访问我国,为我们歌唱,更重要的是,为我们再度演出莎士比亚剧中最高贵悲剧人物的英勇黑人,这真是一项好新闻。

“为了我们这些不受控制的人难以理解的某些原因,美国政府拒绝允许他经过自由神像,跨过大西洋。如果这一措施是怕他可能有害于全世界最保守思想的人的政治,这种担心是毫无根据的。我们绝不应该让罗伯逊先生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这种琐碎事情上。我们要让他把精力放在望诗和其他歌曲上;我们渴望他朗诵莎士比亚通过‘奥赛罗’之口所述说的辉煌诗篇。

“我很幸运地曾在1930年在夏惠戏院看到过他的摩尔。那是一次永难忘记的经验,这次经验告诉我要以莎士比亚对我们的重要性来衡量他的演出。让我们用莎士比亚的名义向华盛顿呼吁,把他放给我们吧!

多维尔·威尔逊”

戊

非洲人事务理事会简介

艾菲厄斯·韩顿

保罗·罗伯逊一再公开提到的非洲人事务理事会的工作,这是他在许多团体之中最感到亲切的一个团体。该理事会在1937

年成立,当时他曾尽了很多力量,直到該会于1955年解散的十八年中,他始終与理事会的活动息息相关,并且以大部分時間担任該会主席。他对于非洲自由事業的坚定貢獻,他对世界問題的看法,他的有力的声音和巨人般的精神,对于促进理事会發动美国人——不論是黑人和白人——支持非洲从帝国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工作,具有不可估計的重要性。

非洲人承認和感谢他的偉大貢獻,这可以由一件事表現出来,他們选出保罗·罗伯遜——另外兩人是現任自由加納的总理恩克魯瑪和尼日利亞东部总理阿齐克衛——为“非洲自由战士”荣銜的三个获得者之一,这项荣銜是尼日利亞国家教堂1950年1月29日在尼日利亞的阿霸举行五千人典禮时宣佈的。

在許多年中,非洲人事务理事会是美国唯一以全部精神注意非洲人民問題和斗争的团体。

这里不能把理事会的工作逐一介紹,不过可以簡述其舉樞大者,以供参考。它的主要目标是供給正确可靠的消息,以便美国人民能够在爭取非洲自由斗争中作出适当的貢獻。为此目的,理事会把非洲新聞和背景材料供給报刊使用;遇有需要还可以提供演講人、影片和展覽材料;發行有关非洲动向的新聞和評論的月报;散發大量小冊子和事实报告;并且广泛開設非洲圖書館和研究机构。

理事会虽然以傳播新聞为中心工作,却不以單純作为一个新聞机构为滿足。它还設法將知識化为行动。从政府在考虑制定战后非洲政策时起,直到1955年和万隆會議为止,理事会組織了許多次大会,其規模小如黑人社会領袖的會議,大如在麦迪遜廣場花園羣众大会都有。那次羣众大会是为了制訂和發动公众支持一个爭取非洲人民福利和自由的行动綱領。

自从联合国在旧金山举行成立大会以来,理事会就密切注視

这个世界机构关于非洲和一般殖民地国家的活动和政策。它促使公众注意并且发动抗議，来反对美国代表团在託管和殖民地独立、西南非洲的地位、意大利从前在非洲的殖民地問題、南非联邦种族主义統制的暴政等議案上的亲帝国主义和妥协立場。一位尼日利亚工会領袖写信給理事会 职员說，“我們知道在大西洋彼岸也有我們的朋友，使我們在向榨取和無情的剝削进行爭取自由的斗争中，感到安慰和鼓舞。”

理事会的另一項工作，集中于为处于紧急情况下的非洲人发动直接援助。这一項活动所發生的影响也許是最有效和最广泛的。南非著名教育家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位領袖馬休士(Z. K. Mathews)博士，以及1957年在斯揣敦^①政权对爭取民主权利的先鋒力量发动全面攻击时被用“叛国罪”起訴的一百五十六名男女中的一位人士，都曾介紹过其中一次运动的意义。

馬休士博士1953年从南非写来的信談到理事会，“由于理事会的关切，南非洲人受到了直接利益。早在1945年，南非联邦东开普敦省大旱，成千成百的非洲人……深深感到幸亏有非洲人事务理事会这样一个机构存在……理事会在美国搜集了足够的財政援助和各式各样的口粮，送到災区分散給災民。災区中許多非洲妇孺老人深深感謝理事会援助的救命之恩。”

就是由于这一次运动，已故的哈尔利·基戈尔参議員在1946年宣称：“非洲人事务理事会值得每一个美国人衷心支持，因为它为被压迫的、飢饉的南非洲人和其他殖民地人民爭取自由和充分民主权利而进行偉大的斗争……每一个支持該理事会援助南非飢饉人民的美国人，都为爭取世界自由增添了巨大的力量。”

但是，兩年以后，官方竟为理事会加上了“顛复”的帽子，麦卡

^① 南非总理。——譯者

錫分子的恐懼和猜疑的氾子 悶死了一切自由民主的聲音。虽然是障礙重重，理事會還照樣繼續工作，並且重新組織運動，募集款項，來援助被控以陰謀與“茅茅”作亂的肯雅塔和法尼亞非洲人聯盟的其他領袖，為他們支付法律辯護的一切開支；此外，理事會又支援在“蔑視不公正法令”運動中被捕的千萬名南非男女的家屬。

“援助非洲人委員會”也參加同一工作，委員會主席是杜波依斯博士，他在1949年被選為理事會的副主席。在該委員會的各項成就中，有一項是為在尼日利亞伊努古煤礦罷工事件被槍決的二十六名礦工的家屬募集並致送捐款。

以上就是非洲人事務理事會工作主要情況的簡單介紹。這個團體雖然終於被迫停止活動，其成就是不能一筆抹殺的。今天，千千萬萬非洲人正顯示要決心為自己的利益而掌管自己事務，大家越來越看得清楚，不願非洲人的民族自決和解放，而繼續在那個大陸上追求歐美經濟和戰略利益的做法，是多麼愚蠢。

